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郑永年 主编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
2025年度回望

2025年 第四辑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2025 年第 4 期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编委会名单

主 编：郑永年

编 委：陈佳慧 戴明洁 郭 海 蒋余浩 李明令 李品保
李 婷 李海滨 林辉煌 刘 佳 卢克玲 区富祝
徐伟钧 杨庭轩 杨丽君 余 荔 赵 巍 张心旂
庄文越 朱雁翎

(按姓氏音序排列)

编 辑：刘 深 李彩霞 周浩锴 刘昕冉

主管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主办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2026 年 1 月



2025 年 10 月 4 日，在日本东京的自民党总部，高市早苗（右）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后向日本时任首相、自民党前任总裁石破茂（左）致意。

金敬勋 摄



目录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郑永年 - 1 -

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策略研究.....郑永年 - 10 -

再造一个新广东.....郑永年 蒋余浩 - 20 -

“苏大强”是如何炼成的? - 39 -

“AI 泡沫”，要爆了? - 54 -

中国如何突破“中等技术陷阱”? - 68 -

【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

“台湾有事”风波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 - 82 -

“战争骑手”高市早苗.....杨丽君 - 94 -

高市早苗内阁为何仍能维持较高支持率?徐伟钧 - 98 -

高市早苗为何在台海问题上迈出危险一步?周浩锴 - 102 -

石破茂辞职后，日本政局如何重组?徐伟钧 - 107 -

日本参议院选举如何影响美日关税谈判?陈佳慧 - 112 -

战后日本决策过程的演变，是如何影响中日关系的?王新生 - 122 -

对话张云：中日关系如何走向互信?张云 杨丽君 - 129 -

日本崛起对中国的教训.....郑永年 - 138 -

【2025 年度回望】

回望 2025，一个在危机中被治理的世界.....梅里·马达沙希 - 143 -

我的 2025：IPP 人的这一年..... - 151 -

IPP 动态（2025 年 10—12 月）..... - 168 -

关于 IPP..... - 171 -

导语

当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已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竞争的焦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及内部矛盾，其根源往往在于经济问题，尤其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问题。产业结构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又影响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失衡，可能引发社会结构的失衡，最终导致政治失衡。

11月6日，《经济日报》头版刊发了郑永年教授的评论文章《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文章指出，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科学统筹处理传统产业与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以及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防止出现“一哄而上”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风险。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具备“全、大、多、密、强”五大特征。

郑永年教授还强调，要处理好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通过技术进步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同时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他警示，英美等国因过度侧重金融业而忽视制造业，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并引发社会问题。因此，中国必须兼顾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升级，避免资源盲目流向新领域而忽视传统产业的现代化。

他进一步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构建“大科研体系”，以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共同驱动科技创新。在他看来，当前体制机制仍存在科研定义狭隘、技术转化受阻、金融支持不足等短板。除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平衡发展与安全外，他还建议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设立“科创特区”的“块块”试点，赋予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三驾马车”之上的产学研一体化各项政策支持，以期实现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成果。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战略任务之首并作出系统部署。

从国际层面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各国无一不追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在人类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候，现代化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间的竞争焦点。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内部社会政治问题，但很多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尤其是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就产业的现代性而言，拥有前沿技术和前沿经济，但却呈现出产业不系统、不全面、不协调的特征。而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体系则呈现出更多的问题，包括没有能力发展产业，或产业不完备，或产业技术长期处于低端状态。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影响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失衡往往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最终可能导致政治失衡。今天，无论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还是欧洲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产业体系失调造成的。

无论是各国受新冠疫情冲击而遭遇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问题，还是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国家间的互相制裁问题，都指向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问题。就本质而言，今天国家间的竞争，尤其大国之间的竞争，核心在于经济韧性的竞争。

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作为大国，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如何建设这样一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作为大国需要怎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要实现这些目标，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体现出“全、大、多、密、强”五大特征。

第一，“全”就是要具备一个完整完备系统的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大的经济体和小的经济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所有经济体都需要产业的现代性，但小的经济体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构建一个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也因为这样，一个小的经济体往往会依附一个较大的经济体，甚至小的经济体的产业嵌入在一个较大经济体中。也就是说，小的经济体的安全往往需要通过外部的关系得到保障，表现为依附性。但大的经济体则不同，它需要一个完整、自主、可控和先进的产业体系，这样一个产业体系保障其不受外在环境的制约而得到可持续发展，同时保障其国家安全。

第二，“大”就是产量要大。中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并且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 4 亿人，占 30% 左右。改革开放前，中国很多产业产量不足，表现为“短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策的完善和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大多数产业，尤其是基于中低端技术之上的产业，已经实现了量产。从长远看，一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特别是要避免“产能短缺”。例如，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但因为它放弃了基于中低端技术之上的产业，就出现了“产能短缺”的现象。这也是其“再工业化”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多”就是经济活动必须多样化。尽管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种类是最多的。出现“产能过剩”现象或者经济“内卷”局面，主要是由缺少足够的新经济活动种类造成的，所谓的“内卷”就是对存量经济活动的过度竞争所致。经济活动种类越少，竞争就越激烈，就越“内卷”。这几年，一些地方对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的重复建设和竞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如果有更多种类的经济活动被释放出来，那么竞争的激烈度必然减少。在很多的领域，因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存在监管过度的情况，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城市的“美观”，减少了非常生活化的经济活动，还有些高科技领域的经济活动因为相关政策未能跟上而不被许可、落不了地。只有经济活动走向多样化，才能有力推进现代化产业的体系化。

第四，“密”就是经济活动的密度。“密”和“多”不一样，“多”指的是经济活动的多样化，而“密”则指同一经济活动的细分领域。一种经济活动越是细分，密度就越高，这和劳动分工有关。在企业层面，我国企业经济活动的“密度”有待提升。部分企业仍采用“什么都自己生产”的方式，几乎不涉及供应链和产业链。从长远看，因为缺乏竞争，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就会趋于落后。在社会层面，“密”也体现为是否可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偏好。例如，一些人喜欢到高档餐厅消费，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到路边摊消费；一些人喜欢鞋子旧了就购买新

的，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对旧鞋修修补补。一个有密度的产业应当能够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

第五，“强”就是产业系统的先进程度。这往往以技术发展水平来衡量，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对外，为避免“卡脖子”和“脱钩断链”等威胁，我们必须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内，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和关键。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从思想认识层面来说，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战略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经济体现代性的最核心体现，没有新质生产力作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把新质生产力视为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的战略概念，而非指一些具体的技术和产业。尽管新质生产力需要具体的技术和产业部门来表现或者代表，但是把新质生产力等同于这些具体的部门，无疑使得这一概念失去了其应当有的战略涵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是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需要处理好的一些重要关系的科学论述，包括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之间的关系、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可以分为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相应地，技术也可以分为前沿技术和赶超技术。因为科技进步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新质生产力也必然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未来技术塑造未来产业。正因如此，所有经济体，凡是有能力的，都会追求技术进步。

尤为关键的是，要处理好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生产力视为是落后的，也不能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如果各级政府有这样的观念，一旦看到一种被认为是新质生产力的东西就一哄而上，那么就会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所强调的是产业的现代性，而非只有现代或者未来技术才代表现代性。简单地说，即使是传统的农林牧副渔业也可以具备现代性，因此如果认为工业才具有现代性，而忽视了农林牧副渔业，那么一个经济体肯定会出大问题。

在这方面，西方一些国家是有深刻教训的。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的英国和美国为例，英国“撒切尔革命”开始之后，金融业被视为最具现代性并且是主导未来经济的产业，英国政

府因此放弃了制造业而把发展重心转向金融业。尽管这一产业政策塑造了日后的伦敦金融城，但英国也从此告别了制造业。英国本来存在一个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但这一政策使得英国制造业大量流失。这一判断错误导致传统产业消失、新制造业与英国无缘。今天英国的产业结构畸形、就业不足、地方税收减少、中产阶层萎缩、社会高度分化等几乎所有病状都与此有关。

美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类似。二战之后，美国形成了一个系统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但“里根革命”之后，美国也放松了金融管制，导致美国资本带着技术离开了美国本土，流向全球各地。这造成了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去工业化”局面。尽管美国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的前沿技术，但没有能力生产中低端产品，日常商品市场充斥着外国产品。“去工业化”一直被视为美国经济的致命伤，技术、就业和税收流失，中产阶层规模迅速缩小。中低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而高科技出口又被视为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而受到限制。这样，中低端产品进口所产生的贸易逆差不能得到高科技出口的平衡，自然就导致贸易不平衡。但一旦使用关税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就会导致国内的通胀，影响人民的生活。

因此，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对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作科学的理解。

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既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需要巩固传统生产力。产业升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举例说明：其一，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产品；其二，始终生产鞋帽，但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第一种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即从传统产业升级到现代产业；第二种是在同一种产业范畴内的升级。这两种升级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对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科学理解应当是：一方面，通过追求新的技术进步来塑造未来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新的技术来赋能老的产业，促进其升级和现代化。

就政策执行而言，这也要求注意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基于新质生产力之上的新产业；第二，对每一种新的技术，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新产业上而忽视老的产业，在发展新技术的同时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新技术来赋能老的产业，促成老的产业的升级。

三、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方向和方法论。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要素的重要性是不断递增的。从低度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在发展早期，经济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劳动力和土地，人们对环保的要求也不那么高；此外，发展早期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增长空间，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现有技术应用而产生的制造业等。只要找到启动发展的资本，配置有效的政策，增长就可以实现。在这个阶段，对企业来说，做什么都可以赚钱。

但是，从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过程要困难得多。一是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经济增长空间匮乏。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因此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原因主要是实现了可持续的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这些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大量投入科技创新，几乎每十年实现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不仅促成了传统产业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新的经济活动。对社会来说，新增经济活动扩大了就业，使劳动者增加收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对政府来说，可增加税收，使其有能力扩大对科研的投入，并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有驱动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总结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可见，这三者缺一不可。

一般地说，基础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活动一般都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大都发生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国家需要为科研群体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其追求科研兴趣。政府在基础科研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需要资助大学和科研机构，更需要创建基础科研所需要的实验室等。也应当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也承担起基础科研的任务。如果说大学的基础科研多是兴趣导向的，那么企业的基础科研多是问题导向的。从大学的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转化需要一个比较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企业的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往往是无缝对接。应当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大学的基础科研不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基础科研都可以由企业来承担，兴趣导向的基础科研始终具有重要意义。

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市场竞争机制是驱动企业主动参与转化、优化转化路径的动力。市场竞争通过价格信号、需求反馈等机制，推动企业对应用技术转化方向进行动态调整。企业为在同类技术转化成果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需持续优化转化流程、控制转化成本。这不仅体现为同类产品的竞争，更体现为优胜劣汰技术路径的竞争。要完善相关竞争机制，以竞争驱动企业持续投入技术迭代，对已转化的技术进行优化升级。同时，为增强应用技术转化的

积极性，政府需通过出台政策等进行引导，并为应用技术转化设定合理规则，适时整治“内卷式”竞争等无序竞争，规范市场秩序，确保应用技术转化朝着效益最优的方向进行。

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一般是金融机构。政府通过财政系统支持基础科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当然，在发达国家，很多私营企业也以不同方式从事基础科研或支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科研。但政府很难支持应用技术转化，因其风险极高。同理，传统银行也很难去做那么高风险的事情。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风险投资作为适配应用技术转化高风险特征的金融工具应运而生。从实践来看，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诸多制造业及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都得到了风险投资的关键推动，其在衔接金融资本与应用技术转化间的桥梁作用已得到充分验证。

二战以来，大多数原创性技术都来自基础科研，再从基础科研转化成为应用技术，而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转化都需要充足有效的金融服务。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发达经济体，金融也是促成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有效对接或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最有力抓手。

因此，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通过一体化推进理顺了科技创新的整体逻辑，也可以称之为建设“大科研体系”。

四、以“大科研体系”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层面已经非常清楚，但要把理论转化成为现实依然需要诸多努力，尤其是体制机制的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表明对“大科研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

从“大科研体系”的要求出发，很多制度、要素方面还存在短板，或还没有理顺关系，科研管理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了对“科研”的定义。在学界和业界，很多人对科研和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有错误的认知，把发表论文与搞科研等同起来。因此，尽管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增，但转化率依然较低。就科研的工具来看，部分科技实验室互不关联、互不开放。尽管国家实验室越来越多，但一些实验室使用不足，造成浪费。把实验室的“多而不强”转为“又多又强”，需要系统性的体制机制改革。在技术转化端也存在问题。如对产学研过程缺乏科学的理解，过度要求做基础科研的人也要去做技术转

化，不利于基础科研本身的发展。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机制也有待完善。从理论上说，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尚缺乏转化机制。职业学校因此很难产生工匠，更难有工匠精神。

在创新领域，有些关系还没有理顺，尚需完善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制度，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创新的金融支持尚有待发展。严格说来，我们还缺乏能够支撑科技创新的金融系统。一些新技术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而被外国资本所收购，或者不得不流落到海外。一般来说，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城市层面，凡是技术创新投资最终都可能会孵化出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之上的新经济活动。如何发展能够为未来技术提供足够金融服务的金融业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连接产学研的应是一整套体制机制，这方面的改革也亟待加快。今天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出现大量的原创性技术，但因为监管不够科学，使得有些技术难以落地。

类似这样问题怎么解决？有以下几个关键点需要考量。

第一，需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很多重大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系统推动，如产学研一体化体系建设、支撑耐心资本的体制机制建设、国家实验室的开放和协调使用、科创体系的全国布局等。

第二，需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对企业的技术落地进行适度监管，在环保和劳动权益方面，监管要划底线和红线。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加强科研跨境协作和风险防范。

第三，需要在试验区进行试点改革。在条块管理的体制内，很难通过“条条”发生有效的改革。因为改革涉及太多部门，很多改革都容易导向碎片化和分割化。因此，有效的改革可从“块块”进行，给予“块块”充分和完全的授权。因为这种授权往往是一揽子的“政策包”，改革可产生系统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总结可复制的经验，再向其他地方扩散和推广。应当指出的是，“块块”既可以体现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可以体现为一个功能领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很多城市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可以设立“科创特区”的“块块”。在这些“块块”，可赋予真正实现基于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之上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各项政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创成果，在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同时赋能现有产业。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策略研究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原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11期专题“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原文标题《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策略研究》。本文为精简改编版。

导语

从中美贸易战到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遏制，科学与技术已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郑永年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中等技术陷阱”的概念：一个经济体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推动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产业升级。

围绕着这一概念，郑永年教授发起和统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的合作研究，产生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专题，在《中国科学院院刊》11期发布系列文章。

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中国目前的技术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技术水平，具体情况是：（1）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0到1”的技术创造；（2）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在“1—10”的刻度内处于“4—7”的位置而缺少“8—10”的技术水平，即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3）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而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文章探讨了中国在上述状况下，如何谋求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国家，抑或是那些长期面临发展问题的经济体，技术升级和由此而产生的产业升级都是一个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与核心。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无法实现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发达经济体？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及长期面临发展问题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笔者提炼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简单而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从技术刻度的“4”——“7”或更低水平不断向“8”以上的水平迈进。

什么是“中等技术陷阱”

“中等技术”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就内部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总是在变化和进步的，既可以是同一种技术的迭代与进步，也可以是新技术的出现；就外部而言，“中等技术”指的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或者国家群体的技术水平比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外部而言的含义更具有意义，因为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决定了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水平。本文指的是就外部而言的情形。

一般地看，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技术陷阱”会发生在如下五种情形中：

第一，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但在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后，由于本土的企业既不能实现现有技术领域的技术水平提升，又无法从应用性技术转型为原创性技术，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

第二，科学技术只有在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无法为其国内科研领域研究人员创造自由的思想空间，保持对外开放，就会导致其技术水平无法可持续提高。

第三，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流失严重制约发展步伐。发展中国家自身培养的科技人才有限，人才又因工作机会、经济待遇和生活质量等原因，被发达经济体专业的移民政策所吸引，导致国内人才短缺。

第四，发达国家出于科技竞争压力考虑对赶超型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阻碍其技术进步。

第五，当国家间进行地缘政治竞争时，发达国家对赶超国家实行科技封锁，甚至“脱钩”以阻碍赶超国家的科技进步。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涉及各环节协调发展

尽管“中等技术陷阱”的核心是技术本身，但是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技术发明、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性技术、企业、市场、政府等各个环节。这些环节必须配合协调，共同发展，否则很难实现跨越。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经济体成功了，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失败了。

欧美发达经济体本身的发展经验正说明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近代以来，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先在欧洲和北美国家扩散，然后再扩散到世界各地。较之英国，德国是后发展国家，因此政府必须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扮演较之英国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德国就产生了“国民经济体系”的概念，而英国则没有。同理，较之英国，美国也是后发展国家，因此，在美国建国初期，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一些政治家践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保护民族工业，等民族工业成长起来之后，再实行全面开放政策。

东亚几个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也说明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东亚，日本是第一个通过学习德国、美国技术经验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日本之后是“亚洲四小龙”。日本经济学家曾经提出“雁行模式”的概念，即“亚洲四小龙”早期发展依靠的是从日本扩散而来的技术。尽管有夸大日本角色的成分，但其对技术扩散在经济体早期发展中作用的描述是正确的。不过“雁行模式”就很难适用于中国，因为日本对中国技术出口持保守态度，中国的崛起并非对日本技术或者“亚洲四小龙”技术的应用。中国是通过对世界各地技术开放应用、改进创新，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尽管中国还处于中等技术水平，但与过去比较，中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整体性的。

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技术的应用转化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技术需要转化成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之后得到回报，否则很难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个国家需要把老一代的技术转移到另外的国家，得到足够的回报，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这些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体把大量的老一代技术转移到中国，得到丰厚的回报，实现国内技术的不断升级。中国本身也从这种应用技术转移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大量应用了起源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中国虽被视为“世界制造工厂”，但“中国制造”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的整产品，而是“中国组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导致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包揽所有技术的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而是只能占据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个部分，并且努力往上爬，形成价值链竞争。大体上说，中国在这一波全球化中占据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中下端。

这一过程至少说明了两点：技术的扩散是双赢的，输出国和输入国都能够从中受益；原创性技术是等不来的，需要依靠自己创造。美西方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输出到中国。最发达的国家，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害怕其他国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因此一旦出现竞争者，往往实行打压政策。

从技术升级看，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市场基本上是向中国开放的。中国的技术现代化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和强化。今天出现了逆全球化，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同时和他们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因此，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高科技领域采取系统“脱钩”和“卡脖子”的做法。

对中国来说，要回答的问题是：美国行政当局和对华不友好甚至敌视力量采取的种种做法，是否会把中国固化在当前的中等技术水平呢？中国又如何破解技术围堵实现从应用性技术到原创性技术的转型呢？中国如何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技术升级，从目前“4”——“7”的水平，提升到“8”或以上水平呢？这些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我国科学家和政策研究工作者都需要思考 and 解决的问题。

“中等技术陷阱”的跨越：在更开放的情况下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创新

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呢？在宏观层面，开放政策是关键。要对近年来所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作科学理解，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并且越来越开放。

举国体制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以来，所有强大的国家都实行了举国体制。在西方，尽管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由资本主导，但一战、二战期间的战争动员，也促成了西方国家演变成举国体制。美国更是如此。二战之后，随着“布什报告”（即《科学：无尽的前沿》）的出台，美国政府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找到了干预技术进步的领域和方法。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更是举国体制。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公开叫出了要用“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法来对付中国。拜登政府以来，尽管美国没有再用这样的概念，但对中国的打压方法不仅没有变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今天美国对我国的“卡脖子”和系统“脱钩”，中国无疑必须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回应。但是，我国强调的是新型举国体制，它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把大门敞开，在更开放的情境下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创新。

如果把近代以来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国家共同造就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阿拉伯世界的科技和西方古希腊以来的科技，都是对“这座山”的贡献。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霸占着“这座山”。二战前，欧洲国家霸占着“这座山”，到了二战以后，转变为由美国霸占着“这座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WTO) 进入了世界科技“这座山”，并通过几十年的虚心学习和努力发展，在“这座山”上持续往上爬，对处于“山顶上”的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构成了竞争能力。因而美国采取“卡脖子”“系统脱钩”，不仅阻碍中国继续上行，而且要把中国赶下“这座山”。中国不能上美国人的当，意气用事，自己封闭起来而离开“这座山”，而是要践行开放状态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继续为世界科技“这座山”贡献中国的力量。无论是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经验还是苏联“关起门来自己创新”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不管一个国家以前的科技多么先进和发达，只要选择了封闭，就一定会变得落后。

中国必须接受深刻的历史教训，不能幻想自己可以离开当今世界的科技系统，去再造“另一座山”。面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国需要更大的开放政策，甚至是单边开放政策。即使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闭政策，我国也需要继续向他们开放。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打压政策从长远看不会成功，因为他们践行的是政治逻辑，而非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就西方本身发展经验而言，导致西方发展的并非是政治逻辑，而是资本、技术和市场。因而，面对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打压，中国必须用资本、技术和市场逻辑来回应之。

“中等技术陷阱”的跨越：必须具备的条件

那么，一个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呢？自从工业化发生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被称为“创新经济”。尽管创新涵盖制度和技術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技术创新。一种新技术的诞生不仅催生新的产业，也促成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新技术的产生对现存社会往往是毁灭性的。新技术所产生的新经济利益打击旧的经济既得利益，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迫使现存制度体系进行改革。因此，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个过程称为“创造性毁灭”。

经验地看，一个国家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的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和财政的支持。这三个条件必须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否则技术创新就很难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实现持续的进步，而是在某个节点上戛然而止。

1. 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一般由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研活动大体上属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不是资本驱动的，其活动也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是始于对重大科学问题的使命感或好奇心。因此，各国政府为那些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提供一份体面的工资和居住环境，保证他们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尤其是国际交流自由，去践行科技自身的逻辑。

2. 应用技术

应用技术和基础研究不同，应用技术的转化往往是资本或者商业驱动的，也是资本密集型的。正是因为需要大量的资本，而且充满风险，应用技术往往由企业来承担，或者由国家支持的企业来承担，例如苏联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日本和韩国的企业财团。发达国家许多工业实验室的直接目标就是应用技术转化。

3. 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同样重要。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没有金融支持，这两者都难以为继。美国等西方国家，基础研究一般由政府 and 民间支持。欧洲的诸多大学都是政府支持的，但支持美国大学的既有来自民间的力量，也有来自政府的力量，在很多情况下来自民间的力量更为重要。美国大量的私立学校和科研机构由民间资本支持。因为民间资本的“逐利”性质，美国产学研一体化远比欧洲做得好。应用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需大量投入，且有巨大风险，因此传统金融体系很难满足其需要。在美国，这一需要主要由风投体系承担。其实，风投体系是美国应用技术市场的主角，没有风投体系很难想象美国科技的进步。欧洲国家的风投体系尽管没有像美国那样发达，但因为属于西方市场，可以获得美国风投的支持。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也有类似性质，但因为其属于西方市场，所以可从西方获得风投。

“中等技术陷阱”的跨越：需要进行的改革

从这3个条件来看，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中国需要做一系列的改革。

（一）基础科研

在基础研究方面，需要首先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做一个区分。改变当前因缺乏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界定，导致国家的投入集中在应用技术而非基础研究。

界定了基础研究之后，首先要确立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基础研究的主体。保障科研工作者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和充分的自由空间去追求他们的科研兴趣。行政的干预必须尽量减少，更不能用行政逻辑替代科研逻辑。此外，国家还需帮助建立基础研究所需要的实验室，提供所需要的实验设备，并将其开放使用避免重复建设。需要参照欧盟的经验，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

其次，需要建立一个人才市场和自由的思想市场。基础研究离不开人才。基础科学几乎都是科学家追求其科学兴趣的结果。同样，基础研究离不开不同文明、文化和国家的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充分交流。人才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即从很大程度上讲，基础研究基本上就是科学家（人才）在自身内在兴趣和对科学前沿追求的动力驱使下的对科学知识与真理的探索与表达。

从基础研究科教系统和国际人才引进的角度来看，中国应当借鉴新加坡等国的人才政策，在国际人才市场上寻找人才，并在找到之后想方设法将其引进。

同时，在确保科研思想市场方面，应当强化和国外大学的交流。美西方国家大多恐惧的是应用技术，而很多基础研究并没有太多的敏感性。因为基础研究大都产生于大学和研究机构，因而通过大学的交流来获得最新的科研思想无疑是最有效的。

此外，还需要改革目前的科研评审制度。目前，一些过度官僚化的科研评审制度对专注基础研究、只在自身内在兴趣驱使下对科学知识与真理进行探索的“天才”科学家极不友好，还导致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化”现象非常严重，很多科学家转向了“有用”的“应用技术”研究。然而，只有当科学家不用为了评审而自由地去追求其科学兴趣的时候，基础研究才有希望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应用技术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转化是资本密集型的。从发达国家来看，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因为企业为了应用技术转化成功之后的经济利益，有动力承担风险，而政府则很难论证其投入的合法合理性。在中国，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必须是市场或者商业化导向的企业。民生经济领域可以交给民营企业，军事和战略领域则可以让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指定的民营企业进行。

二战以来，工业实验室体系是把基础研究转化成为应用技术的最重要的工具。因为企业是应用技术的主体，工业实验室也应当由企业来建设和运行。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诸多国

家级工程实验室，少数大型民营企业（例如华为）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还存在运行主体过度官僚或者行政化、市场化不足、封闭不开放等诸多短板，使得政府的投入变成无底洞，而实验室无需过问产出。

因此，工业实验室的市场化改革不可或缺，不能光讲投入，不讲产出。尤其是需要通过开放来提高工业实验室的有效使用率。各级政府的工业实验室之间不仅要互相开放，更要向民营企业开放以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向大学和有兴趣致力于应用技术的科研机构 and 研究者开放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三）金融支持

就金融体制而言，缺失风投体系是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短板。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稳定服务的，无法扮演华尔街金融体系的角色，也很难产生像美国那样的风投体系。当前国内的风投，无论是国资还是民间机构都是比较短期的，远远满足不了中国科技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但如果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就可以实现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转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双金融中心，分别以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心。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金融稳定服务，而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中心则基于大湾区各个中心城市的“劳动分工”之上，通过融合发展构建一个可以跟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中心。

如果中国的银行系统很难扮演风投的角色，那么可以考虑让国有资本发挥风投作用。今天，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省市都有国有资本的存在，其也已开始进行各种投资活动。最近，一些地方利用国有资本存量成立了产投和科创基金，以满足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需求。与其说去控制地方国有资本，倒不如鼓励国有资本发挥一些风投功能。并且，较之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可以扮演更为广泛和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提供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可以共享的公共品方面。

在现阶段，国有资本或者国有资本组成的基金至少可以尝试围绕如下五个方面展开运作。

第一，绘制世界产业技术地图。通过精准了解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和我国在世界产业地图中的位置，对产业的未来做出预判，从而帮助国家决策部门更清楚如何实现产业升级。

第二，利用大数据等工具，预测未来产业。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可以替代老的技术，因此产业基金不仅要当前被视为先进的产业投资，更要知晓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产业。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发现未来的产业可以助力国家提前占据领先地位。

第三，和大学合作，投资于基础研究。二战以来，新技术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工作主要由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完成。因此，产业基金可以选择一些大学，并与教育系统配合来培养一群致力于追求科学兴趣的研究者。

第四，探索中国特色风投体系，投资于应用技术的转化。探索基金作为替代系统的可能性。

第五，投资于新兴产业。政府的产业基金向民间资本开放，吸收、包容和引领民营资本的产业投入，实现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投资新兴产业时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回报共享。

应当强调的是，如果国有资本要扮演风投的角色，那么就需要对国有资本管理部门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以克服现存行政体制所造成的短板，超越短期利益，做长期投资，投资未来。

除了金融和国有资本的作用之外，政府也必须通过金融改革发挥科技创新作用。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困境在于，真正需要资本的科创企业拿不到资本，而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则“被”给资金。金融业基本是国有银行为主体，主要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很难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三条调整路径可以考虑：

第一，推动专为中小型民营科创企业服务的民间金融发展，政府可以根据规定来规制民营金融的规模、服务对象和区域；

第二，设立大量的中小型国有银行，专门服务于中小型企业，这些银行的考核标准应当和大型国有银行不同；

1. 第三，引导量化宽松后放出的资金进入这些与民生经济、创新创业有关的中小银行。

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很突出，中央要求银行把资金导向中小型企业，但绝大部分银行还是千方百计地把资金导向国企或者大型民营企业，这是结构错位所致。如果金融结构不调整，中国的中小型科创企业贷款问题就无法解决。很显然，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如今中国民间风投的规模非常小，且存在缺失规则、规制的问题，因而要解决问题并使民间风投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较之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在对技术转化的敏感性和灵活性、与外资结合、国际化层面都具有比较优势。对民间资本所起的风投作用，中国需要鼓励民资去做风投，给予相当的空间，同时，对民间资本的风投加以规范和规制，避免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负面作用。

文章源自：郑永年. 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策略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3, 38(11): 1579-1592.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804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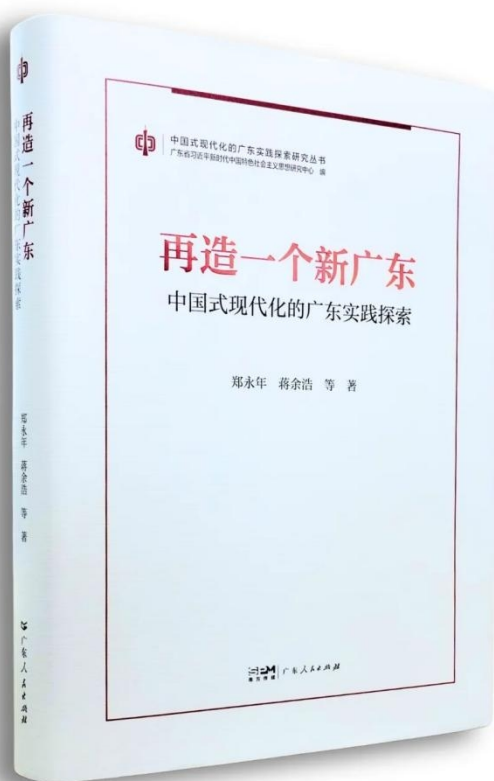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再造一个新广东

——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探索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再造一个新广东：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探索研究丛书

郑永年 蒋余浩 等 著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 年 6 月

【ISBN】978-7-218-18104-2

导语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和实验区，广东既是我国最早、最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地区之一，也是市场化程度高、社会结构较为复杂的省份。正因如此，许多制度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治理中的关键问题，往往率先在广东显现，其发展经验也常常具有先行性和示范性。

近期，由 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牵头和统筹，来自 IPP、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共同参与撰写的专著《再造一个新广东——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探索》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长时段”和“全球性”的视角出发，结合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先行实践经验，对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环境与理论命题展开了系统思考。

本书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和理论阐述，揭示了广东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历程和成果。书中回顾了广东的地理优势和历史背景，详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经济特区建设、产业升级、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强调了广东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经验和模式，包括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发展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广东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IPP 评论特选本书导论部分。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寄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广东在响应中央部署方面，已制定一系列举措。2023年年初，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被称为“新春第一会”的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发出动员令，提出“扎扎实实抓好今年，抓好5年，再深耕10年、30年，必定能再造一个新广东、再创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¹同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召开，作出了“锚定一个目标，激活三大动力，奋力实现十大新突破”的“1310”具体部署。

要理解中国、广东在新时期的实践和使命任务，需要兼具“长时段”与“全球性”的视角，在人类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和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去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通过观察中国、广东的探索实践，本书讨论如下重要理论问题：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内外部发展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在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广东应当持续实施怎样的努力，才能应对全球新发展下的剧烈变化，并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探索有益的经验？广东的实践探索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有什么作用？在讨论中，本书运用一系列相对中性、原创的概念术语，如“第三次开放”“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中等技术陷阱”“文化中产”等，并且根据对于“包容性发展”“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等重大战略和政策的理解，来描述广东正在推进的实践，旨在以系统性、学术性的语言，基于广东在当下实施的探索经验，与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叙述形成对话。

一、从“长时段”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一个如何在以农耕传统为主体的文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挑战。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以深厚的农耕文明为主体、吸纳多种其他文明要素，共同孕育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天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²“伦理本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特征，梁漱溟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文化要义》中将其概括为：“融国家于社会人伦

1 陈健鹏：《激活“三大动力”，再造一个新广东》，《南方杂志数字期刊》2023年第25期，https://www.nfzz.net.cn/node_04101cf62e/8e0ed835ad.shtml。

2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³。这种特征决定了，在中国的任何国家政权的建立，都必须以符合普通中国人的人伦观念和道德认识为标准；判断国家政治是否昌明，就在于看其能否着力实现孟子早在三千年前就提出来的准则：“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下》）因此，“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家—个人（身）”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下独特的三位一体结构，构成了中华文明数千年不移的稳固基础。⁴

但中国的这一套伦理本位的家国叙事，在近现代时期遭遇到了强烈的冲击。对于清末以来的中国知识群体而言，最重要的思想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现代性转化的路径，使中国人既能维持人心秩序的井然，又能焕发出应对各种现代化转型困难的创新。

从“长时段”视角来看，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历经了两次开放的重大冲击。⁵第一次是近代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胁迫下的被迫开放，这是中国明清以来实施海禁政策长期闭关锁国的必然结果。在这一阶段，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强烈冲击，造成了传统中国伦理纲常秩序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全面危机。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华文明在危机下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和创造能力，从太平天国运动到科举制废除，从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到五四的激进新文化运动，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不但没有摧毁中华文明，反而促成了传统文化中关于“均贫富”的朴素愿望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正义的追求的结合，给中国人带来一个创建“平等主义”社会的理想。⁶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致力于以新的社会理想推动传统社会伦理秩序观念的现代性转化，以此作为构建新的国家政权的“民意”支撑。

第二次开放是主动的改革开放，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引进国际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革自己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使之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通行规则“接轨”，并通过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4 周飞舟：《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Zheng Yonogn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中国传统“家国”叙事对于现代企业建立社会责任具有积极意义，相关分析参见刘芝秀、蒋余浩、姬煜彤：《政策创新助推企业实践SDGs》，《清华管理评论》，2022年第11期。

5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动力，他的学生一辈的汉学家挑战他的这个观点，如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从中国社会内部动力来解释中国的剧变。在我们看来，需要更综合地采用内外部的视角：以中华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文明体，在内部发展高度复杂化的背景下，遭遇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近代文明的冲击，由此引发的剧烈振荡，以及表现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才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动力的要核。

6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论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亚洲研究》，1994年第6期。

加入 WTO、“一带一路”倡议等实施“走出去”战略。改革开放让中国紧紧抓住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化所带来的每一次机遇，创造了诸多世界经济奇迹。

在这一阶段，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并在 21 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柏林墙倒和苏东剧变结束冷战格局、欧盟至少在经济上实现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也达到了顶峰，世界财富的累积总量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然而，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程度也在同一时期接近甚至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时期，根据全球不平等问题顶尖学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的研究，近几十年里，与多数国家不同程度上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相伴随的，是当今世界的财富分配状况的日益恶化，贫富间差距大幅度拉大，中等收入人群严重萎缩。⁷

中国在通过第二次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许多问题。譬如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城市化进程急速扩展、城乡同步发展受阻隔等等诸多因素被不断放大。在一段历史时期里，甚至出现农村日益衰败，农业日益凋敝，农民对基层官员的信任日益下降等严重的基层社会危机现象，应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成为中央决策的重点关注。中央层面为此推行一系列举措，在当前全球发展模式剧烈变动的背景下，确立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路径，着力建设现代条件下的新型中国社会。例如，2013 年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⁸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起大规模扶贫减贫的“战役”。2020 年底，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成功实现现有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⁹与此同步，2018 年、2021 年、202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广东也在扶贫攻坚的工作中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依照 2020 年底广东省人民政府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报告的数据，从 2016 年开始扶贫攻坚工作，四年时间里，广东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2277 个相对贫困村实现“后队变前队”。¹⁰近年来，广东深入实践乡村振兴战

7 系统研究可参见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6; Branko Milanovic, *Capitalism, Alone: 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9; 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 Ide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20.

8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 12 月 12 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605-606 页。

9 《中国近亿人口脱贫》，<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6194835>.

10 《奋斗 4 年 广东助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http://www.gd.gov.cn/zwgk/zdlyxxgkzl/fpgzxx/content/post_3140540.html.

略，并在 2023 年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以 1100 亿元保障实施，着力推动县、镇、村“三级发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¹¹

可以说，仅从中国自身来看，在通过第二次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并且在国内消灭了绝对贫困。在此成绩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成就是，随着中国产业经济的逐步升级，中国已在全球产业链条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综合优势；随着互联网平台和移动通讯等新业态的发展，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具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当的规则制定能力。¹²

但是在当前，中国所处的全球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剧变：一方面，全球不平等状况急剧恶化，而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又加速了西方世界民粹主义政治的迅猛抬头，包括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内的诸多学者所定义的那种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席卷各国经济、文化和政治全部领域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重构世界各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激起关于传统生计被淘汰、大规模失业、贫富分化加剧、巨型科技平台无法受规制等普遍性忧虑。这种全球化新状况，要求我们在“长时段”视角之外，还必须以“全球性”的视野来审视中国、广东的未来发展。

二、从“全球性”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

全球剧烈动荡，是当下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旧的发展模式遭受严重冲击，新模式却还远远未能建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加剧了这种动荡。而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化模式已经出现深层变动：一边是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政治抬头，单边主义和贸易壁垒政策盛行，给世界经济和各国发展战略带来严峻挑战；另一边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而涌现的新业态、新生产方式，使全球产业价值链遭遇重构压力，广大劳动者和中小企业的生存尤其处于极为不稳定的状况。这种剧烈的全球动荡，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根源。

根据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巴德温（Richard Baldwin）的研究，人类的全球化发展史可以借助一个“三级关联约束因素”的框架加以分析。这三项约束性因素分别是货物交流成本、思想交流成本、人员（面对面）交流成本。首先，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由于货物交流成本高昂，

11 《以乡村振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广东省推进“百千万工程”开新局》，《人民政协报》，<http://www.cppcc.gov.cn/zxww/2023/03/01/ART11677648863325310.shtml>。

12 关于中国产业发展以及在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的规则制定能力的提升，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参见 Douglas B. Fuller, *Paper Tigers, Hidden Dragons: Firm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Jeffrey Ding, *Deciphering China's AI Dream: The context, components, capabi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strategy to lead the world in AI*, Governance of AI Program,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March 2018.

生产与消费只能集中在同一个区域, 远程贸易仅属于少数现象, 此时还谈不上全球化的可能性; 其次, 随着大航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货物交流成本大幅降低, 人类进入全球化第一阶段, 生产与消费实现了分离, 商品远销世界各地, 出现“中等收入的英国人, 坐在铺着印度棉花制成的桌布的桌子旁, 吃着美国小麦烤的面包, 喝着加入了牙买加糖的中国茶”的生活方式; 再次,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思想交流成本锐减,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得以到发展中国家去寻找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人类进入全球化第二阶段, 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分工完成, 出现所谓“研发、设计在发达国家, 制造、组装在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劳动分工格局。

13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第二阶段的重要受益者, 与此相伴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地位的相对降低。最发达的 7 个工业国家 (G7, 即美、德、日、法、英、加、意) 在全球化第一阶段获得超越古代亚洲和中东在过去 4 千年时间里积累的财富, 占有全球收入份额从 1820 年的 1/5 到 1990 年左右达到 2/3。而在 1990 年之后, G7 占全球制造业份额逐渐下跌, 如今跌到 50% 以下, 后发工业化 6 国 (I6, 即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尼、泰国) 所占份额逐年上升至 30%, 其中中国占了 20%。¹⁴

对当前世界的动荡而言, 尤为重要的是, 在全球化第二阶段, 一是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 二是由于实现了基于产品生产环节的世界分工, 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外迁, 一方面推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另一方面也导致发达国家国内严重的发展不平衡: 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 使无法跻身入研发、设计等高端行业的普通家庭, 又得不到制造加工类就业的机会, 加上与科创产业高度繁荣相伴随的金融寡头崛起,¹⁵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¹⁶西方国家在近年出现的民粹主义政治、新孤立主义外交策略、“再工业化”产业政策等, 正是对全球化第二阶段产生的国内发展严重不均衡的激进应对。理查德·巴德温引述的一项 2014 年的调查显示, 意大利有 60%、美国和法国有 50%、日本有 40% 的受访者相信, 是贸易全球化摧毁了他们的工作机会。¹⁷

13 Richard Baldwin,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11-141.

14 Richard Baldwin,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p.3. 另见蒋余浩:《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看顺德改革再出发》, 爱思想网站,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8353.html>.

15 William Lazonick, *Sustainable Prosperity in the New Economy?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High-Tech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Kalamazoo: 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2009.

16 在 I6 这样的已经崛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 同样出现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正如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分析指出的那样, 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形成过程的新技术, 依然局限在如外资企业和相关行业等狭小范围内, 并没有实现广泛的扩散, 因此没有产生促使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整体均衡发展的效果。Dani Rodrik, *New Technologie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October 2018, <http://www.nber.org/papers/w25164>.

17 Richard Baldwin,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p.225.

这种引发全球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的第二阶段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在现阶段，中国必须探索一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发展道路，一是在外部经济环境快速恶化的状态下，通过有效解决我国自身长期存在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均衡、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环境危机等问题，激发内生增长的动力与活力，以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依托，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稳定器；二是在旧的全球化发展模式遭遇重大挑战的关键时期，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抓住发展自主权，为引领创造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发展新模式，提供市场、产业、科技、金融、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可靠保障。¹⁸

我们提出，结合“长时段”和“全球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以及未来努力，可以形成如下的认识：如果说第一次开放中国是被迫接受世界规则，第二次开放中国是“适应”世界规则，那么，在目前，中国应当实施“第三次开放”，即通过主动参与“制定”世界规则，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创建新型的“共享的全球化”。

中国已有主动参与世界新规则制定的努力。同时，作为制度型开放的第三次开放，也是中国以新型“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进入世界舞台的标志，致力于为世界各国实现共治共赢提供规则。中国近年来积极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以做好高水平开放的路径探索和压力测试；与东盟国家等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2022年年1月1日起实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谈判在2021年已完成¹⁹；正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彰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²⁰2019年，中共中央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称号，可以视作改革开放国策确定下的第二次开放的延续和升级。这样说，是因为邓小平当年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在新时期，深圳有责任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做出更大的努力。作为这一系列努力的政策基础，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性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²¹，并将“坚定不移推动高水

18 蒋余浩：《认知中国与探寻进步：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香港：商务印书馆，2024年。

19 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议案；但7月5日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法德两国领导人承诺继续支持《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我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7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当前中欧双方正在开展有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法律审核、翻译等技术准备工作。

20 郑永年：《加快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型开放试验区，引领中国“第三次开放”》，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358.html>。

21 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11-13。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2011/20201103015488.shtml>

平开放，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²²。

从全球发展新趋势来看，迈向第三次开放，既是我们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而主动创造的新战略，也是对全球新发展的应对和参与。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秩序由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而发生急剧变化，美国成为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美国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关系变化也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主要的变量。拜登上台以来，在科技、经贸和政治领域对中国的打压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对中国进行“精准脱钩”和“精准封杀”，加强了向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采取了制裁、打压的措施，还限制了 STEM 关键领域的学术交流，企图遏制和围堵中国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数字和通信技术、医药生物等关键领域的进步。同时，美国用“价值观外交”和其西方盟友结成“统一战线”，对中国进行全方面的围堵。²³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孤立中国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第三次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开放潜力和市场规模巨大，中国任何领域的开放都足以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向。只要中国向世界开放，只要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它们的“精准脱钩”和“精准封杀”政策都会被破解。总之，第三次开放，是我国在世界百年变局中主动创造新的“战略机遇”，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华关键领域“脱钩、封杀”策略的有力回应。²⁴

应该承认，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依然保持了很快的增长速度；中国有 4 亿中产人口（与美国总人口相当），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经济总量很快就会超过美国，但中国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还没有转化为世界通用规则的成功先例，使我们在诸多领域大而不强（市场规模和经济体量大，但没有话语权）且受制于人。比较一下欧盟，它在方方面面都有成熟且影响面广的规则。欧盟没有特别大的互联网公司，但却拥有全球性的互联网规则。而中国拥有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互联网经济繁荣发展，但却没有互联网规则的制定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规则就是生产力。中国规则必须走向世界，否则中国将继续“大而不强”。最近几年，美国从南海到 WTO，各领域的对华政策都在强调规则。美国是规则的制定者，只要中国接受美国制定的规则，那美国就是主导者。但有些规则是美国或者西方发达国

22 习近平：《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21-11-04。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111/20211103214590.shtml>

23 Anthony W. Chen, Jim Chen & V. Reddy Dondeti, The US-China trade war: dominance of trade or Technology?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DOI: 10.1080/13504851.2019.1646860.

24 郑永年：《加快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型开放试验区，引领中国“第三次开放”》，爱思想网站，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358.html>。郑永年等：《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
官网，http://hmo.gd.gov.cn/ygayj/content/post_3299452.html。

家主导制定，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需要修订规则。中国急需争取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合理的规则可以继续用，但不利于我们的规则需要改革。²⁵

当然，在全球化新发展趋势下，我们需要意识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出现某一两个超级大国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的情景，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进入牛津大学大卫万斯 (David Vines) 教授等所说的“无领导的经济” (The Leaderless Economy) 时期，²⁶规则制定的方式必然是通过引领和协同来促进各个国家共同参与、不断探索。²⁷但无论如何，制度之争和规则之争是今天及未来中美竞争甚至国际竞争的核心。第三次开放将以制度开放为核心实现更深层次的开放，重在竞争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这是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和增加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三、广东探索经验的理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视察广东时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要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这一系列要求，指明了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努力方向。

(一) 广东的第三次开放实践与双循环战略

为应对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剧变，中央制定了“双循环”战略，要求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第三次开放是实施双循环战略的题中之意和核心举措。同时，中央在近年还提出了从新发展理念到高质量发展再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在中国、在广东扎实推进第三次开放，首先要推动落实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实施“双循环”的战略：（1）统一大市场和国内大循环，不仅要互利互通，更需要实现规则一体化，借助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作为后盾，一体化的规则才能形成极大的制度优势和生产力优势；（2）内部规则的一体化是外循环的动力和保障，在此基础上，中国规则才有可能走向世界成为新的国际规则。在这方面，欧盟通过推进内部规则一体化，以统一的口径在世界商贸活动中发声，

25 郑永年等：《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官网，http://hmo.gd.gov.cn/ygayj/content/post_3299452.html。

26 Peter Temin, David Vines, *The Leaderless Economy: Why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Fell Apart and How to Fix I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7 蒋余浩：《“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了全球“实验主义治理”实践》，<https://www.yidaiyilu.gov.cn/p/88649.html>。

其经验值得深入研究，欧盟之所以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欧盟内部 20 多个主权国家的诸多规则都统一起来了。²⁸

内循环统一规则、发挥制度优势的关键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通过区域经济、知识和规则一体化打造出了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对世界优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同时该地域的优势产业完全嵌入到全球生产链中。因此，哪怕区域或国际形势动荡都不会深刻影响到这些经济平台的吸引力，而这些经济平台还具有持续技术升级的动力。例如，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经济平台。而我国，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不仅内地城市的制度规则与港澳不一样，就是在 9 个内地城市之间，招商引资、土地、税收等政策都不统一，这极大地阻碍了大湾区城市群全球影响力的形成。所以国内需要有很多制度上的改革，内部规则的统一会让中国经济更强大。²⁹

粤港澳大湾区是内外循环的结合点，在第三次开放过程中应承担历史使命，积极推进“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的建设。在我国的经济版图，粤港澳大湾区处在内外循环结合点的关键位置。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主阵地，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与产业集群高地，它本身就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从内循环的角度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活动不仅联动了城市群内的 11 个城市，还带动辐射、带动了内陆各个省份的经济活动。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入珠三角地区务工，特别是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广西省、贵州省、四川省这些省份的流动务工人员的目的地主要是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的 11 个城市有着很好的劳动分工，不仅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大，还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深圳是科技创新中心，广州是全球商贸中心和华南科研中心，东莞、中山、佛山等地是制造业中心，等等。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广东及周边省份的广阔市场，其经济影响和辐射力甚至深入湖南、四川、贵州等内陆省份，基础条件非常好。

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特别是有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这些天然的外循环因素，可以形成新一轮制度创新和制度性开放的重要来源。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三种货币、三个独立的关税区，这是世界上另外三大湾区（即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所不具备的。而不同体制之间的互动可以产生“化学反应”，最终导向制度创新。首先，香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最先引入且规模最大的

28 郑永年：《第三次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https://www.qiia.org/zh-hans/node/1096>。

29 《郑永年谈全国统一大市场：统一规则促进内循环并与国际接轨》，<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20421674314.html>。

外资来自香港。香港资本的进入使中国经济领域的制度规则为之一新，加速了中国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深圳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创新最前沿的试验田。在与香港的融合过程中，深圳探索的许多经验在全国得到复制和推广。在第三次对外开放中，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平台的打造更要放大香港在制度融合和创新中的作用。其次，通过协助香港融入祖国发展大局，实现香港的民心回归、社会回归，这即是探索世界百年在变革时期下“一国两制”实施的制度路径，可以也是展示现代化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生动案例。香港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治理的好坏成为世界评判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我们必须通过大湾区建设实现香港的善治，从而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能够治理好资本主义。最后，香港更是将中国规则推向世界的大平台。大湾区现在最大的弱项就是规则不统一，这种不统一带来的后果就是，大湾区实现规则统一的捷径是，把香港在很多方面的成熟和合理的规则作为大湾区的规则，而不是从零开始搞一套大湾区的新制度。这不是说要把香港的规则机械地、全盘照抄式地变成大湾区的规则，我们可以根据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调整。香港有很多具体领域的规则制度是与国际接轨的，以香港的规则制度为基础“做加法”形成大湾区的统一规则，很容易通过香港这个平台推广和放大成世界的规则，从而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³⁰

应当清晰认识到，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关键的努力还在于修炼好内功，在内部形成比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激发出新产业新能力。因此，广东还承担了率先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重大任务。基于国际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为防止被锁定在发达国家设定的技术赛道上亦步亦趋，需要探索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路径。³¹中央决策层在近期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明确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认识，以此对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劲推动和支撑。这是对于通过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来驱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毋庸讳言，与全国多数地区的问题相似，广东的科创市场并不发达，高校科研院所主要以争取各级政府项目为主，民营基金、风险投资、科技中介等机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我国广大科研人员的活力。尚未建成活跃而有效的科创市场，使得国家层面近年出台的多项激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新政策难以收取实效。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有着极好的科技创新

30 郑永年：《加快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型开放试验区，引领中国“第三次开放”》，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358.html>。郑永年等：《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官网，http://hmo.gd.gov.cn/ygayj/content/post_3299452.html。

31 郑永年：《中等技术陷阱：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挑战》，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

资源，原本可以成为科技创新合作的高地。例如，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有中国密度最高的世界一流大学集群，以国际化视野和宽松学术氛围蜚声国际。但是，内地与港澳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阻碍点，严重制约了科创领域的深度合作。这需要广东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为引擎，推动对内对外的全面制度变革，一方面大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一方面协力港澳科研力量，共同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吸引海外优质资本和科研资源。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为大湾区的发展擘画美好蓝图，赋予广东新的重大平台、重大机遇、重大使命，为广东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

（二）广东探索经验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广东的探索实践不仅在中国当前实际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的自主性知识话语也起到基础性作用。

百年来的现代化探索，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人有关现代化发展的知识储备及科技文化素养，为中国的崛起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不过，在创造认识和解释中国及世界的知识方面，我们却始终受到西方知识霸权的严重影响，未能形成自主的知识创造。自主性知识话语的缺失，导致了社会的浮躁、青年人的迷茫、中等收入阶层对海外生活的趋之若鹜，导致了在此前的现代化建设历程中，中国人难以创造出使“人心”安定的新型社会文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帝国多次经历军事和政治上的重大挫败，中国传统的文教体系和知识文脉遭受史无前例的质疑。最初，士大夫阶层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应对外部冲击，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但军事和政治上的屡次受挫，使整个知识界陷入过于焦虑的情绪之中。清末士子曾廉首次提出的彻底改变中华传统制度文化的主张，得到广泛传播：“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这个观点经过维新派、新文化运动派以及后来的许多海外华人学者的阐释，成为中国知识界耳熟能详的“器物、制度、文化三阶段的现代化论”，并且用以解释中国自近代以来回应西方冲击的整个历史过程，即认为洋务运动是在器物上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是在制度上向西方学习、新文化运动是在文化上向西方学习，中国由此一步一步日益深入地认识和融入西方。“三阶段现代化论”力图为中国人揭示一条唯一的“正确之路”：逐步、彻底地抛弃中国传统和文明，拥抱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社会制度和整个文化体系。

我们无意苛责先人，毕竟，身处民族存亡的危难之秋，知识界很难心平气和地进行知识义理上的辨析。但是，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转型。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逐步迈向强大的同时，伴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创新。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知识体系才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创新是多样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思想进路同样是多样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实力。所以可以说，自主的知识创造是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强国的“灵魂”，没有自主的知识创造，就不会有成功的现代化。

西方在 17、18 世纪率先开始走上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打开了有关现代世界知识体系创造的大门，而后又有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滕尼斯、桑巴特、西美尔、帕森斯等等古典社会理论大师以各自的知识创新回应工业化激烈转型带来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理论解释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缺乏自主的知识创造，造成我们对如何探索更丰富多彩的未来，形成不了我们自己的前瞻性理论，导致（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的脱节，理论指导不了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两种哲学观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位置，是一个引起了广泛讨论的学术题目，我们在这里不多做涉及。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无论如何，要改变世界，首先需要有科学的解释世界的工具和知识。比如说，如果局限于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中国道路，就会把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而化之地解释成为中国“国家”本身存在问题，于是相应得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意见。例如，管理范围宽广的政府需要变成“小政府”（基于西方制度经济学理论），占比庞大的国有资产需要化公为私、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基于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法治难以推行则需要建立分权制衡的体制（基于西方民主法治理论），等等。之所以说这些意见“似是而非”，就是因为它们从一些问题表象出发，经过了（基于西方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学理分析，最后开出并不对症的方子。

系统关注广东的探索经验，能够为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素材。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排头兵，必将在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40 余年来改革开放所累积的广东经验，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所要求的主体意识、创新精神、体系建构和实践导向等组成部分一脉相承。百年变局下，广东不仅具备扎实、坚定的体系构建基础，更具备长远的发展潜力。2023 年 4 月，总书记在广东调研时强调，使粤港澳大湾区成

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这一新战略定位与历史使命要求广东在把握守正与创新平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区域和政策优势,从历史和实际出发,自觉对人民之间、中国之间、世界之间和时代之间做出主动回应。2023年“新春第一会”上,广东省委明确提出,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打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旗帜,奏响走在前列、当好示范的强音,矢志“再造一个新广东”。³²自主知识体系事关构建现代化经济、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培养高层次人才、实现各领域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成败,是推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战。在改革开放前期,广东存在诸如吸收外国理论时甄别能力不足、忽视创新发展潜力、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欠缺、区域和产业内部协同有限等问题,应牢牢把握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价值,找准广东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发力点,在我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的双重维度中,助力我国建构自主性、原创性、系统性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智识驱动力,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充分赋能。

四、理解广东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几个学术概念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知识界需要主动学习西方创造现代知识体系的方法论,为集体创造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做充足的准备。西方知识界长期淬炼的各种科学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应用。中国迄今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实证哲学传统(如通过创造核心概念来构建知识体系)和科学研究传统(如以实证的方法来检验知识的真伪)。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切仍然是规范性的,而非实证性的,这就导致了现实中出现大量的“话语泡沫”:以道德化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在讨论中难以形成有建设性价值的对话,而多抢占道德高地,把自己无限理想化,把他人无限妖魔化。如果能在教育过程中加强科学的方法论的训练,使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道德化倾向形成互补,则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基于经验材料的分析和讨论,少一些不着边际的空洞议论。

32 《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在广州召开》,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4205038.html.

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习惯，还有助于激发中国古代经典的活力。中国古籍通常是以讲故事、打比喻或者其他能引起读者共情的方式来阐述道理，其优点在于能将读者引入设定的情境中去体会说理者的情感，但其缺点在于经常是“说教”味道太浓，把道理说成了教条。如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这句话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不均”的危害性，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患不均”在道德上要高于“患贫”的价值判断，好像克服贫困的方法并不重要似的。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们则完全可以提炼出一个“均”的概念，作为儒家“分配”思想的理论基础加以阐发，从而进一步思考如何克服贫困、如何实现“均”。总之，从方法论上说，中国知识界需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研究工具以及构建核心概念的方法，以此形成对中国古典、中国现实的重新理解。

本书运用如下几个相对中立、原创性的核心概念，描述、思考广东的实践³³，力图以学术性语言来揭示广东经验和探索努力的理论意义，有必要加以说明³⁴：

1. 三次开放

从近代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而现在要开始进行第三次开放。第一次开放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的被迫开放。第二次开放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主动开放，加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今天看到的中国就是第二次主动开放的结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第二次主动开放，中国还能实现如今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

现在为什么要提出第三次开放？从开放的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几乎是两百年未有之大变革。鸦片战争的时候，西方强迫中华帝国开放，使中国不得不打开国门；后来中国主动开放，美西方国家也接受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但是现在开放的条件很不一样了。如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想要封杀中国，卡脖子，搞脱钩。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应对？我们认为，中国需要高水平开放。这里所说的“第三次开放”就是高水平开放。2022年党的二十大有一个定义，即规则、规制、标准 and 管理的制度型开放。这个制度型开放的定义体现的便是高水平开放的内涵。高水平开放不仅仅要适用于对外开放，更需要首先适用于对内开放。中国对内开放的程度远远不够。很多年来，尽管我们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开放，但一执行便困难重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内开放程度不足。我们可以把内部开放理解成为外部开放的基础，内部开放动力越足，外部开放的动力就越足。对于广东而言，第三次开放最重要

33 本书对“包容性发展”“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等已经成为战略和政策的重要概念，也形成了相对自主的理解，这在以下各相关章节中有所体现。

34 以下几个核心概念所涉及的文献，在本书各章中有详细引述。

的举措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1310”具体部署中明确提出“要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2. 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当前的西方几大发达国家，之所以存在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特征，即不断通过自我否定、自我摧毁来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其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经济体一般都成功构建起了若干个“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在国家政治社会发生危机时期依然能吸引全世界优质资本、优质技术、高端的人才，保证该地始终处于资本流动、技术创新、人才集聚的高地位。一般而言，这些平台拥有三大开放系统，即开放的教育人才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和开放的金融系统。这促成了优质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都往这些平台集中，并且来了不想走，这也是旧金山、纽约等湾区主要平台经济技术持续升级的关键。广东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科教强省、文化强省、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等一系列建设举措，以“四大开放平台”（前海、横琴、南沙、河套）为基地，在国内率先打造“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大力吸引海内外优质资本、人才、科技资源聚集。

3. 三层市场体制

在中国，存在一个三层市场共存的政治经济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通过这样三层的资本结构，政府维持着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并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

揭示出三层市场体制的概念，一方面，可以针对西方对于中国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误解，如西方学术界偏向于用“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发展实践，而三层市场体制的概念，则揭示了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发展过程中（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中），大量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三层市场体制，也为思考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即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给予大量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生长的空间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内部平衡不但关系中国自身未来的前景，也可能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广东的发展经验中，一直有着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优良传统，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以民营经济和中小型企业的高度发达而著称，因此以“三层市场体制”的概念也观察和思考广东实践，具有相当的契合度和前瞻性。

4. 中等技术陷阱

邓小平在 1988 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系列表述，反复强调科技对我国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相应的目标？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及面临长期发展问题的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我们提炼出“中等技术陷阱”的概念——一个经济体难以单纯通过承接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扩散实现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除承接技术扩散外，既需要培养“从 0 到 1”的原创性技术，同时也需要有能力对既有技术开展迭代升级。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先进技术转移的“红利期”结束前，仍无法实现既有应用技术的迭代及原创技术的研发，其经济便将陷入相对停滞状态。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技术发明、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性技术、企业、市场、政府等各个环节。这些环节必须配合协调，共同发展，否则很难实现跨越。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经济体成功了，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失败了。对我们而言，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关键就是“开放”+“创新”。在技术领域，开放是创新的基础，只有发挥要素性开放和制度型开放的共同优势，才可能通过“新型举国体制”进行技术创新。

5. 文化中产

“文化中产”是“收入中产”的升级形态，不仅要求中产阶层在经济收入上达到中等水平，更注重个体在知识、技术、管理等技能水平，以及创新意识、理性精神等精神追求方面的提高，实现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人的现代化。“文化中产”概念的提出，直面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收入中产”及其后代正加速向海外流失的问题，这不仅是我国巨额的经济损失，也是人才的损失，更是下一代的遗失。因此，培育“文化中产”对于我国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必要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社会环境，从创新参与通道、创新基因激发、创新分享机制三个连贯性的过程进行制度创新，让广大“收入中产”成长为有资源、有知识、有勇气创新的“文化中产”。广东省“1310”部署专门提出了“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新突破”和“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在努力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的答卷上取得新突破”，以“文化中产”的概念可以从学术上对这一系列政策实践加以概括，并且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思考。

6. 绿色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战略路径；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则必须以“绿色新质生产力”作为支撑，以降低发展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强关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我国可以构建、推出“绿色新质生产力”这一战略理念，用以填补全球发展类环境公共品的空白。首先，绿色新质生产力落脚于“生产力”，暗含了“发展优先”，

能与“可持续发展”、“公正转型”、“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等人类共识相呼应，在国际上能更好达成、凝聚战略共识，赋能全球共同行动。其次，新质生产力核心是技术进步，而我国作为全球绿色产业链“链主”，我国绿色产业影响力可以沿供应链从内到外辐射，引导全球绿色生产力和资源实现国际国内双向有效配置。最后，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演化发展还需要一系列制度要素来推进，这些制度要素的发展水平反映了国家在环境相关领域的议题构建和制度主导能力，这些正是我国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急需提升和补足的。当前实施的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正是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的努力。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苏大强”是如何炼成的？

——“江苏现代化经验分享与广东对比”研讨会观点摘要

(2025年12月8日)



主持人：戴明洁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对话人：杨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教授

姜涵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易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教授

导读

最新数据显示，2025 年前三季度，江苏全省 GDP 达到 10.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与广东省的 GDP 差距已收窄至 1757.6 亿元，较 2024 年同期的 1916.2 亿元差距进一步收窄。

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粤苏两个经济大省的不同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广东长期面对着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发展落差明显的结构性难题；而江苏的经济增长既延续了“苏南领跑总量”的传统格局，也呈现出“苏北冲刺增速”的新增亮点，逐步形成更为均衡的省域发展态势——苏州、南京、无锡持续引领，南通向万亿俱乐部冲刺，常州、徐州、盐城等城市增速位居前列。“区域协调发展”如何从理念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江苏的实践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观察窗口。

在此背景下，2025 年 12 月 17 日，IPP 与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联合举行“江苏现代化经验分享与广东对比”研讨会。研讨会邀请多位学者及研究人员，围绕江苏省差异化发展及其背后的产业、制度与治理逻辑展开讨论，并深入探讨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与可能方向。IPP 评论特将本次研讨会的观点精华进行整理，以供各位读者参考。

杨丽君（IPP 资深研究员、教授）：

我主要想从五个方面谈一些本次调研的直观感受：第一是企业，第二是科技机构，第三是社区治理，第四是农村建设，第五是城市综合治理。

在企业方面，有几家调研单位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一是徐州的徐工集团，二是镇江的中船动力，三是无锡的半导体企业华润微电子。从表面上看，这三家企业分属不同产业，但深入观察后可以发现，它们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如何克服芯片、高端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徐工集团在起重吊机领域已经做到国内领先，近年来也在持续推进自动化和产业升级。目前，徐工正在努力攻关吊车无人驾驶的复杂吊装环节，其中对自动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出了极高要求。而这一核心环节已经指向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

——中船动力是一家以发动机制造为主的企业，产业成熟度和国产化率都很高。但当我进一步询问“核心技术是否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对方也坦言，该企业正在花大力气克服对进口技术的依赖。

——华润微电子的情况也较为类似。作为一家半导体企业，他们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特别是疫情期间的技术追赶速度明显加快，自身进步也非常显著。尽管在最核心、最前沿的高端技术上仍然需要通过第三方渠道购买，但大量的投入有助于加快攻关，实现技术替代。

综合这三家企业的情况，我最大的感触是：未来无论在哪个产业领域展开竞争，最终都会聚焦到人工智能和芯片等核心技术上。这也是中美竞争之所以如此激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产业升级迭代的关键所在，已经波及所有传统制造业领域，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能否在制造业领域保持优势，关键在于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技术的突破与应用。

最近日本首相主持的内阁会议通过了第一份《AI 基本计划》，目标是把日本打造成“全球最便于开发和利用 AI 的国家”。具体做法是：发挥日本在精密机械和数据质量上的传统优势，重点在产业领域和生活应用领域推进 AI 技术落地与深耕。可以想见，不仅通用 AI（比如 OpenAI）领域的竞争会加剧，产业领域的智能化竞争也将会越发激烈。

接下来是科技机构。在技术竞争中，人才问题尤为关键。调研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如何培养、如何吸引？一方面，这需要我们加大本土培养的力度；另一方面，这也涉及到高端人才回流的问题。调研中有人提出，一些科学家在回国问题上仍然心存顾虑，那

么是否可以借助香港作为人才回流和吸纳的中转平台或缓冲基地？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除了“人”的问题，另一个引发我深入思考的是：技术竞争中，资源应如何更有效地投入？

这一点，来自我们参观镇江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的直观体验。该研究院由镇江国家高新区与黑龙江省科学院共同建设，其首席专家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他同时担任国内某行业学会的会长，能够凭借其个人资源和学术网络跨区域调动科研力量。这个平台本质上所从事的，正是近年来频繁被提及、但很多人并不真正理解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更具体地说，是科技领域的生产性服务。这里有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第一个是采矿机器人。过去在采矿过程中，一些矿洞由于空间狭小，男性工人无法进入，只能由女性下井作业。但因为作业环境往往潮湿寒冷，对女性的身体伤害极大。为此，他们研发了采矿机器人，让机器人进入矿洞作业。这类研发对企业而言极为重要，但往往高度依赖外部技术支持。

第二个案例是螺丝的检测问题。螺丝生产完成后，需要区分合格品和不合格品。不合格品中，有的只是轻微缺陷，修补后仍可使用；有的则完全报废，需要及时分拣。如果依赖人工，则耗时长、效率低、成本高。针对这一问题，他们开发了自动化检测设备，能够高速、精准地完成检测和分类。

这两个案例共同说明：在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对高端研发能力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大量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自建研发团队的条件。如果要求它们单独雇佣高端研发人才，则成本极高；在高成本压力下，企业往往会选择通过专利等方式形成技术封闭，反而不利于技术扩散。相比之下，这种平台化的生产性服务模式，能够有效整合人才与资源，为企业提供研发和技术解决方案，从而降低单个企业的创新成本，也更有利于技术在产业体系中的扩散。

这也让我重新理解了一个问题：自2020年以来，我们反复强调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但“生产性服务业”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正是这种以平台为载体、为产业提供技术和创新支持的服务形态。基于前面的调研和观察，我认为这类平台型机构，未来不仅“更需要”，而且理应成为重点发展的方向。广东在“十五五”规划中其实也已明确提到这一方向，值得进一步对照和思考。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更宏观的问题：从国家层面看，技术创新资源究竟应当如何更有效地投入？目前，我国科技资助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投向企业，但当这类企业一旦“走出去”，外界

往往会将其视为“国家资本”，从而引发较大的政治与舆论反弹。甚至有的国家会将经济竞争政治化，以所谓的“国家资本”和“举国体制”等为借口，对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实施封杀。

但问题在于，其他国家就不存在国家对技术创新的资助吗？显然并非如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都在通过不同形式介入科研与技术创新。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出由能源部主导建设的“美国科学与安全平台”，本质上就是平台型资助模式。日本同样有大量科研经费通过平台或项目方式配置，而非直接投向企业。

这些案例说明，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国家资助”，而在于“以何种方式资助”，才能在合理投入公共资源的同时，降低外部误解。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也值得系统研究的问题。也正因如此，这类平台未来不仅是“可选项”，而很可能是必须重点发展的方向。

回到我们调研的这家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目前其在资金和科技资源方面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政府的资金投入有期限性，政府不再投入之后，资金问题如何解决？完全依靠承接企业项目是否可行？目前的科技资源整合很大程度上依赖首席专家自身的行业资源，如何建立一个较为制度化、脱离个人因素的科研网络来服务于智能创新平台，这也是未来需要研究的课题。

社区层面。我们调研的一个案例——扬州文昌花园社区，原本是一个拆迁社区，拆迁之后新建了住宅楼，居民既包括回迁户，也包括后来新搬入的居民。初期，由于人口结构复杂、生活习惯差异较大，邻里矛盾非常突出，上访问题也比较严重。后来，社区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社区服务体系，配套建设了多种功能设施。随着治理体系逐渐完善，如今这个社区已经基本没有上访户，甚至一些原本的上访户反而转变为社区志愿者。

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社区大楼，大概有五层。他们的社区管理非常细致，把整个小区划分为若干板块，每一个板块、每一栋楼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对接和日常管理，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责任体系。

那么，这样一种良好的社区氛围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人”。社区中有一位女性负责人，她过去是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后来被请来主持社区工作，并牵头建立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党支部。从她的介绍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她的组织能力很强，思路清晰、点子很多，而且有很强的奉献精神。这实际上说明，在基层治理中，党组织确实把原本分散的居民重新组织起来、协调起来，做到了基层社会有人管，在化解邻里矛盾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案例让我产生了一些联想。

一方面，它让我联想到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模式。新加坡在社区治理方面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社区治理中政府无处不在，却又有效发挥了市场功能。组屋底层往往配套有大量公共设施，政府负责规划和监管，具体运营则依照市场规则。

为了保证不同族群家庭可以和谐共处，在组屋申请阶段，就有严谨的规划，以不同族群混居的方式防范可能出现的族群隔离。在配套的食阁以及蔬菜日用品集市也会考虑到不同族群的饮食偏好和生活需求，合理规划确保不同族群都可以在组屋社区得到满足。在不吃牛肉的印度族、不吃猪肉的马来族和饮食无禁忌的华人混居区域，做到和谐相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政府的规划和管理，完全放任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社会的自主性，和谐共存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对社区管理的深度介入还表现在议员在自己选区的值班制度上。议员每周必须抽出一天时间到社区中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这种制度性嵌入在功能上与当前一些国内社区的做法颇为相似。

它也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的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等组织社会的方式。他们在“强组织性”上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又并不完全相同。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公有制改造结束后，市场消失，所有的资源（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生存权）都集中在实行公有制的政府手中，政府通过划分阶级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准则来分配资源，社会失去了活力。

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在单位以及人民公社制度下，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有所作为，当然这种作为不可避免地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当时的意识形态特征。国家对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组织方式必然导致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失败。而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方式则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角度为我们示范了在社区治理中政府和市场如何协同保障社区健康运营。

关于农村治理层面。这次调研我们一共考察了四个点，其中三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马庄村，这个村过去是一个典型的矿业型社区，煤炭资源枯竭后，土地出现下陷，原有产业难以为继。2016年以后，该村从煤矿管理区启动转型，引入了专业规划人员，进行了系统性的整体规划。目前，这里主要发展文创旅游和城郊农业，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现在，马庄村的集体收入已经突破500万元，人均收入接近4万元，是一个相对富足的农村样本。

我们还去了一个农业行政村——镇江的永茂圩村。它并不是广东一些农村那种楼房建得很漂亮、但年轻人大量外出的“村庄空心化”模式。虽然这里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外出务工现象，但整体来看，村庄是“有人用、有人住、有人生活”的。站在村里的一座小桥上，可以看到鸭

子在水边走来走去，环境非常安静，充满田园气息。这种场景让我联想到日本的乡村——传统、生活气息浓厚，同时又保持着相对富足的状态。永茂圩村给我的整体感觉，正是这样一种“建设得很好、生活得下去”的农村案例。

综合来看，这几个做得比较成功的案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党组织的角色都非常突出，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社区还是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都十分清晰，每个地方基本都有一位任职时间较长、能力突出、有想法、有执行力的人在带队。比如某个村的支部书记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基层带头人，已经干了将近 20 年。

我们参观镇江的四季村农业园时，有一位负责人就提到：单靠资金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技术。为此，他们主动引入了一位农学院教授参与合作，把技术和产业紧密结合起来。而这位负责人过去是一名从事水产养殖的企业家，具备较强的经营和管理能力。正是这些因素的叠加，才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农村发展模式。

最后是城市综合治理。我们还参观了无锡新吴区江溪街道综治中心。这个综治中心是一栋体量较大的连体大楼，内部划分为多个功能区，包括综合接待大厅、人民来信接待大厅、诉讼与非诉讼服务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综治中心指挥调度中心等。它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访压力。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联动”：把原本各自为政的部门集中在一栋楼里，使居民只要进入这栋大楼，就能找到相应人员对接诉求，从而在早期阶段疏解社会矛盾。过去很多问题在于，居民不知道该找谁，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最终把矛盾推向上访渠道。

总体而言，这种综治中心模式目前正在江苏省内推广，虽然建设和运行成本不低，但确实起到了较强的缓冲和疏解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个隐忧：如果今后逐渐流于形式，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关键仍在于能否持续发挥真实的治理功能。

通过这次调研，我思考的许多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既包括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建设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进一步说就是：什么样的 NGO 或社会组织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社会几乎没有任何自主空间。国家是全能型的，把整个社会包裹其中，社会既没有自主性，也缺乏自我组织的资源。城市依赖单位，农村依赖人民公社，这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组织方式。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开始从社会领域逐步后撤，社会获得了一定空间，并开始在市场中寻找自身资源。但在这一过程中，农村治理反而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曾寄希望于通过村民自治替代已经解体的人民公社，但从实践来看，村民自治发展到最后往往仍回到“一肩挑”的状态，党组织依然发挥主导作用，而自治功能逐渐弱化。

而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也因为农村治理的主体是村民自治组织，而疏于介入具体事务。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并未真正形成自主的组织化的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较为分散的状态。不仅新的社会自治组织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以前旧有宗族等发挥社会功能的传统的社会组织也大多解体。虽然也存在着一些社会组织，但总体而言，并未建立起类似西方那样边界清晰、制度化的国家—社会关系。

那么，在社会缺乏有效自治组织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有效治理？从这次调研的几个案例来看，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确实地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落到实处，可能是一种现实而必要的路径。

提到重建国家和社会关系，以及政府和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很有可能被人误解为是提倡回到“全能政府”的时代。其实不然，无论是何种制度形态的国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院的创院理事长莫道明教授在最近的院内学术交流时，谈到了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规划”职能。他认为，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能缺位，应该发挥好“规划”职能，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其“规划”能力是否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相匹配。如果借用莫教授的“规划”概念，可能比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组织化概念更能够恰当地表达我所思考的上述问题。

姜涵（GIG 研究员）：

这次调研结束后，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会想和大家分享。

一是实体经济非常重要；二是江苏各地都在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而且特色非常鲜明。

第一，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我们调研时参观了徐工集团，它主要做工程机械，市场占有率非常高。这家企业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也为当地创造了可观的 GDP，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大量上下游企业的发展。

徐工自身也在建设研发中心，但它的逻辑与很多地方不同。它并不是“单点突破”，而是服务于整个集团的发展。正是因为该企业规模足够大、应用场景足够多，所以它的研发可以围

绕产业链上下游不断延伸，并且孵化新技术和新业务。同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引入了一定的外部资本，从而形成新的组织和资本结构。这是徐州实体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

镇江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逻辑有相通之处。我们在镇江调研了中船动力，它背后依托的是中船集团这一大型国企，镇江主要承担动力系统制造。

不论是徐工，还是中船动力，其实都属于典型的“大国重器”型企业。这两家企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它们都经历过行业的波峰和波谷，现在正处在从波谷向上爬升的阶段，并且仍在坚持做“自己擅长的事”。二十年前，美国企业凯雷集团曾非常希望收购徐工集团，把它变成合资或外资企业。徐工自身也曾动过这样的念头，但省里认为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企业，坚持不能卖。最终，企业坚持了下来，发展到今天，成为标杆性企业。

我们在无锡还调研了华润微电子，这是一家做半导体的国企，走的是全产业链布局路线。

扬州则稍有不同。扬州看上去好像没有特别强大的企业。但其实扬州也有相当强的制造业基础，比如玩具、日用品（如牙刷、牙膏）等的产量还是可以的。只是从当下的视角来看，扬州的制造业偏传统，当地也认为自身缺乏“真正有力的实体支撑”。这反而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扬州是否可以围绕原有制造业基础，推动实体经济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除了实体制造本身，我们还发现，各地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在同步布局服务实体的环节。徐工的做法是通过内部研究院，围绕自身技术和应用场景开展产业和技术孵化。这正是前面杨老师提到的“生产性服务业”。

镇江的做法更偏向公共平台。镇江的智能制造中心由高新区支持，主要服务周边中小企业。企业如果需要某项技术，可以到平台对接合作。原本可能需要几十万、上百万的研发成本，在平台支持下，可能几万元就可以解决，而且研发成本并非完全由企业承担，区里本身提供了一定的公共财政支持。

当然，这类平台也面临现实压力，比如财政支持周期的问题。类似的服务平台我们此前在南京的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也看到过。不过，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已经运行了10余年，面向全省乃至长三角。而且，江苏省已专门立法，明确对其的财政支持和审计等机制。从这一点上说，江苏在确保制度稳定性上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

我认为，从共性技术支撑的角度来看，江苏和广东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广东更多依赖大企业赋能，而大企业往往从自身利润出发，不一定具备长期公共服务属性；而江苏这种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平台，或许更有利于形成系统性的技术供给能力。

此外,江苏省今天实体经济发展得比较好,肯定并非偶然。这背后与其长期形成的“实学”传统存在着某种历史联系。在明末清初时期,无锡一带的知识分子就提出了“经世致用”“发展实学”的思想。后来,无锡也创办了大量工业企业。从历史脉络上看,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延续。我感到,这种文化层面的传统,可能一直影响到今天江苏实体经济的发展。

相较之下,广东制造业企业数量确实非常多,规模也很大。但与江苏相比,我觉得至少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在于制造业的起源路径。广东制造业的发展,更多依托外贸加工,尤其是过去依赖香港的“前店后厂”模式。很多产业是在外部需求带动下逐步形成的。而江苏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江苏本身市场规模足够大,对外依赖相对较低,企业更多思考的是如何满足区域内或周边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我们在调研中也能感受到企业工作的“实在性”和“接地气”。比如徐工这样的大企业,在谈到人才培养时,他们明确表示,并不需要特别“高精尖”的人才,而是更注重培养适合自身发展的技术型、绩效型人才,这样反而更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我们在无锡调研时也听到类似的说法,当地聚集了大量技术人员,其“实用性”更多来自于如何服务本区域的发展。

第二个差异在于产业创新的侧重点。就我个人观察而言,广东在产品创新度和新颖度方面,整体上仍高于江苏,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等创新产业。从新闻和现实情况来看,江苏在这些领域相对偏弱,目前也很难说江苏已经形成了特别突出的人工智能或机器人龙头企业。这些未来的实体经济、未来的制造业,或许更有可能在广东率先发展起来。

当然,江苏也在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布局。我们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很多关键的零部件环节,比如机器人产业中的轴承、传感器等,其实大量集中在江苏。也就是说,完整产业链中的许多关键制造节点,反而在江苏更加密集。因此,我个人的理解是:江苏可能更偏向低调、踏实地做自己最擅长的部分;而广东在创新性和超前性方面整体更为突出。这两种路径,本身并不矛盾,而是各自基于不同条件形成的发展选择。

第二个想分享的体会是:江苏省各地的差异化特征非常明显。江苏的城市本身就差异很大,如果再细化到县域、农村,差异会更加突出。有的村主打葡萄,有的村种草莓,村与村之间的定位非常清晰。网上常说“江苏十三太保”“散装江苏”。从我的理解来看,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江苏各地骨子里都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你这个方面强,我可以在另一个方面做得更强。我不一定正面和你比,但我可以走差异化路线。这其实就是一种“各美其美”的状态。

这一点在农村调研中也体现得很明显。镇江的一位村支书就说：“我们农村是很有自信的。”这种自信来自哪里？来自产业支撑。你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真实的实力，才会有底气。

反观广东，一些地区内部竞争反而更激烈，甚至可以说是“恶性竞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江苏整体上做得比广东更好。

差异化发展还与产业和技术的空间扩散密切相关。江苏发展较好的城市，距离上海都很近。苏州、无锡承接上海的产业和技术外溢，常州、南通、泰州也逐步通过这种扩散机制发展起来。但徐州又是一个特例：它虽然离上海较远，但也形成了自己的辐射圈，周边山东、安徽、河南的城市都愿意加入徐州都市圈。南京也是类似，对安徽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对比来看，广东目前除了珠三角之外，似乎缺少一个像徐州这样的区域带动型城市。粤东西北虽然提出了一些省域副中心城市，但实际带动能力仍然有限。这可能是广东未来可以重点思考的方向：是否可以在珠三角之外，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空间？

广东并不缺人，但是很多人在粤东西北并不容易找不到产业和就业机会。未来在“十五五”发展中，如何通过打造新的区域中心，为不同区域提供发展支点，可能还有很大的空间。

易达（GIG 研究员）：

现在大家在讨论广东和江苏时，往往习惯从总量上进行对比。但事实上，除了总量之外，结构方面的问题更值得大家关注。之前“苏超”火热的时期，我们就能看到一种各具活力、发展更均衡的“十三太保”格局。我们在江苏调研时有干部就提到，“江苏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应该是各美其美”。我们认为这句话其实可以很好地概括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

从数据来看更加直观。江苏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13 个地级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的省份。过去我们常说“苏南苏北差异大”，但现在来看，苏中和苏北的经济比重已从原来的不到 25% 上升到 43.1%；苏南和苏北的人均 GDP 差距也从 2000 年的 3.5 倍缩小到如今的 1.96 倍。可见这些年来整体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江苏是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各美其美”的均衡状态的？从这次调研中我总结了三个要素：钱、人和机制。

首先从“钱”的角度来说，“有钱才有权”，财政权力的下沉能够塑造县区自身的内生动力。我们以前更多还是靠财政转移、资金扶持等“输血”的办法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但事实是，这样没有办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还是要靠大家“造血”。而“造血”的前提，是区县一级本身手里有钱。

华创证券曾经做过统计，2024年广东省的本级收入占比是22.6%，而江苏的本级收入占比是2.5%。整体来说，广东省的财力集中在省一级，真正到地区层面的财力就比较有限。另一个数据也能支撑这一点：从区县层级来看，江苏区县的财政自给率达到75%，而广东只有39%。这种财政上的明显差别，其实也带来地方政府积极性和效率上的差别。

我们在调研时就听到一位领导说，区里“自己有钱，也有权”，如果看中了一个项目，就不需要层层上报，甚至可以直接拍板做决定。广东整体上是“强市弱县”，市级权力比较集中，尤其在审批权方面，区县层面很多事情都要依赖市里、省里。区县如果想上一个项目，要等市里、省里的批复，慢慢等下去，很多事情就做不了。江苏把财政资源真正放到了一线，让基层能够实际去做事，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要素是“人”。人是经济发展的操盘手。不管是发展的方向规划，还是执行落地，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刚刚杨老师分享的社区治理、农村治理，都显示了“强人效应”的存在。我们在江苏也发现，江苏干部的经济意识是非常强的。即便是宣传部门的干部，在聊到经济指标、产业配套、农村发展等议题时，他们都非常有思路，甚至很多干部本身就是经济部门出身。我们到社区、乡村接触到的基层干部，也能感受到他们有比较强的“强人特色”，具有比较突出的个人能力和执行力。

这里也有两个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就是要怎么去找到这种“能人”、“强人”。比如刚刚提到的乡村干部，他本身是做水产生意的；那位社区书记，也是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都是入党之后，被组织调任到基层去负责工作的，其实这也是现在党在基层选拔和使用干部的一个过程。当然，他们也在愁一个问题：未来这些“能人”从哪里找？毕竟现在农村空心化比较严重，人才流失严重。他们有一个思路，就是未来可以从党政系统的退休干部里面去找。因为这些退休干部本身有一定的能力，也有组织经验，也许会成为未来基层负责人的一个备选来源。

第二个，是要允许“久久为功”。我们看到像马庄村、文昌社区，它们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在本地扎根十几二十年。他们非常熟悉本地情况，也有稳定的人脉资源能够推进工作，他们也有长期发展的思路，能够一以贯之。如果三五年就换一个领导，很多事情刚规划完就换方向了，那发展思路再好、规划做得再好，都会前功尽弃。

其实，除了上述“能人治理”之外，“如何留人”也非常重要。现在落后区域、欠发达区域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就是怎么把人留下来。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江苏的协调发展，非常注重优质生活的平权。比如，我们去了一家乡村卫生院。他们通过远程医疗连接三甲医院的专家，而且当地做的一些基本检查，省内其他医院也可以互认，江苏的医保卡也可以直接在上海使用。长三角在公共服务上的互通上，已经比广东省要快。这种公共资源的互通，能够让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更容易留住产业、留住人心。

第三个要素就是“机制”。江苏和广东都有“产业帮扶机制”相关机制，但江苏起步更早。江苏早在1984年就启动了对苏北的帮扶，广东大概是2008年才启动“双转移”。而且，江苏的机制并不是简单地做财政转移支付，而是通过多年探索，形成了如“五方挂钩机制”、“南北共建产业园”等具体抓手，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共建产业园中，形成了“三为主、三到位”的机制，即共建过程中是以苏南的人员、资金、项目“三为主”，而苏北则负责当地的规划建设、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三到位”。这就相当于经济发达地区派出它的管理团队，带着企业资源、招商网络和管理经验，一路带到被帮扶区域。最典型的就是苏州的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它实际上就是把苏州的治理模式和产业生态复制到苏北。

我们也走访了粤东粤西的地区，也跟他们的帮扶区域沟通过。我们发现，广东整体的帮扶机制尚在探索中，很多区域还是停留在资金援助和联合招商层面，只是为了完成考核任务的要求，即每年给对口地区多少钱、联合招商落地多少个企业，就算完成任务。在这种逻辑下，帮扶方很少进一步设计机制，也就无法实现“先进地区”经验向“落后地区”的转移。当然，也有部分做得好的区域，但整体经验尚未总结扩散。

此外，我们还看到江苏有一些制度设计，可以实现持续性的帮扶。比如，省里通过指标分配来变相调节。我们在无锡调研时，他们提到没有太多土地，但仍需要完成农田指标、养猪指标，因此他们把钱给到连云港，让连云港帮他们完成。这其实是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双方各取所需。

另外，可能也因为江苏整体面积较小、区域差异相对有限，所以它基本上采用的是“一对一结对”的模式；而广东基本上是“一对多”，5个城市承担了帮扶工作，而被帮扶地区却有12个，如广州要帮扶3个城市，深圳帮扶4个城市。这种“一对多”的帮扶模式可能导致一些区域出现重复布局的问题情况，这就使得这些被帮扶地区难以充分发挥各自区域的实际优势。

除此之外，我还想分享江苏调研中提到的一个淮海经济区的案例，未来我也很希望进一步研究。淮海经济区以徐州为区域中心，它处于“四省通衢”的位置。现在，这个区域已经打通了公积金和医保的部分互认机制，并且是跨省打通的。这导致目前徐州大约有三分之一的

住房来自外地人口；医院的就诊患者也有大量的跨省病患前来。我们很好奇的是：它是如何实现这种公共财政承担机制的？如何实现跨省协调？这是后续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对未来广东和江苏、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的联动也具有借鉴意义。

蒋余浩（IPP 资深研究员、教授）：

广东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确实需要向江苏学习。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广东现在看起来“差”的那些地方，可能恰恰是曾经的发展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发展模式就非常适合快速承接外部转移，包括港资、台资、日资企业的产业转移。正是因为能够迅速承接这些外来的产业和需求，广东才得以在当时实现快速发展。相比之下，江浙一带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广东快。这当然也和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条件有关：江浙地区过去已经具备了较好的集体经济根基，因此在后续发展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广东的路径。如果一定要做比较，广东佛山的顺德与江浙较为接近，都是由本地企业家推动产业发展；但广东其他不少地区则不同，许多产业是由外来的企业家在当地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几十年过去后，这种优势开始发生反转。现在可以看到，像珠三角的佛山、中山，这些年正为清理旧工业园区而感到巨大压力；而江浙一带则较少面临类似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仍然保有较强的集体经济根基有关，这种根基令其在转型过程中“撑得住”。因此，如果只是做横切面的比较研究，仅仅因为当前江苏的发展数据优于广东，就简单地把因果关系顺着数字往上套，这样的分析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理解不同地区的发展路径，仍然需要引入更长的历史脉络。

徐工、中船、华润微电子等案例，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国企。反观广东，即使广东也有不少国企，但很少看到这些国企像江苏那样，能够在自身发展之外带动更大范围的产业体系发展。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切入点。这也让我联想到日本丰田早期的发展模式——丰田虽然高度“纵向一体化”，但在保持体系控制力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大量中小企业。

“纵向一体化”本身并不是问题，大企业做大后必然走向体系化。关键在于，这个体系能不能“打开”，带动上下游大大小小企业一起发展？郑永年老师之所以提出“开源中国”概念，核心正是在这里。这样的管理体系，能否实现不同的管理方式，能否转向“面状扩散”以及这种扩散机制如何实现，本身就值得深入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我对江苏的国企、大企业发展状况了解有限，但确实我们的许多企业难以带动上下游共同发展，这也是我们许多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刚才也有老师提到关于“强人”和组织化的问题。从研究角度看，我觉得这里需要保持一定谨慎。

在目前的条件下，“组织化”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如果上级没有施压，很多干部其实愿意服务社区、办实事；但一旦“大共同体逻辑”与“小共同体逻辑”发生冲突，在这种结构下，小共同体就往往要让位于整体。因此，如果将“组织化资源”作为研究课题，就不能只看到其正向功能，还要看看在特殊时期出现一定冲突时的表现。其实，就算是主张大共同体本位的组织化建设逻辑，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来为基层、小共同体发出声音提供保障的。

关于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学者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当年北方“南下干部”进入江浙地区后，为了让本地的原有干部退出权力中心，就对当地人经商，甚至部分“灰色行为”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这反而激活了地方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广东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没有受到过于强烈的“大共同体逻辑”压制。中央整体上是支持广东发展的，当然这种支持在不同地区并不均衡，部分地方也曾因为历史因素的限制而长期发展乏力。

最后一个想谈的，是广东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用郑永年老师的话说就是一种“马铃薯式的松散结构”。一个现实的张力在于：省级层面希望强化统筹能力，资金自然需要更多上收；但资金收上去之后，地方反而更分散了。这其中的机制逻辑究竟是什么？

12月4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从制度设计上看，提出了不少方向性安排，例如推动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分别成立共同规划委员会。从体制机制上来说，我们的制度安排已经很充分了，但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广东真正地“拢”到一起？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深入探究的一个问题。

*以上内容由编辑根据现场发言记录整理，内容有所删减。发言仅代表研究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AI 泡沫”，要爆了？

——IPP “AI 泡沫论” 内部研讨会实录

（12 月 4 日）

主持人：张心旂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与谈人：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戴明洁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李品保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区富祝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庄文越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导语

近期，全球资本市场关于“AI 泡沫”的讨论再次掀起热潮——资本市场的高歌猛进与预期回报之间的巨大落差，正促使各界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与潜在风险。

针对这一热点话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近日举行了“AI 泡沫”专题研讨会，戴明洁、李品保、区富祝、庄文越、蒋余浩等多位 IPP 研究人员从资本逻辑、产业应用与政策治理等不同维度切入，对这场技术热潮的结构性风险与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

在资本市场的 AI 热潮之下，是否存在着结构性风险？面对美国高强度的 AI 投资周期，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否会受到影响？随着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的，我们又该如何辨识真正的发力点，让 AI 真正释放生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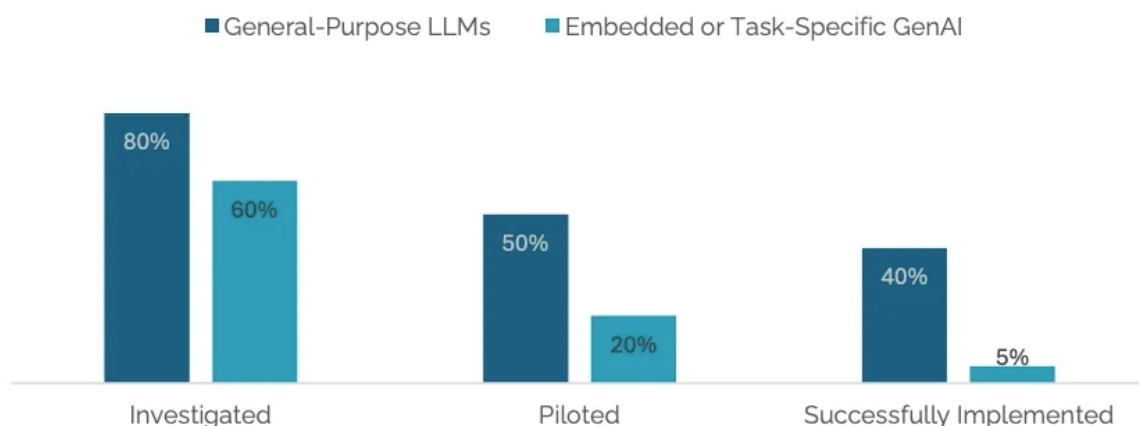
“IPP 评论”特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提炼，以供各位读者参考。

张心旂（主持人）：

近期媒体上关于“AI 泡沫”的讨论持续升温，有几组数据尤为引人注目：2025 年，全球 AI 风险投资已经达到 1927 亿美元，占全球风投总额的 53%。这也是 AI 投资占比首次、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突破 50% 的关口。与此同时，10 家尚未盈利的 AI 独角兽在过去 12 个月里的估值合计暴增 1 万亿美元；英伟达的市值更是在 10 月 29 日突破 5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首家达到这一高度的上市公司。

但与这些亮眼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投资回报率上的冷酷现实。麻省理工学院（MIT）近期发布的《生成式 AI 鸿沟：2025 年商业 AI 现状》报告显示，尽管企业在生成式 AI 领域投入了 300—400 亿美元，但 95% 的组织尚未获得任何实质回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17 世纪的郁金香泡沫——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首次金融泡沫。

Exhibit: The steep drop from pilots to production for task-specific GenAI tools reveals the GenAI divide



企业在生成式 AI 上“兴趣高，落地少”。任务型生成式 AI 工具从试点到实际部署的成功率会由 20% 跌至 5%。图源：MIT, The GenAI Divide: State of AI in Business 2025.

然而，从技术演进的长周期来看，无论是蒸汽机还是互联网等颠覆式技术，都曾伴随着资本的集中涌入，并出现阶段性的泡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近日也表示：“我不太担心泡沫，我称之（当前 AI 领域的投资热潮和股市狂热）仍是一种‘理性泡沫’。”

那么，当下的“AI 泡沫”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与历史上的其他技术泡沫有哪些相似与不同？从资本、国家以及产业的视角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 AI 发展又面临哪些潜在风险？这个泡沫究竟更多是一种“好的泡沫”，还是“坏的泡沫”？我们又应当如何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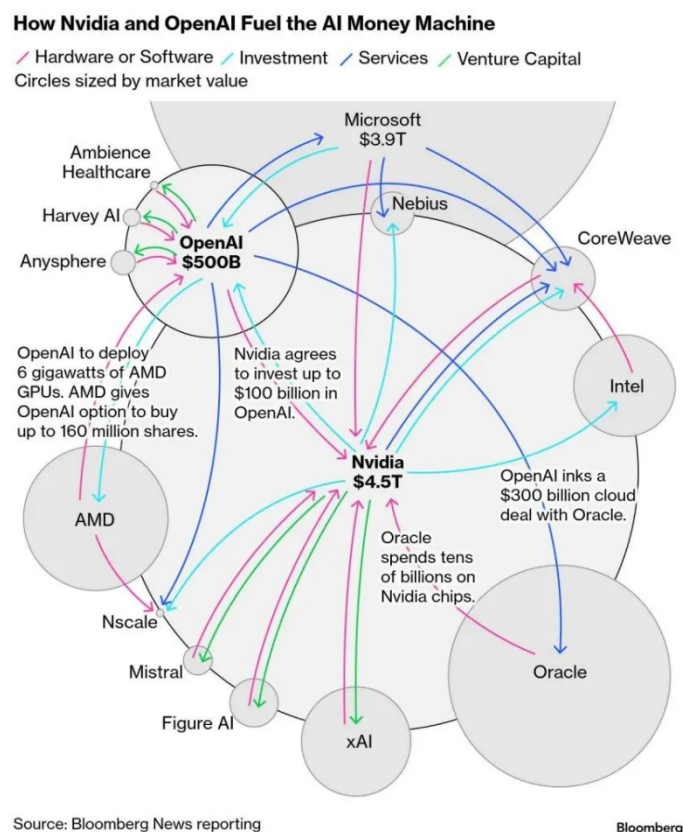
美国“AI 泡沫论”的产生及其背后的利益驱动力

戴明洁:

自从 2022 年底 ChatGPT 发布以来，美股尤其是科技企业的市值持续上涨，AI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但在过去三年里，“AI 泡沫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中爆发。那么，为什么 2025 年下半年这一话题突然引发了如此强烈的讨论？除了主持人刚刚介绍的数据之外，我认为还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与过去科技公司估值和股市上涨的情况不同，这一轮美国科技巨头之间出现了一种“投资内循环”的模式。

2025 年 10 月，彭博社发布了一张非常流行的图，展示了美国当前几家科技巨头之间内部资金链的网络结构（见下图）。这个网络以英伟达为核心，连接着甲骨文、微软、OpenAI、xAI、晶片代工厂以及一系列风险投资机构。



图源：彭博社

它们形成的资金“内循环”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逻辑：首先，三大云厂商——亚马逊、微软和谷歌——向英伟达采购芯片；之后，AI公司向云厂商租用算力；AI公司因算力储备更容易吸引风险投资；最后，AI公司再用这些资金支付云厂商算力租赁费用。

也就是说，通过交叉投资、订单捆绑等方式，他们构建起一个短期内能显著推高参与者估值的利益联盟。这样的模式有一个核心特点：它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营造出持续增长的预期；但与此同时，这也可能掩盖了这些厂商并未创造出真实价值的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AI融资结构正在从股权投资向债务投资转型。2025年，美国企业已发布超过200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用于资助AI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债权与股权不同：它更容易被杠杆放大，更加不透明，也更容易被用于结构化包装。例如，部分债务会通过ABS（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进行再包装。这样的融资模式，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美国AI投资迅速膨胀所带来的泡沫化倾向。

第二，与美国政府的推动高度相关。

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开启以来，一直在推进一个类似“AI大基建”的计划。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联合OpenAI、软银、甲骨文宣布投资5000亿美元建设5座AI数据中心——他称之为“星际之门”（The Stargate Project）项目；2025年7月，美国发布AI行动计划（AI Action Plan），将AI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作为三大支柱之一；最新的例子是2025年11月刚刚发布的“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行政令，仅AI实验平台首期建设预算就将超过200亿美金，未来五年相关投入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这些计划都在AI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了高度关注，为AI行业高估值和高杠杆提供“隐性担保”，进一步推高了AI投资规模。

相较于这轮“AI泡沫论”如何形成，更关键的是分析其背后的利益驱动力。目前AI投资热潮的出现，更多反映出是科技巨头和美国政府在科技发展和经济前景方面的多层次焦虑，这种焦虑使得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将AI视为一种“战略性工具”，而非对人类未来有共同影响的“创新公共品”。

科技巨头的驱动力在于抢占AI技术主导权的迫切需求。为了避免在新技术周期中被边缘化，他们必须紧跟这一轮科技浪潮。在硅谷，这种焦虑被形容为一种“FOMO”心态（fear of missing out——“错过即出局”）。他们宁愿选择投资过度，也不愿意成为AI时代的“诺基亚”。甚至有人说，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的代价远远高于投资过度（overinvestment）。

另一方面，像OpenAI这样的企业，也在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对美国“大而不能倒”的企业，从而借助这种战略地位来保护自身、巩固影响力。

对美国政府而言，科技企业推动的 AI 浪潮对特朗普政府同样有显著的利好，这也促使双方更多形成一种“利益联盟”，既共同推动 AI 泡沫的膨胀，也合力阻止泡沫的破裂。美国政府的驱动力主要三个层面：

首先是基建。特朗普推动的制造业回流计划，迫切需要对美国的电网、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建设。但是由于美国长期受到产权、环保、劳动力等方面的制约，其基建改造一直难以推进。如果 AI 的叙事能够深入人心，就可以借助数据中心建设，带动一场“新时代的大基建”，从而显著拉动 GDP 增长。有一位哈佛经济学家预测，如果 2025 年美国没有数据中心建设，美国上半年 GDP 增速可能不足 0.1%。

其次，AI 对美国股市的繁荣和吸引全球资本具有重要意义。数据显示，过去三年标普 500 的 AI 板块相关盈利增长达到了 124%，但如果剔除 AI 板块后，盈利增长甚至不到 10%。可想而知，如果没有 AI 叙事或者 AI 泡沫走向破裂，那么美国股市的繁荣以及资本流入都会面临较大冲击。

再次，是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从而缓解美国政府的债务压力。随着美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债务压力，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努力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率。从整体上看，降债无非两条路：要么减少开支，要么推动经济增长。前段时间，高盛 CEO 就指出：在 AI 的驱动下，美国通过经济增长而非削减开支来化解美债问题的可能性正在不断提升。但我也注意到，他在报道中也非常隐晦地提醒：如果美国仍然延续当前的 AI 发展思路，不能解决 AI 投资与产出脱节的问题，那么 AI 对削减美债的实际作用也不会太大。

AI 热潮是另一个科技泡沫吗？

李品保：

我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当前 AI 热潮是否符合历史上科技泡沫的“标准配方”？第二，如果符合，应如何理性应对？

我先给出结论：当前 AI 热潮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上科技泡沫的经典特征，但最终是否会演化为泡沫，目前尚难断言。

所谓“泡沫”，指的是价格与投资在短期内剧烈上涨，严重偏离其真实价值与盈利前景，最终往往因资本过度涌入和诱人叙事而破裂，导致财富大量蒸发。

历史上典型的科技泡沫有三例：

一是千禧年互联网泡沫。当时的新兴科技公司，只要名字里加上“.com”，基本就能获得资本的青睐。在估值飞涨后，泡沫最终破裂，结果表现为纳斯达克指数暴跌超70%，市值蒸发超5万亿美元。但谷歌、亚马逊等真正有实力的公司得以生存。

二是2017年前后到2021年左右连续几轮的加密货币泡沫。特点为散户大量参与、高杠杆与情绪化交易，波动极大。例如在2025年12月的一次事件中，加密货币市场在24小时内爆仓金额就达到约10亿美元。我们甚至见到，有一些在市场非常活跃的大佬，最终也因爆仓或其他原因走向极端。

三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科技泡沫。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在2021年出现大量资金涌入、估值暴涨。但最终的结果也是在之后一两年间出现超过30%的跌幅，股市蒸发的规模也达到了万亿美元级别。

我们自身也经历过一些类似的泡沫。如2010年左右的互联网创业潮、2014—2015年的共享单车热潮，最终都是只有少数企业存活下来。

这些泡沫表面各异，但存在四大共性：

第一，核心驱动逻辑相似：均由“革命性技术叙事”引爆，如互联网、区块链，被赋予巨大产业潜力，吸引大量资本与散户涌入。

第二，市场行为模式相似：新概念驱动并取代旧逻辑。传统市场的估值逻辑，比如盈利能力、现金流等指标，往往被抛诸脑后。在互联网泡沫时代，大家看的是网站的点击量；到了区块链时代，看的是“总锁仓价值（TVL）”，等等。此时，投机行为远超现实基础。

第三，破裂机制相似：多与流动性逆转相关（如美联储加息），或增长放缓暴露盈利模式不可行，之前“吹下的牛”无法兑现，导致估值崩溃，最终泡沫被刺破。

第四，监管“真空”或滞后：我们会发现，法律或者伦理框架几乎每次都跟不上技术狂奔的步伐，因而监管多为“事后补救”。

对照当前AI热潮，这些特征高度吻合：

第一，AI毫无疑问是一种颠覆性技术。其具有巨大产业潜力，叙事充满革命性。

第二，投机再次领先现实。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伦德指出，2025年AI领域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但实际回报尚未显现。例如，OpenAI常处于亏损状态。

第三，就是所谓的“估值玄学”。估值逻辑脱离传统指标，转而关注模型参数规模、AI科学家数量、训练数据等。我们是在“赌这些数据”，而不是按照以往金融投资的传统指标去进行评估——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投资模式。

第四，“AI+”概念泛滥。类似当年“.com”“区块链”热潮，现在只要加上“AI”，就会带来一系列类似的热潮。与此同时，监管也在奋力追赶，这是我们正在看到的现实。

当然，有一些特征——尤其是最终破裂机制——目前仍不清晰，我们也不知道它最终会不会以同样方式破裂。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那种“熟悉的泡沫配方”正在 AI 领域中重新调配。

面对可能的泡沫，我们应如何理性应对？我这里提出三个比较“虚”的观点：

第一是聚焦真实问题，而非虚构前景。当我们评估一项技术时，不要被所谓的“革命性叙事”所裹挟，应问：它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是否触及真实痛点？如果是投资者，则需关注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等。

第二是我们常讲的“负责任的创新”。所谓负责任的创新，就是科技伦理中非常核心理念——在技术开发和商业部署的最初阶段，就将伦理考量和社会影响前置，而不是等问题出现后再去补救。好的监管并不是创新的敌人。我们现在经常害怕监管太严、影响创新，但现实情况需要依据不同领域和行业进行具体分析，像 AI 就远远跑在监管前面，问题不是“管得太严”，而是“来不及管”。

第三，以“长期主义”对抗“短期狂热”。科技发展是马拉松，非百米冲刺。记得在大概 2016 年夏季，我的室友对还在考驾照的我说：可能我们大学毕业之前，自动驾驶就已经普及，根本不需要考驾照了。但事实证明，近十年过去，我们依然需要自己开车。所谓的 L3 或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远未达到资本当年吹嘘的落地效果。换言之，技术的真正到来往往比预期缓慢得多，而资本的故事又往往比现实跑得快得多。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重复。我们讨论所谓的泡沫，并不是为了唱衰某项技术，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坐在一起，通过跨界讨论来更理性地看待这场浪潮。我们需要各界群策群力，引导这股强大的技术变革力量，最终能够平稳度过可能出现的泡沫周期。

“AI 结构性泡沫”风险与治理路径

区富祝：

我们首先要明确，AI 的技术价值确实存在，而且潜力可能非常巨大。但现在它的商业节奏变化得非常快，而未来现金流与产业转化的效率又还没有达到能够跟上这种节奏的程度，因此很难对它当前的价值做出准确评估。也正因如此，它不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那种单纯的“泡沫”，而更像是一种“结构性泡沫”。

我认为当前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远远大于以往，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较高，市场估值能够更有效的调整，“AI 泡沫”加剧或者破灭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当前泡沫的本质风险是什么？我想从资本结构来解释：即头部企业与尾部企业的融资性质完全不同。

像英伟达、谷歌这些头部企业，它们的融资是对冲型的，市盈率也保持在一个健康区间，因此能够实现稳定现金流、盈利能力强、风险较低。然而，大量初创企业则属于投机型融资——它们的融资规模最多只能覆盖算力成本，而商业模式尚未落地。至于最尾部的企业，则呈现明显的“庞氏型”融资特征——没有明确收入来源，完全依赖持续融资维持运营。

目前，A股中许多AI公司的动态市盈率已经达到了100倍甚至200多倍。反观美股，头部公司如英伟达、微软的市盈率大致维持在40倍左右，相对更为合理。所以，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当前的AI投资，尤其是国家对于AI基础设施的投入，能以多快的速度被兑现？这是判断当前“结构性泡沫”能否实现“软着陆”的核心。

眼下，关于AI投资的兑现，我认为存在以下几个堵点：

第一，市场上的企业，尤其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在智能化转型上的内生动力不足，投资决策偏保守。

首先，当前的智能化改造技术成本仍然较高，投资回收周期长。中小企业对于未来收益存在较强不确定性，因此做出投资决策时会更加谨慎。

其次，技术成熟度仍未跨过S型扩散曲线的拐点。从技术成熟到被大规模采用，本身是一个典型的S型曲线。目前AI技术很可能还停留在S型曲线前端的“平缓区”，尚未真正跨过拐点。只有跨过拐点之后，才会迎来大规模推广和应用。也就是说，在拐点到来之前，大部分企业还没有真正尝到技术带来的“甜头”。

再次，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价格机制作用。不是所有生产环节都值得企业投入AI，因为这本质上属于资本性投入。如果企业雇佣劳动力、培训员工并支付薪酬的成本低于采用AI技术的整体成本，那么企业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前者，而不会主动投入AI改造。

第二，技术成熟度和流程标准化不足。

许多行业的流程尚未标准化，而AI模型本身如果缺乏标准化，就很难大规模推广，也很难实现真正的端到端落地，从而降低了智能化升级的效率。

第三，信息不透明，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高质量的AI产品与服务成本较高，在市场上反而不容易被采用；而低质量、低成本的方案却充斥市场，但实际不能产生真正的生产力提升。例如，某些服装行业企业在进行智能化改

造时，被认为是“圈钱”，一部分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遇到的 AI 服务或技术并不能带来实际的生产力的提升。

因此，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路径着手突破：

第一，突破现有技术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赋能的堵点。

一方面，要加强技术真实性披露机制和行业准入标准。提升 AI 模型能力宣传的规范性，防止低质量方案依靠营销和低成本手段占据市场，从根本上扩大高质量技术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要从规模效应与规模经济角度切入，降低技术成本。通过上下游产业链集群建设，例如共享智能化生产车间，让企业可以采用“按时计费”的方式，将原本的资本性投入转化为服务性投入，从而实现更加轻量化的应用路径。

第二，在技术落地方面，要推动技术与产业需求的适配，而不是技术先行、产业被动适应。

技术的改进本应根据产业的实际需求来推动，而不是“我有了一项新技术，产业就必须采用”。中小企业在采用大模型时面临很多具体困难，某种程度上说明当前技术尚未完全适配产业场景。因此，可以推动行业专用模型、小模型的发展，以提高性价比，增强 AI 技术在行业落地的效率。同时配套采用轻量化策略推进应用。

第三，从资本市场角度，要强化信息披露和风险治理，避免投资过热。

一旦泡沫破裂，对整个产业和整体经济都会带来冲击。当前传统投资乏力，内需不足、外需承压，新一轮投资又集中在 AI 领域，因此更加要谨慎避免泡沫破裂。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必须跟上 AI 的发展。

例如，训练数据来源、企业算力成本与推理成本、投入产出比与投资回报率等，这些关键指标都需要系统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投资过热的风险。基于这些指标，还可以监测模型效率、估值偏离度、融资增速等关键数据，构建一个 AI 板块专门的投融资监测体系，作为风险治理的抓手。

美国 AI 泡沫论对中国的影响

庄文越：

首先我想先给出一个结论：中国的 AI 整体产业发展路径与美国完全不同，因此美国当前面临的那种巨额投资规模带来的风险、债务压力以及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泡沫化舆论，并不是中国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坚定不移地依托千行百业，把“人工智能+”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之中。

美国是一种典型的科技巨头主导型路径，依靠“力大砖飞”的方式，追求绝对技术领先和对竞争者的碾压。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发展方式，就是花大钱豪赌：无论是大模型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它就是要建更大的算力中心，追求更高的算力，做参数规模和模型精度都更高的系统。

但中国不是这样。原因非常现实：第一，在 AI 起步阶段，中国在技术上，包括芯片等关键核心部件，都明显落后于美国。第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无法采取美国那种“豪赌式”投入。第三，我们的比较优势并不在模型本身，而在于最广阔的应用市场潜力以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应用落地，叠加中国特有的政策体系与决策机制。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走出的是一种更加务实、讲性价比、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这也决定了，中国在 AI 领域的投资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的高度集中。目前，中国 AI 对整体股市表现的影响不到 10%，市值贡献甚至不到 3%。这已经算是很高的影响力了，但与美国相比仍然有明显差距。这也说明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点：中国的突破方向主要在于应用端，而不是大规模豪赌基础设施或模型规模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 AI 泡沫论对中国的影响更多是积极的。美国现在也在试图挤掉虚假叙事，强调关注真实产出，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一些中国 AI 企业的估值甚至比美国头部企业更高，这并不是技术能力更强，而是结构性泡沫的表现。

因此，中国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与其说是“如何避免美国式泡沫”，不如说是“如何推进中国式 AI 发展”。正如刚刚欧博士与李博士所提到的，我们要思考如何推动 AI 进入千行百业，尤其是推动中小企业应用；另一方面，也要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既能给予安全与伦理边界、又能支持多路线技术探索的监管体系。

如果为了“提前完善监管”而设计过于僵硬的制度，可能会走向欧盟的道路——上层建筑很完美，但抑制了创新活力。当然欧盟这样做有其背景，是为了平衡大国科技企业对其内部市场的冲击，但中国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制定一种监管模式，既明确安全伦理边界，又足够灵活，能够保障多方向、多路径的技术探索。

“中国 AI 如何实现包容性？”

蒋余浩：

先说一下，人工智能到底算不算泡沫？技术要进步，就需要大量资本去推动；又因为资本天然逐利，因此资本都不可能只投向真正“有用”的技术。从这个角度讲，似乎也不必对“泡沫”这个状态过于敏感。

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上每一轮新技术出现后的“是否有泡沫”争论，关键不在于泡沫是否存在，而在于泡沫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我们本来应该珍惜的东西——包括某些生产方式，甚至较为传统但仍有价值的生产方式——被这股技术浪潮彻底冲刷掉了？

比如“技术多元化”这样的概念，本来意味着技术发展不是一条线性的路径，而是多路线并存的；但在强资本驱动、强叙事驱动的泡沫中，技术路线会被单一路径推着走，而那些本应保留下来的多样性，可能就被无声无息地冲刷掉了。

第二个问题是：无论泡沫最终是崩溃也好，还是软着陆也好，它终究会过去。关键是——泡沫退去之后，它真正留下了什么？而这些留下的东西，与泡沫前期所讲的那套宏大叙事是否真的有关？

大家都提到 2000 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当时的故事讲得很美：互联网将让每个人获益，每个人都能发声、创造价值。泡沫破灭后，表面上的确实现了一些进步——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全民接入，每个人确实获得了更丰富的信息，也确实拥有了更多表达空间。但同时，它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监管结构？有没有改变权力结构？似乎没有。甚至在很多方面，互联网让财富集中度更高，让贫富差距更大，让平台权力更强。

因此我认为，讨论 AI 泡沫时更重要的是回到两点：

第一，我们珍惜的某些东西是否在这一轮泡沫中被冲刷掉？

第二，泡沫消退后，我们真正希望它留下什么？

美国现在最吸引眼球的，是那些由少数科技巨头所推动的技术迭代，但实际上美国社会非常多元。它内部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发展路径，例如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人推动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改革，其中甚至包含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构想。这些想法是否能够最终变为现实政策还很难说，但它说明美国社会的道路并非单一，因此判断美国模式时不能只盯着巨头的那一条路径。

聚焦到中国的应用型人工智能政策。从中央政策的表述来看，有很多内容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挖。我们需要思考：有哪些配套性制度可以与中央的政策相衔接，从而更好地推动政策落地？在整个政治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些政策很容易在执行端被“变形”，这也确实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里也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人工智能”这个词本身具有高度包容性，它不仅仅是“深度学习”这一类技术的代名词，而是包含许多方向的，例如脑机接口、人机互动、无人机等技术

都归属于该范畴。因此，政策表述中的人工智能，天然需要与各种实体制造工艺深度结合，而不是作为一种孤立的产业而存在。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在现实中是否已经能够真正实现“赋能千行百业”？许多调研报告都显示，目前 AI 技术距离真正实现赋能千行百业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现在外界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的舆论，我们也需要具体分析：AI 到底在取代哪一类工作？

从现有证据来看，AI 的替代能力仍然没有突破十年前的结构——也就是“波兰尼悖论”（Polanyi's Paradox）所揭示的现象：高技能岗位与低技能、体力型岗位都很难被技术完全取代，反而是中等技能的岗位更容易受到冲击。这说明 AI 的赋能效果、产业渗透能力与政策所期待的那种“大范围改造”之间仍有差距。

但深度学习类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也带来另一个作用——它不仅是单纯的“替代性工具”，还可以作为“增强性工具”。这一点在实证研究中其实对政策提出了要求：对于那些与人工智能存在较为明显替代关系的中技术岗位，我们应当鼓励什么？是鼓励企业直接用 AI 替代这些岗位，还是鼓励企业在采用 AI 的同时，帮助这些中技能岗位提高生产率？这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方向选择。

除了替代关系，我们还必须考虑人工智能技术下一步该如何发展。是否继续沿用当前这条路径？现在的路径明显偏向于自动化、偏向于强化监管。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被资本或大型企业完全主导，那么无论是深层次人工智能还是其他技术，它都会更加倾向于满足管理者的需求。

上次我在调研时就看到一个例子：某企业开发了一套数字系统。员工不需要再手动打卡，只要进入区域系统就能自动识别。老板坐在办公室里一点开系统，就能看到员工数字人的状态。但问题也在这里：如果人工智能完全沿着“自动化—监管”这条路径发展，那么自动化和监管的力度会越来越强。但这种方向对于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离散型生产企业、非标化企业——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这就引出我下面的问题：人工智能下一步的发展，究竟要如何才能真正帮助这些离散型、非标化行业？这才是我们在政策和产业层面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常提到的：如何把科研人才、科研资源，与企业的具体需求、具体应用场景结合起来？如何让科研资源真正进入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题，提升它的竞争力与生产规模？这才是人工智能政策的“政策指挥棒”应当指向的方向。

中国目前的政策表述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一思路。比如中央提出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又比如强调通过“场景应用”来牵引技术发展。这里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非线性创新”的发展思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支持的。

最后，我想再提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要推动人工智能朝更加包容性的方向发展，以避免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那种泡沫化倾向。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如何让人工智能真正实现标准化、体系化，使其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去支撑千行百业的发展。

我们一直强调，人工智能要按照千行百业自身的发展需求来发展——但前提是：千行百业本身必须有发展需求。如果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金融炒作，大家都倾向于走轻资产路线，那自然不会对实体产业的技术升级提出什么特殊需求；实体经济的创新诉求也就无从产生。

同样，如果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内需无法拉动，那么千行百业为了生存，只能勉强维持，根本无暇顾及技术创新、转型升级这些事情。他们只要能“活下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此，关键问题其实在于：如何通过资源调整把内需拉动起来，让千行百业真正获得发展的空间。只有当产业自身有了发展的余裕，它才可能向政策端提出创新诉求，也才会有动力去推进技术升级、人工智能赋能等发展路径。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去讨论应建立什么样的治理机制、政策环境，来使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至于走向“坏的泡沫”，而是走向健康、可持续的方向。

*以上内容由编辑根据现场发言记录整理，内容有所删减。发言仅代表研究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构成政策和投资建议。

中国如何突破“中等技术陷阱”？

——IPP 第四期未来论坛专题讨论文字实录

（2024 年 5 月 18 日）

严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赖格（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副研究员）

黄紫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研究助理）

吴秋菊（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导语

2024 年 5 月 18 日，在第四届 IPP “未来论坛”专题研讨环节中，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与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分别围绕中国技术发展现状、“亚洲四小龙”及拉美国家技术发展历程，对“中等技术陷阱”的形成特征以及突破这一困境的可行路径进行了深刻解读。

中国是否正面临“中等技术陷阱”的挑战？能否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意味着什么？哪些国家曾试图突破这一困境？它们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什么经验教训？

以下为 IPP 第四期未来论坛专题讨论文字实录。

严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各位好！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只有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才能够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和今天要讨论的关键词“中等技术陷阱”有密切联系。

根据郑永年老师团队提出的理念，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先进技术转型的红利期结束之前，仍然没有办法实现既有应用技术的迭代或者原创技术方面的研发突破，那么它的经济就有可能陷入到相对停滞的状态，落入到所谓的“中等技术陷阱”之中。我们要如何突破“中等技术陷阱”？尤其是我们国家目前技术层面的现状是什么？其他经济体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分别是什么？

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我们需要系统的体制设计

郑永年：

我就中等技术陷阱研究现状简单说几句。我们国家现在要从应用技术转向原创性技术。我们回顾一下东亚国家发展历程，日本、韩国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两个国家现代化在起步时都是承接西方技术的应用，但是二三十年以后开始转向发展原创性技术。如果它们不转向，就可能永远需要追逐美国。

对我们而言，真正成为一个科技强国，就需要系统的体制设计。这个世界很现实，科技没有虚假的，落后就是落后，先进就是先进，这是有客观标准的。

中国正处于中等技术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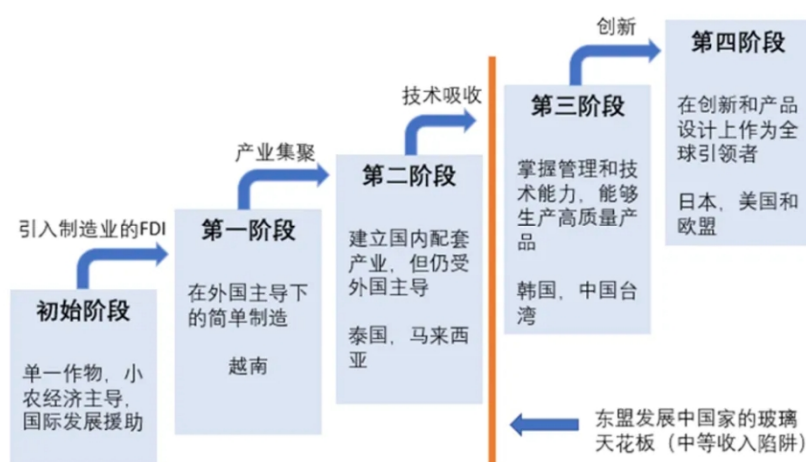
赖格（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各位好！非常荣幸今天来到 IPP 分享中等技术陷阱的系列文章，我将从数据角度来衡量我国的技术水平。

文章文献综述部分是关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背后的技术因素，把技术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来看它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力。实证分析则是专注于我国这个经济体，从三方面进行衡量，分别是研发投入与产出（专利数量）、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技术进步的下一步产业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进一步对产业竞争力进行量化，最后是一些思考和启示，以及未来可以继续研究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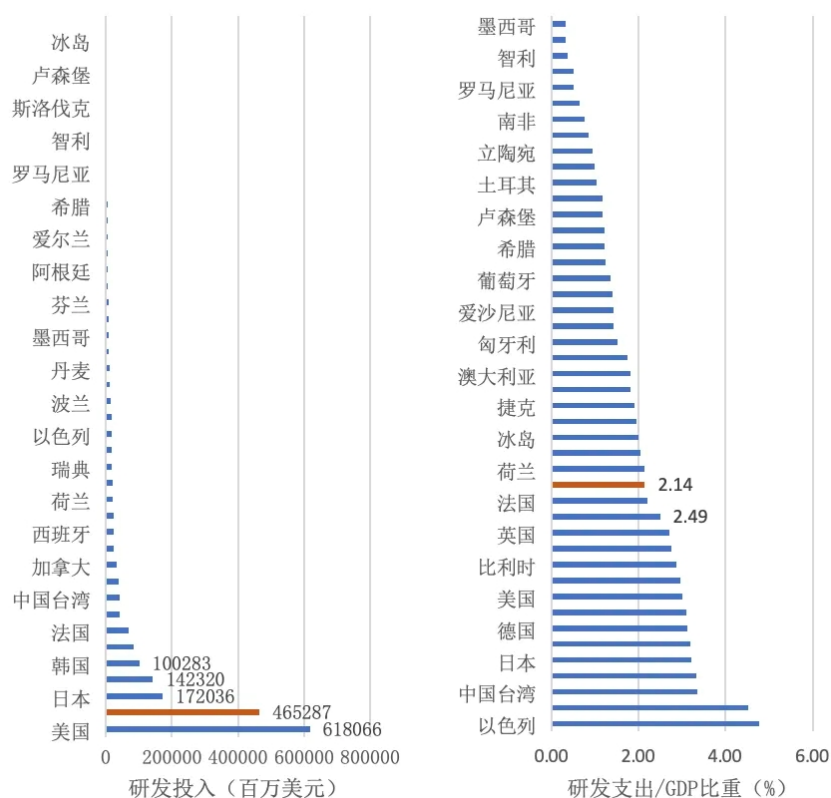
首先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一种收入长期停滞的现象。背后的动力因素除了技术，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变量。我们这篇文章主要是看技术角度。我们提出来的核心问题就是，发达国家

为何能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只能被长期压制在最底端？核心技术作为高度流动和稀缺的生产要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参与方不同的分配利益。在文献中有一些经常使用的概念，比如说微笑曲线（以 ICT 产业为案例研究）、三明治效应（中等收入国家在前面有高收入国家的天花板，下面有一些后发国家的追赶，所以处于被包围的尴尬处境）、经济后发追赶与技术进步。2009 年 Ohno 这篇文章讲的是“玻璃天花板”，这张图里东盟发展中国家的“玻璃天花板”——跨越了前面初始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技术吸收之后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就存在这样的困境。最后是国内的蔡昉教授提出的“比较优势真空论”，这也是一篇经典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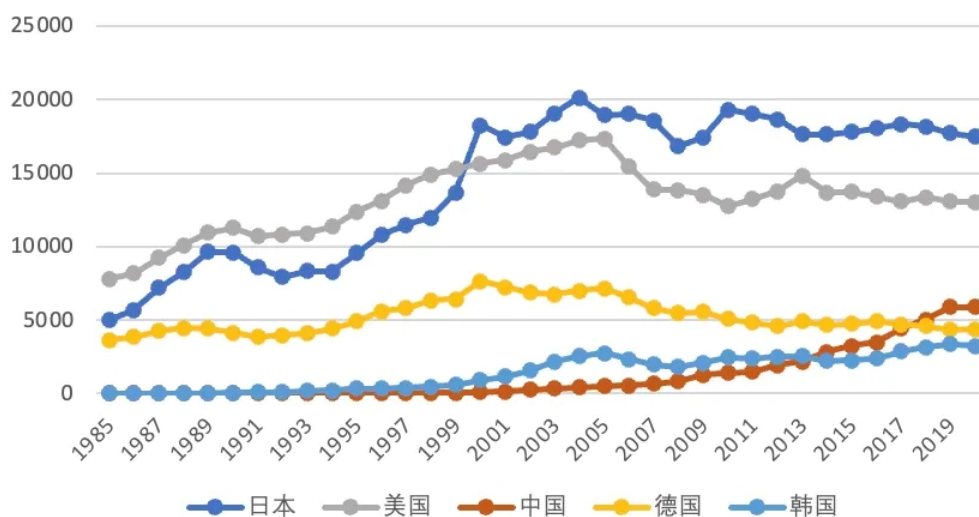
来源：演讲嘉宾 PPT

就数据分析进行说明，首先是研发投入部分，（下图）左边是绝对值，右边是强度，就是和 GDP 的比重。绝对值上中国是第二名，仅次于美国。相对值是 2.14，下面标出来的 2.49 是 OECD 平均值，也就是说我国在强度上比 OECD 水平低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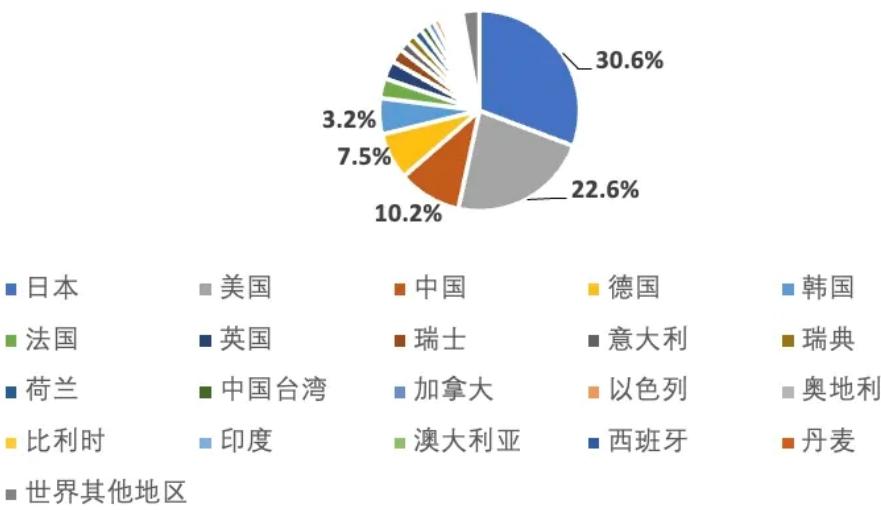
来源：演讲嘉宾 PPT

我列出了前五大研发大国从 1981 年到 2021 年研发投入规模的发展，红色是中国，可以看到有非常明显的跃升。但是和美国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来源：演讲嘉宾 P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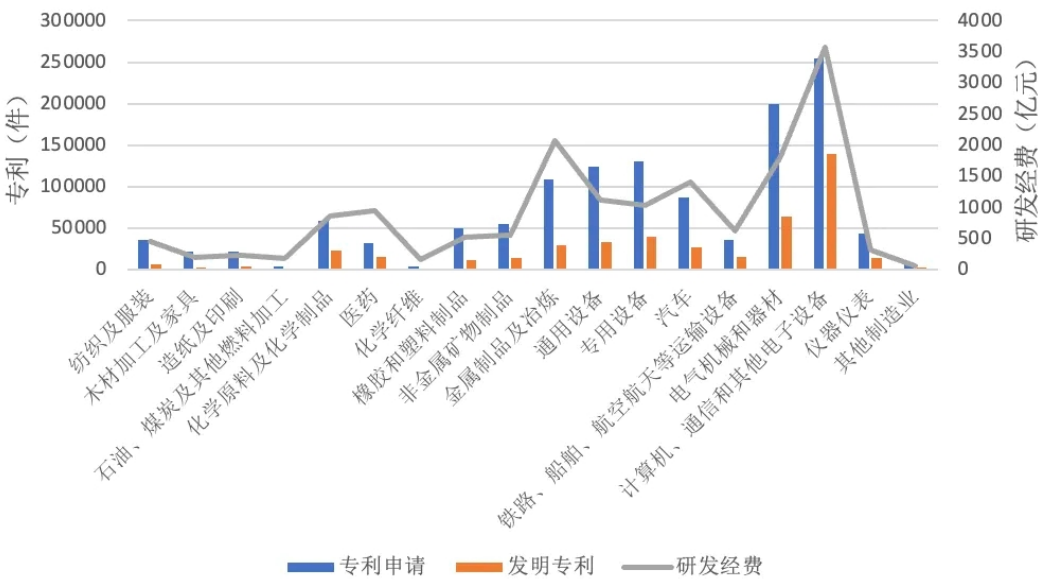
下一部分是专利申请，专利数据是用欧盟美国和中国都有注册的专利，作为专利质量的门槛，如果能够在三个地方注册，就证明它有一定技术含量。红色是中国，占比 10.2%，排在前面分别是美国和日本，下面是时间序列变化，同样红色是中国，前面是美国和日本。



来源：演讲嘉宾 P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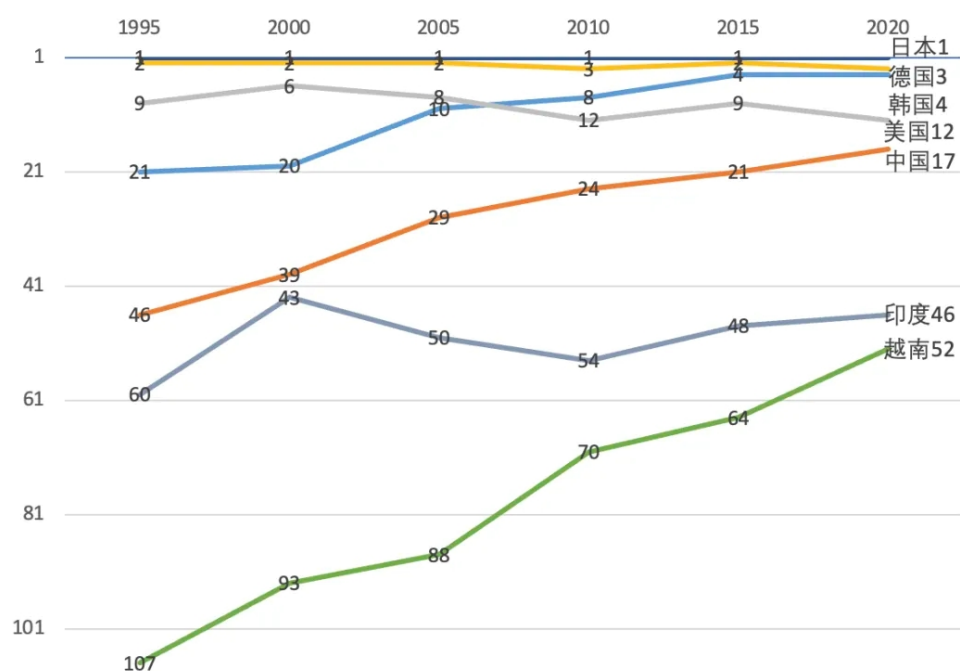
接下来是我国国内的数据，是统计局在 2021 年统计的不同行业的专利和研发经费情况。

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申请专利与研发经费情况: 2021年



来源：演讲嘉宾 P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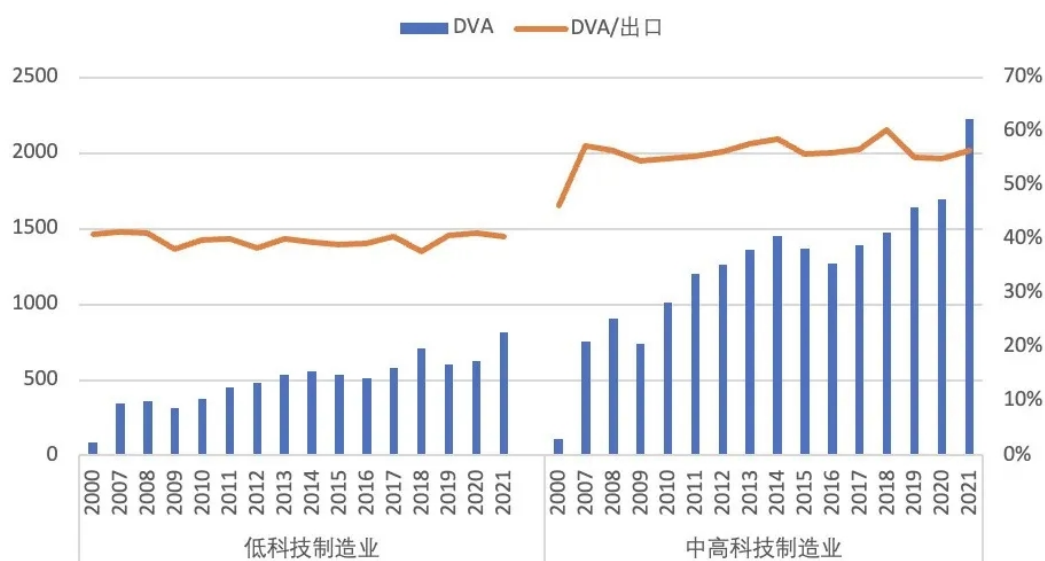
下一个是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比较，第一个指数是经济复杂度排名，我国从 1995 年第 40 名到 2020 年的第 17 名。



来源：演讲嘉宾 PPT

第一名是日本、德国第三名、韩国第四、而美国是第十二。当然我必须承认这里有一些数据误差，因为在美国生产的制造业，有很多美国企业把生产环节外包到全球，这一部分的数据会导致以国别 GDP 为口径时，会存在低估的情况。

第二个指数是不同技术等级的 DVA（国内增加值）以及占比，柱状是绝对值，曲线图是对于出口总量的比例。



来源：演讲嘉宾 PPT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低科技，右边是中高科技。虽然在绝对值上都有明显的增长，但是中高科技明显存量更大，可以体现出我国在这方面的优势。而且对于出口增速其实变化不大，也就是说 DVA 往上提升的速率还没有特别显著。第三部分就是关于显性比较优势，是 DVA 的位置前向与后向，这是 GVC 位置指数，红色是我国，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变化趋势



来源：演讲嘉宾 PPT

最后是我国不同制造业的位置和全球比较优势坐标。简单讲一些思考：目前实证结论，我国还处于第三梯队技术水平。如何突破中等技术陷阱？

第一，科学无国界；第二，发挥创新中心的头雁优势+各地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这种模式可能是突破的路径；第三，基础科学及其背后的人才，除了物质激励，薪资也需要覆盖各项隐性成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这篇文章我们只做了中国这个案例，但是如果从学理上把技术和收入两个变量连接起来，只做中国可能不够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做面板数据，下一步也希望再深入研究。

“亚洲四小龙”应对“中等技术陷阱”的经验

黄紫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研究助理）：

“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相对概念，就算分析过去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不管是韩国、日本、新加坡还是中国台湾，依然也面临着技术进步的困境，但我们从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总结出一些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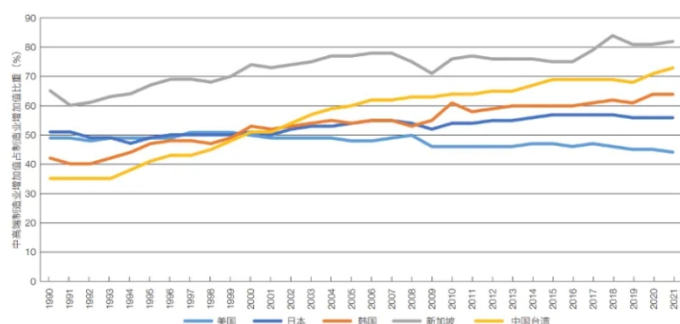
首先从人均 GDP 来看，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就是二战以后开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了人均 GDP 非常快速增长，尤其是新加坡在最近二十年得到了更加快速增长。从中高端制造业占整体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来看趋势，也可以看到中高端制造业在占整体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中，至少都会超过 35% 以上。

1.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ur Asian Economies reaching medium level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iiA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UHK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 There were changing trends in the proportions of middle- and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overall manufacturing in value-added of East Asian econom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 Figure 2 Proportion of middle- and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overall manufacturing in value-added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and Chinese Taiwan from 1990 to 2021 (Data source: UNIDO)

来源：演讲嘉宾 P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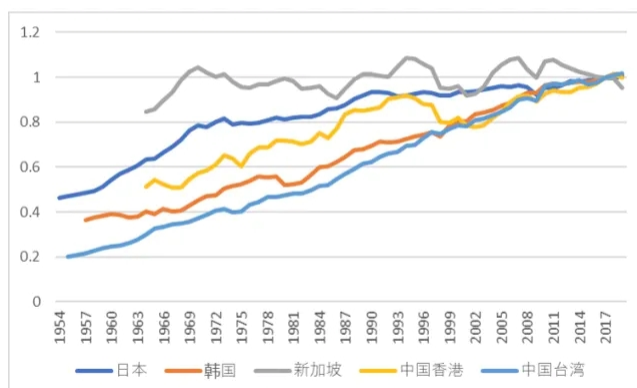
接下来看四个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在五十年代之后发展趋势逐渐趋向于最终超过 1.15 这个位置的时候重合了。

1.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ur Asian Economies reaching medium level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iiA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UHK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 The TFP of these four economies were rising rapidly and drastically during and after the period they avoided or bypassed MTT.



- Figure 3 The rise of TFP among these four Asian economies (Data source: Wind, Our World in Data)

来源：演讲嘉宾 P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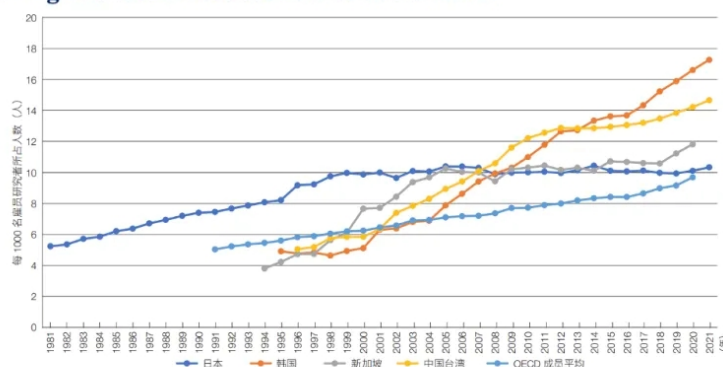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把各个评价维度都整合起来，包括每 1000 名雇员当中研究人员比例，也是评价一个经济体在研究和研发人才上的投入力量。

1.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ur Asian Economies reaching medium level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iiX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UHK

- The proportion of researchers for every 1000 employees also climbed up during and after these economies avoid MTT.



- Figure 4 the Number of researchers per 1000 employees of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Chinese Taipei, and OECD economies (average) from 1981 to 2021 (Data source:OECD; as the data in 2021 is not available, the time series for Singapore and OECD economies (average) are by 2020)

来源：演讲嘉宾 PPT

还有 R&D 投入，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通过现状和数据各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在数据上测量或者衡量，大概要逃出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技术陷阱需要哪些指标。

我们总结了原因，主要从国际环境、国内环境总结这四个经济体到底为什么可以做到。首先是从东亚经济体的共性，它属于西方这个大环境里面市场的一部分，人才、商品、资本可以在西方市场开放流动，而商品在全球贸易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加速了技术外溢和扩散，这是国际环境给予这四个经济体的机会。从国内环境来看，我们从四个维度分析了共性和优势所在，比如从政策方向和教育人才体系、科技创新创业体系、金融体系四个维度分析，总结出这样的表格，根据四个经济体在四个维度的特殊方向，如何根据自身的优势去发展各自领域的特点？我们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Singapore
A: Policy Direction	Transformation from targeting policy to positive adjustment	Transition from “big government+big chaebol” catching-up industrial policy to a market-oriented mode that fosters the growth of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The Shift of the developmental government to the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upport for specific industri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nnovative manufacturing ecosystems
B: Educational talent system	Supporting national econom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s the “second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South Korea	1)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for innovation 2) the network of oversea Chinese	1)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2) multiple types of policies for immigration
C: Enterprise-oriented innovation system	1) Industry-government-academia nexus 2) represented by VLSI proj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ustry-tech” alliance for R&D	1) Public-private R&D alliance: a support system of technological legal entity (ITRI) 2)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ce parks	1) Specialized organization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s
D: Financial System	Transition from bank-led financing to market-oriented financing	Transition from bank-led financial structure to diversified financing channels	Development of the venture capital ecosystem	Sound financial system+VC ecosystem aligning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来源：演讲嘉宾 PPT

为什么要选取这四个案例？首先他们都是东亚经济体，其次他们都在制造业和科技层面，至少在上一个世纪中实现了较好的跨越式发展。他们和我国的文化背景相似，因此对于我国逃脱中等技术陷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吸取拉美教训，抓住科技发展窗口期

吴秋菊（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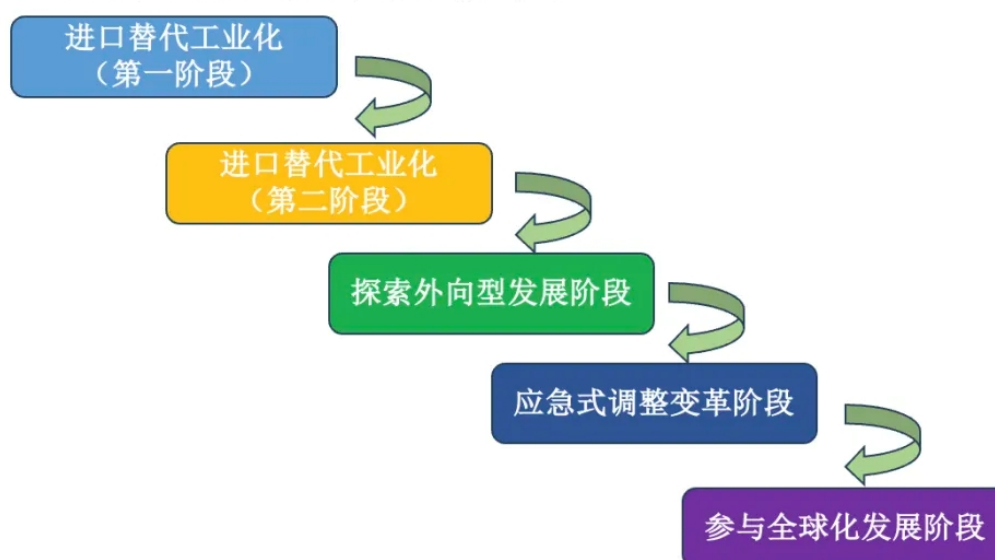
关于中等技术陷阱这个研究议题，我们在郑永年老师的指导下有一个板块专门做经验研究。这个板块分析了东亚崛起技术是如何升级的，也分析了美国对日本、法国、德国的技术打压以及他们的应对策略，还分析了拉美和东南亚的教训。

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我们选取了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作为案例。拉丁美洲有 30 多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是拉丁美洲的大国，也是拉丁美洲工业强国，所以我们选取他们作为代表。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其实与日本、韩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分别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跨越了中等收入水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拉丁美洲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被认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区域。

为什么他们在八十年代发展呈现巨大的差异？这其中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回答，一是技术赶超产业升级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拉美？二是我们想要回答拉丁美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对技术升级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依据的经验就是拉丁美洲从工业化开始到发展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历程，从这个经验出发对几个问题进行回应。文章中分国别进行梳理，我这里简单总结三个代表性的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基本上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开始，大概是 5-10 年的时间，进行非耐用品的生产。

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工业化与科技发展历程

工业化的主要发展阶段：



来源：演讲嘉宾 PPT

第二个阶段是进行耐用品生产。七十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已经意识到内向型的发展存在问题，所以他们都提出要探索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说像巴西提出“出口即出路”，墨西哥提出希望打造“拉丁美洲经济体”的观念，但是都没有成功。到了八十年代，由墨西哥开始爆发债务危机，导致整个拉丁美洲都进入经济债务危机、政治危机的状态中，各国在八十年代进行了应急式的调整变革。到九十年代，他们才逐步进入到参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是工业化发展历程，而科技发展也有一些共同特点，当然每个国家都会呈现差异性。我们总结了共同特点，比如说系统性科技发展战略形成比较晚，到六十年代基本上还是碎片化的政策。就算是

在拉丁美洲中作为科技强国的巴西，在七十年代才开始有系统性的政策和战略体系。他们的科技发展也受债务危机冲击非常大，国家对于科技发展的投入能力非常有限。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发展水平其实一直处于中间的状态，旁边的表格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得出的，我们可以看到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长期处在中间水平，这个统计数据包括了全球 130 多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上升的状态之中，2022 年排在第 11 位。



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工业化与科技发展历程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
THE GUANGZHOU INSTIT

科技发展的主要特点：

1. 系统性科技发展战略形成较晚；
2. 科技发展受债务危机的冲击较大；
3. 国家投入科技发展的能力有限；
4. 科技发展水平处于中间状态。

	2007	2012	2017	2022
巴西	40	58	69	54
阿根廷	63	70	76	69
墨西哥	37	79	58	58
中国	29	34	22	11
马来西亚	26	32	37	36
泰国	34	57	51	43

（拉美、东南亚、中亚代表性国家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来源：演讲嘉宾 P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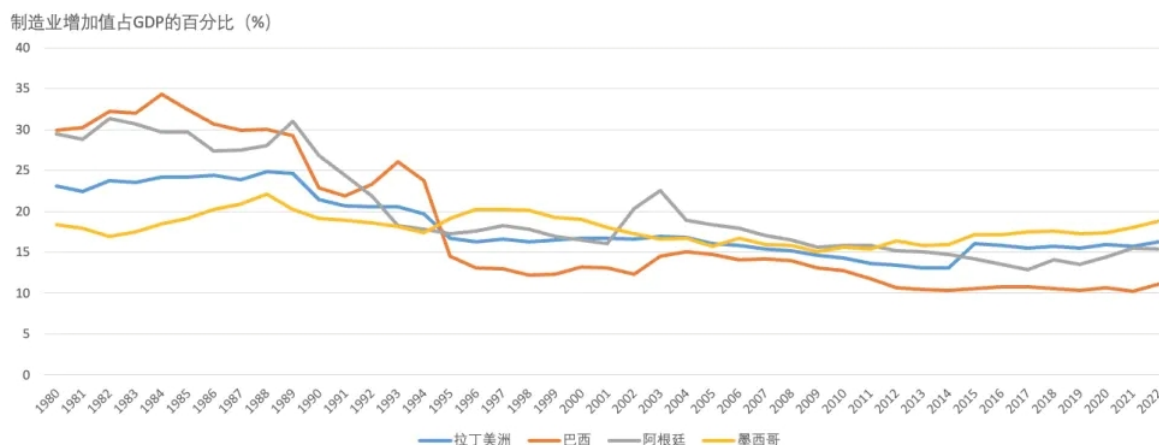
这时候我们就要回答，为什么技术赶超没有发生在拉美？拉美工业化的路径和原始积累，因为自主性非常强，一直想要建立完全独立的本国工业体系，特别注重重工业的发展，但这样也蕴含了非常大的风险。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普遍进入了举债发展的模式之中，对于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和产业治理能力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制度设计有一些偏差，比如说内向型的产业发展制度设计，虽然到后期他们意识到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没有发展起来。我们对比拉美和东亚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存在一些差异。我认为主要有三个维度：（1）国际维度。比如韩国也有大量债务，但是有美国作为支撑，债务风险相对比较小。（2）应对风险能力。（3）制度设计。这是和东亚有较大差异的三方面。

接下来我们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很快就进入到工业化早衰阶段，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制造业比重就越来越低了。技术水平也是处于中间状态。我们在文章中对原因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比东亚的经验，比如说研发水平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低、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有限等等。

四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缘何技术升级更为困难？

拉美的工业化早衰



来源：演讲嘉宾 PPT

最后简单讲一下结论，我们梳理了拉丁美洲的经验，就会发现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发展历程来看，他们已经同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和中等技术陷阱，而且这两个陷阱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在这种状态下要实现跃升非常困难，由此给我们提供了重要警示意义——我们很多发展都有窗口期，如果不能在这个窗口期进行技术产业升级，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面临双重陷阱。

【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

“台湾有事”风波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

——IPP “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 专题研讨会实录

（2025 年 11 月 19 日）



主持人：陈佳慧 IPP 研究助理

与谈人：郭海 IPP 执行院长、副研究员

杨丽君 IPP 研究员、教授

徐伟钧 IPP 助理研究员

导语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议员质询时发表错误言论，声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并暗示若台海发生冲突，日本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干涉。针对日方的言论，中方回应以一系列的强硬组合拳，包括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发布赴日旅游安全提醒，警告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日本；宣布暂停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等。

高市早苗为何在当选不久之际就发出如此的强硬言论？这是否代表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深层次调整？中方为何做出强硬回应？

11月19日，IPP在院内举行了“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专题研讨会，邀请外交团队多位资深研究员就近期的中日关系做出深度解析，并为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把脉。

陈佳慧（主持人）：

本次研讨是在当前中日关系持续紧张背景下举行的。首先进入第一个议题：近期，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预算委员会上的涉台表态被视为“突破性言论”。她的发言是否意味着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逻辑正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又或者，这些表态折射出日本国内政治结构——尤其是保守势力、右翼力量与务实派之间的权力平衡——正在出现某些深层调整？

郭海：

要理解高市近期的涉台言论，首先需要梳理一下高市早苗发表这些言论的背景。

她是在11月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的质询时表示，“台湾有事”——也就是所谓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并且暗示在现行《安全保障法》和日本宪法框架下，日本是可以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形式命令自卫队武力介入相关事态。

11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称，日本领导人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日两国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性质恶劣，中方强烈不满。这其实是中国官方对类似涉台言论一贯的立场。

结合上述背景，我觉得这暴露了中日关系当中三个结构性的矛盾：

第一，从部分日本保守派的观点看，中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基础有一定的模糊地带。例如，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辩称，“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一致。”在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问题在于：“理解与尊重”是否等同于日本同意中国立场？对于部分日本右翼政客来说，至少在文字上看，这种细微差别间存在主观诠释的空间。

第二，中日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安全认知存在结构性冲突。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的底线非常简单：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绝不允许第三方染指。但对日本而言，台湾当局是制约中国大陆的地缘政治“屏障”。因此，日本在地缘安全上对所谓“台湾有事”的情况存在深层不安。

第三，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背景下，日本整体上存在“被抛弃恐惧”。长期以来，日本的安全政策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将日美同盟某种程度上弱化成了交易关系。日美同盟的坚实程度现在确实要打一个问号。无论这个问号有多大，日本都必须有所考虑和预判“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中国”。这种恐惧促使许多政治家，尤其是像高市早苗这样偏右翼的政客，更公开地讨论“台湾有事”。

在这样的氛围下，高市早苗会认为自己可以相对“安全”地公开表态。此前日本政治人物在涉台问题上都比较谨慎，例如安倍晋三也只是在卸任之后才敢公开谈“台湾有事”。高市之所以敢在任内讲，是因为当前日本在安全议题上形成了一定共识氛围，让她觉得可以公开触碰这个议题。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可以留给下面两位老师进一步展开。

杨丽君：

我想进一步谈谈：为什么高市早苗要这样讲？她的意图是什么？

尽管高市是第一次当选首相，但她的从政经验并不短。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她当然清楚，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不可触碰的议题。当年中日恢复邦交时，双方为此做出了很多让步才达成共识，所以这一点她应该非常明白。但她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发言，意图到底是什么？我自己觉得大概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借台湾问题推动她的政策目标。

高市上台时提出了三个大的政策目标，其中一个就是在2016年中期实现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其中要修订内容包括：

第一，将安全保障费用从现在占GDP的1.8%提高到2%，在未来最终实现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6月20日提出的目标——将包括日本在内的同盟国防卫费用提高到该国GDP的5%。

事实上，考虑到周边国家以及国际局势的不安定状态，再加上特朗普第一任时期的施压，岸田文雄当政的2022年，日本已决定提高防卫开支，把到2027年将安全保障费用提高到GDP的2%作为目标。高市早苗想要在2025年年底达成这一目标。

修订的第二项也值得高度重视，即高市早苗正试图对现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进行修改。此举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但有可能为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创造条件，而且更有可能是为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拥核”国家制造可能。当然，从财政方面看，日本内部面临各种经济问题，短期内实现将安保支出提高到GDP的2%的目标有一定难度。修改1967年以来维持至今“无核三原则”，更是需要面对国内外的阻力。

我认为，通过操纵台湾问题，制造外部压力来动员国内力量，形成内部共识，用所谓“外部威胁”来推动她的政策目标，这应该是她在这个时候抛出“台湾有事论”的主要意图。中国不会轻易采用武力方式统一台湾——正因为知道这点，她才敢触碰台湾问题。她讲这些话的初衷可能就是“打打嘴仗”，但她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因为这个政策目标如果实现，对她的支持率、执政稳定性，以及长期政治利益都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个方面：高市早苗被视为“安倍衣钵的继承人”。

大家都说高市早苗是安倍衣钵的继承人。她上台后，整体政策确实延续了安倍时代的经济政策和外交路线。“台湾有事论”并不是她提出的，而是2021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后提出的，并在去世前一直宣讲，借此来推动其“国家正常化”“军队正常化”的目标。早在2022年2月27日，安倍晋三就在日本电视政论节目中讨论“台湾有事论”时，公开提出“日本可以与美国共享核武”。

在2024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河野太郎和石破茂都提及修改日本核武器政策的设想。“台湾有事”与“核共享”讨论早已经在日本政坛和知识界经过了广泛的讨论。甚至在部分政客中达成共识。安倍生前自己没有实现，所以高市早苗上台后要继续完成这个目标，她的动机非常强烈而明确。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安倍在提到“台湾有事”时已经卸任，但高市早苗却是以现任首相的身份提出，性质完全不同。

第三个方面：以外交议题转移内政困境。

内政上她提出了几个目标，但经济政策基本延续了安倍时期的经济政策。当时安倍推行这些政策时，日本正处于通缩时期，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通缩。但现在的日本物价一直在上涨，面临通胀问题，日本民众承受的压力很大，还有老龄化问题、社保缺口、老龄人口贫困化等社会问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这些议题本来是日本国内媒体讨论的核心，但随着这次涉台事件出现，焦点被转移到外交、对中国的议题上。某种程度上讲，她成功地把内政压力转化为外交议题。尽管她的支持率很高，年轻人也支持她，但如果生活问题不解决，支持率会很快下滑，这是她必须面对的现实。

第四个方面：全球政党政治的解体，日本也不例外。

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党政治正在普遍解体，日本也一样。自民党从“55年体制”（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随后日本形成高度稳定的两极格局，自民党长期执政，社会党长期在野）以来一直是最大党，但近年内部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政治”已经瓦解了。

以前自民党党内有很多派阀，通过制度化运作来平衡利益、解决矛盾。但现在只剩“麻生派”还在运作，其他派阀都因为政治资金丑闻宣布解散了。客观而言，尽管派阀政治有其弊端，但可以形成“集团作战”，有效增加政治人物的互助合作，以便于应对外来压力。

同时，派阀内的个体言行也受集体的制约，因其体现的是集体的利益，也需要考虑集体共识。然而，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政治”瓦解之后，自民党内的政治人物变成了单独作战，不再需要考虑派阀利益和共识。所以，即便不遵守中日关系的相关文件也可以声称是“个体行为”。另外，以个体面对国民，很容易走“民粹路线”。

政党政治的式微，也是很多国家走向“极右路线”“民粹路线”的原因。日本如此，欧洲也是如此。未来这种状况可能成为常态。特别是在日本或东南亚等有选举制度的国家，“操纵中国议题”是最容易动员民意的方式之一。这种情况未来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对中国而言，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应对这种趋势——中国的邻国多、地缘摩擦多，如果这类政治操作常态化，对我们将非常不利。

第五个方面，高市早苗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日本的“政治强人”。

高市提出“强经济、强外交、强日本”。她要扮演一个“强人角色”。她看到全球“强人政治”在崛起，她也要塑造一个能对中国“硬碰硬”的形象。日本国民也希望一个强人政治家的出现来引领国家。迎合民众心理，也是她要突破以往界线的重要原因。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有两个方向：

第一，必须坚决反制。如果我们弱下来，操纵中国议题来实现政策目标就会常态化。而且，必须注意到的是，高市早苗的下一步计划是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无核三原则”。这次的“台湾有事”不过是第一步，也是“投石问路”。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反制，以防止其下一步行为的实施。

反制方法一方面是直接给予压力，比如经济制裁、军事施压等。另一方面也同样重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在“台湾有事”的问题上，高市早苗的行为有可能挑动战争，因此是触碰底线的“挑战者”，是东亚以及东南亚安定局势的破坏者，而我们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而且，如果我们容忍了这一次，高市早苗下一步就很可能修订“无核三原则”。我们反制是为了维持和平、避免局势失控。在国际舞台上，必须抓紧坚决反制，争取主动权。高市早苗触碰的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整个周边局势。

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局部战争，但只要中国和美国不加入，它们就不会升级。一旦中国在任何一个地方被迫介入，那就可能意味着世界大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市早苗是战争的

狂热挑动者，中国是爱好和平的一方，我们的反制是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我们必须争取全球话语权。

徐伟钧：

这件事情上，首先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的全文暂时还没有公布，现在能看到的主要是媒体的相关报道和冈田克也提出的质询。质询主要包括几点：首先，冈田称高市在就任首相之前曾经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因此询问她发表这一言论的真实意图，以及她预设的具体事态场景是什么。冈田还特别强调，日本一些在野党议员和学者认为，高市此前对“存亡危机事态”的认定，以及有关武力行使的表态过于轻率，因此要求她进一步说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这次质询本身也带有很强的国内政治意涵。站在高市的角度，在国会这样的场合，她确实很难完全否认之前讲过的话。因为如果她在国会完全否认，那么她的基本盘，即右翼势力会非常不满。而且她的政权本身也不稳定。

现在的高市早苗政权，在自民党内部主要依靠麻生派和前安倍派势力的支持，自身的政治根基相对薄弱；在党际层面，她主要依赖与右翼的日本维新会的合作，但新的执政联盟内部仍存在很多分歧。所以她自身在党内与整个政权中的力量并不牢固，需要依靠右翼民众的支持来巩固执政基础，她的政权才能稳定运作。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偏左翼的立宪民主党议员的质询，如果她完全否认此前的表态，就可能导致政权动荡。

另一方面，高市虽然从政经验丰富，但缺乏外交经验。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国会作出这样的表态，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当然，这里只是解释她当时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回答，不代表她的回答有任何的正当性。

高市的这次表态性质非常严重，因为此前所有的日本首相都避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明确表态。而这是第一次日本首相以现任首相身份明确指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

当然，高市在答辩过程中也加入了一些“限定条件”，只是这些限定在后续报道和讨论中基本被忽略了。根据媒体报道，她在回应“何种情况下构成存亡危机”时，表示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具体事态，综合所有信息判断。她提出的可能情形是：如果中国军队动用军舰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而美军前来解封；为了阻止美军的行动，中国军队可能动用武力，而如果中国对美军动武，就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因为“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基础，而集体自卫权是跟美国之间，而不是针对台湾当局。

所以她实际上加了很多限定条件。她还说，单纯使用民用船只阻碍航行“不构成存亡危机事态”；但如果在战争状态下实施海上封锁，并伴随无人机活动及各种突发状况，就要“另做考量”。

也就是说，她主观上是试图把可适用集体自卫权的情况限制到最极端的事态下，再作出这个表态。但从本质来说，她仍然是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公开作出了可能介入中国统一进程的表态，所以性质依然非常恶劣。

关于回应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回应还是少了一点。毕竟高市的表态是站在日美同盟体系之上，是以美国可能介入台湾问题为前提的，而且近期美国驻日大使也多次就相关问题大放厥词。目前中国的回应更多是针对日本本身。从我的判断来看，如果美国不介入，日本不会有胆量介入中国的统一进程。因此在回应上，避免美台勾连和避免美日联合干涉台湾问题的防范意识可能也需要相应增强。

另外，我认为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日本对台政策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说得极端一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直差不多，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国的统一。日本一直是这种态度，我们也一直对此保持警惕。高市只是第一次把这个态度明面化而已。

事实上，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日本一直与台湾民进党当局有明里暗里的勾连，包括间接支持、政治人物的窜访，甚至一些安全领域的合作也通过非公开渠道开展。他们的态度一直如此。

因此，这不能说是“本质转变”，只能说是一个“突破”。站在中国角度，高市既然敢做突破，我们就必须坚决反制，把这种企图扼杀在萌芽阶段，不能让日本真的介入。一旦介入，对中国的统一进程可能会造成较大的阻碍。

陈佳慧（主持人）：

谢谢三位。从日本的表态之后各方的反应来看，这次的反应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从日本国内来看，自民党内的一些政治精英采取了比较高调的批评姿态；日本民众也确实存在一些抗议的声音。但我们看民调数据，高市早苗现在整体上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支持率。共同社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四成的民众对“台湾有事论”持支持或偏赞同态度。那么，日本内部的这些不同反应是否会进一步塑造高市政权今后对中国台湾或中国大陆的政策走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从中国方面来看，这一次中国也采取了非常一致的强硬立场。与以往类似事件相比，这次中国的立场有什么不同？是否出现了新的表达方式或者产生了不同的成效？另外，如果日

本未来继续采取这种强硬姿态,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升级某些反制措施?有哪些可能的手段值得考虑?

第三,中日关系一定要放在中美日的大框架下观察。前面几位老师也都提到了美国因素的重要性。但这一次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对高市早苗的表态作出明确的正面回应。那么站在特朗普政府东亚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方面的态度又会对日本未来的对台政策或者对华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徐伟钧:

日本国内对政府不满的抗议一直非常常见。这一次之所以显得比较突出,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和日本政府的立场不同,所以我们这边会更多关注、更多报道。但实际上,这些抗议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强烈。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民调数据,我认为还是比较真实的。在日本右倾保守化的背景下,大部分右翼民众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如果和中国“闹翻”后果会有多严重。他们更多是出于右翼立场、民族主义立场,觉得日本政府应该对中国更强硬,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些表态。他们确实是可能持有这种观点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的反对或批评意见,比如媒体报道的那些知名学者,包括孙崎享、舩添要一、颯纈厚等人,他们本来就一直反对极端民族主义,也反对历史修正主义。这些学者基本上我们都很熟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有一种反对声音来自财界的企业,他们的动机主要出于经济利益,认为这件事情影响了中日经济关系,所以会反对。

政治界的反对分两类:一种来自在野党,比如鸠山由纪夫、野田佳彦,他们跟自民党本来就不是一伙的,所以他们持反对态度完全正常。

另一种来自自民党内部的一部分人,比如石破茂。但他们的批评可能更侧重于一种“高市早苗你‘可以偷偷摸摸做’,但不能公开‘把话讲出来’”的态度。因为石破茂以及自民党内的大部分政治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其实没有太大的出入。只不过他们之前是“暗中搞事”,而高市是“明目张胆搞事”。

我认为,中国这次的反制措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力度也比较强。这些反制和高市的表态本身可能形成了一种“不对称感”,但我们确实有“重点施压”的战略考虑。我个人觉得,高市的一贯政治立场就是右倾、反华,她当上首相后,很可能会进行一系列“擦边操作”,甚至直接挑战中国利益。那么我们在她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用集中且高强度的反制来施压,直接扼杀她后续搞事的苗头,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如果我们这次容忍了，她之后可能会得寸进尺、有更多动作。例如，她可能会推动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这类举措会显著增强日本对台湾当局的支持，也会进一步损害中国利益。

说到美国。特朗普确实没有明确表态。但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调整，其实也是高市政权此次越界的一个重要背景。因为特朗普在搞战略收缩，他的同盟承诺在所谓的“盟友”看来越来越不靠谱。他对台湾当局的支持也出现一定动摇。中国推进统一进程，美国是否会介入，这种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强，台湾当局的担忧也在不断加深。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认为应当作出战略调整：要把美国牢牢捆在亚太、印太，乃至台海地区，不能让特朗普轻易“抽身离开”。因为如果美国真的撤了，日本显然没有能力独自面对中国的压力，也无法凭一己之力阻止或实质性地影响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所以日本需要美国继续在这一地区维持军事存在、维持对台承诺。

在特朗普战略收缩的态势下，日本可能会采取主动挑起一些事端，迫使美国介入、迫使美国表态，从而构筑印太地区针对中国的遏制和包围网络。这也就是所谓“卷入战略”。

杨丽君：

我补充一下日本国内的反应。

第一，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界和知识界其实是存在一个“不说的共识”的。他们非常不希望台湾和大陆走到一起。我印象很深，两三年前他们就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反复拿台湾问题做文章，拉上澳大利亚等国家，一起讨论、一起渲染，目的就是集结外部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来对付中国的同时，实现本国的政策目标。不管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其他战略考量，日本对台湾地区的基本态度就是——“不能让中国统一台湾”，这是一个长期共识。

但是，日本国内还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集体自卫权”的担心，二是很多日本国民本身确实比较爱好和平。二战后形成的和平宪法还是有一定支持基础的，这一点在日本社会确实存在。

但这几年变化也很明显。以前推动修改宪法是非常难的，但现在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比以前容易得多，因为社会基础已经变了。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第二任时期曾经尝试修改宪法，尽管没有成功，却有过长时间和深入的舆论探讨，在其卸任后也一直在利用媒体和杂志讨论“台湾有事论”和“核共享”，在经过长时间的舆论渲染之后，很多日本人已经不再觉得这些言论是“离经叛道”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后退，也让很多日本人产生“国家必须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虽然公开讨论不多，但这种认知基础确实在不断扩散。

我这几天一直在看日本报纸和各种讨论,希望能找到一些真正不同的反对声音——但其实非常少。这也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当时情况也很类似。虽然个别政治家会“不痛不痒”地反对几句,但他们心里其实是觉得:如果能不惹大事,那就做下去。

当然,如果中国方面的压力够大,他们又会调整立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状态。就目前而言,没有什么足以阻止高市的强有力反对声音。很多人都在“和稀泥”,表面批评两句。未来怎么变化,其实就看我们怎么做。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会直接决定事态的走向。

这就来到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反制。目前主要看到的做法是倡导暂停赴日旅游以及再次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以及加强在钓鱼岛海警巡航的力度。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手里究竟有哪些牌能打,整理出一套应对策略。同时,最重要的在国际话语方面反制必须抓紧。

至于美国方面,我认为高市早苗做的正是美国想让日本做的。在10月30日的中美首脑会谈时,特朗普有意回避了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台湾问题。但是一个星期之后的11月7日,高市早苗就抛出了“台湾有事论”。而在10月28日日美首脑会谈时,核心问题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强化安保力量。在日美首脑会谈时,日本方面主动提出并承诺在2025年将日本防卫费用增加到GDP的2%,这正是特朗普向各国施加关税压力时对日本的要求,也是当时日本政府极力想要守住的一条线。首脑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也透露,在会谈中日本方面向特朗普提到了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

刚刚徐博士讲的一点我非常同意:美国战略收缩之后,日本在安全上的不安感变得非常强烈,所以它会追求军备扩张,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是高市在“讨好美国”,同时也是在借美国的势力来推动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并不愿意放弃亚太,而她现在的很多做法,实际上是在投美国所好。美国自己现在做不来、顾不上这些事情,它在收缩,但它很希望有国家替它在亚太“挑事、造势”。

美国也试图拉拢东南亚,尤其是拉拢菲律宾,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在南海掀起多大风浪。高市现在推动2025年年底把军费提到GDP的2%;在日美首脑会谈时,日本不仅承诺承担更多美军驻日费用,而且承诺改进军事装备。再加上其他对美投资项目,这对商人的特朗普来说不可不谓是一笔很好的买卖。

郭海:

我稍微补充一下:第一点是关于中日的相互认知,第二点是关于中美日的三角关系。

首先是相互认知。2022年,IPP曾经举办过一次中日关系的线上研讨会,当时请到了东京大学学者川岛真教授。他当时有一个观点:虽然中日民间相互认知整体上比较负面,但根据他

的调查和一些数据，中日青年之间的相互认知并没有那么糟。当时日本青年（比如95后）中，大概有25%对中国的印象还是良好的，所以他认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可以寄托在青年身上。但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恶化。原因大概有两点：

第一，主张和平主义、对华友好的“老朋友”们，这一代人现在几乎快不存在了。这些人大多有战争经历，且属于日本左翼，本来就是少数派。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有战争经历的人现在已屈指可数。战争世代消亡之后，日本社会整体的保守化趋势必然会更强。

第二，“Z世代”的对华认知，无论是友好还是不友好，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交媒体时代“信息茧房”的产物。他们对中国的认知非常单向、不立体，而且很片面——他们大多数的信息来源是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这一点上，中国未来在公共外交上确实要多做工作。我们在回应上，不应给日本右翼提供“妖魔化中国”的素材。从长期来看，让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更正面，对中国也会更有利。

第二点是“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国曾经对日本有期待，觉得日本可能形成某种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现在看来，这种幻想基本破灭了。

当然，中美日三角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过去，中美日三角关系可以被形容为一种“稳定婚姻型”：美国和日本都对中国保持一定紧张关系，因此美日同盟关系相对稳固。但现在，在特朗普政权下，美国推动战略收缩，无暇顾及亚太，更希望把三角关系推向一种我们称之为“罗曼蒂克型”的结构，即美国放任中国和日本相互冲突，然后两国都来讨好美国。但无论是过去的“稳定婚姻型”，还是现在这种“美国为枢纽、中日相争”的“罗曼蒂克型”三角关系，对中国来说都是比较难处理的局面。

因此我认为，在未来的反制当中，外交话语层面的反制要注意其长期影响；同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我们也需要梳理清楚有哪些反制工具，形成一个“工具箱”，这样可能会更有效。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发言记录整理，内容有删减。发言仅代表研究员个人意见，不代表研究立场。

“战争骑手”高市早苗

杨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教授

导语：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抛出严重错误的涉台言论后，日本政府不仅未及时纠正，反而一步步迈向更加冒进、更加危险的轨道。11月20日，根据高市早苗的指示，自民党召开安全保障调查会议，拟提前修订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首的“安保三文件”。重点聚焦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进一步提高防卫费支出以及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等内容。同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政府已向美国出口日本航空自卫队持有的“爱国者”地对空拦截导弹。此举标志着自2014年日本内阁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来，日本首次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

IPP资深研究员杨丽君认为，目前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上，但性质更为严重的是她试图在2026年中期前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书”。这一进程意味着日本将迈出“国家正常化”、“军队正常化”的第一步，尤其是解除“五类型”防卫装备品出口禁令和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举措，更需要亚洲国家共同关注其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受到媒体的热烈关注。舆论重点都聚焦于：高市早苗的发言，是否意味着日本在中日邦交恢复以来一直维系的对台政策有所改变？这种行为是否会影响中日关系？国内媒体也把主要的诉求集中在要求高市早苗撤回其言论上。

然而，在日本政坛，与这件事情并行，性质却更加严重的另一件事情——到2026年中期实现修订“安保三文书”的目标，却被人们所忽略。如果这个目标实现，将意味着日本未来不仅会成为一个武器出口国，也迈出了“国家正常化”、“军队正常化”的第一步。

到2026年中期实现修订“安保三文书”是高市早苗就任首相时就立下的政策目标。11月18日，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小野寺五典，原安倍内阁防卫大臣）在自民党党部召集约10人的会议，开始着手讨论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书”以及安全保障战略的相关议题。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安保三文书”的修订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 第一，将安全保卫费用由目前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8%提升至2%；
- 第二，解除现有文书（2022年修订）中对“五类型”防卫装备品的限制出口禁令；
- 第三，利用无人机以及AI技术来提升自卫队战斗力；
- 第四，强化自卫队长期作战和持久战的战斗能力；
- 第五，修改“非核三原则”。

所谓的“安保三文书”，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備计划》，是决定日本军事战略和军备计划的纲领性文书。目前的“安保三文书”修订于2022年。这次高市早苗的修订目标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防卫费用提高到GDP的2%之外，最重要的在于第二条——解除“五类型”防卫装备品的限制出口令，以及第五条——修改“非核三原则”。

所谓的“五类型”防卫装备品主要指“救援、运送、警戒、监视、巡航”五个类别的军事装备，涉及军舰、军机、雷达、潜水艇、导弹等以及重要的军事战备及补给装备和物资。解除出口禁令，将意味着日本可以向其他国家售卖这些重要的军事物资。

11月2号，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的临时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记者提问“五类型”防卫装备品的出口禁令解除计划，小泉直接回答：“并不是日本不卖武器世界就和平了。”（据日本媒体报道，当时访问国马来西亚对日本的二手潜水艇显示了浓厚的兴趣。）

而第五条，修改1967年以来维持至今的“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更是会对亚太地区甚至世界和平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此举不但可能为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创造条件，而且更有可能为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拥核国家提供可能。现任防卫大

臣小泉进次郎在11月7日答记者问时就曾提到，“不排除日本发展核潜艇的可能”。此外，第三条和第四条的内容，则直接涉及将自卫队“再武装化”的目标。

很显然，高市主导的日本政府如果顺利在2026年实现“安保三文书”的修订，亚太区域将不再安宁。从某种程度上讲，高市的“台湾有事”言论更像是一种“障眼法”或者是战略手段：一方面，高市早苗将注意力集中到台湾问题上，掩盖了其主导的政府正在进行中的另一项重大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台湾有事论”成功激起中国政府以及民间的不满，向国内及国际社会渲染所谓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为其行为的合法化提供“合理依据”。

在国内，日本政府利用中国政府的制裁和民间抗议，渲染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强化防卫安全的重要性；在国际上，则将中国推入“专制”“霸权”的话语体系，呼吁“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共同守护“开放的亚洲太平洋”安全。

高市早苗自诩是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子，深受安倍的提携和栽培。以“亲美反中”为战略来实现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和“军队正常化”，正是安倍晋三在世时所追求的目标。

在第二任时，安倍曾经推动过修改宪法，实现“军队正常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反对声浪巨大没有能够实现。在退任之后，安倍尝试改变策略，通过渲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来推动自卫队的再军备化，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来继续推动其实现“国家正常化”和“军队正常化”的目标。从2021年开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成了安倍在国内外宣讲和推动的一个议题，并且在2022年2月27日的日本电视政论节目的相关讨论中，公开提出了“日本与美国共享核武”的论调。很显然，高市早苗目前正在做的与安倍晋三如出一辙——借助台湾议题来实现日本的再军备化。

从日本国内的反应来看，这次高市早苗的阻力明显比安倍推动修宪时期要小很多。这其中的原因包括：

第一，做法更加隐蔽。与修改宪法相比，修订“安保三文书”牵扯的注意力相对小。日文中“五类型”——“救难、输送、警戒、监视、扫海”的日文表述，很容易掩盖其背后解禁军机、军舰、导弹等重要军事设备买卖的实质。

第二，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日本维新会自2010年以“大阪维新会”起家以来就是一个右翼政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书”，日本再军备化方面与高市早苗有着共同目标。

第三，日本政坛出现整体偏右趋势，2025年选举中，主张“排外”、“日本人优先”，受不少年轻人支持的极右翼参政党一举夺下14个议席就是非常明显的风向标。

日本右翼势力和土壤一直存在，民间的各种新旧右翼组织暂且不说，从政党政治人物来看，追求国家正常化和军队正常化一直以来都是很多政治人物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 1993 年，小泽一郎出版《普通国家》，提出“日本改造计划”，质疑日本宪法中维护和平的相关款项，当时就创下了 100 万热销，近年这本书再次被热议。同一时期，石原慎太郎则提出“日本可以向世界说不”的思想，主张否定侵略历史、修改和平宪法。之后便是有着浓厚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在任期间执着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以及追求“国家正常化”的安倍晋三的长期执政。这些都与二战结束后日本对于侵略历史没有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彻底清算有关。

尽管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民中不乏和平爱好者和反战人士。然而，随着这个群体的自然减少、日本国内与经济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出现，制约日本政党以及政治人物推进“国家正常化”和“军队正常化”的社会力量将会越来越小。

第四，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减弱有关。

从区域安全来看，高市早苗试图修订“安保三文书”不仅是中国的事情，更是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甚至是美国应该引起足够警觉的事情。说到底，台湾问题也罢、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也罢，都是日本走向“再军备化”、“国家正常化”的工具。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市早苗这位爱好重机车的“骑手”，很有可能正在将亚洲各国引向战争。二战已经结束 80 周年了。经历了战争的亚洲国家，在战后实现了国家独立，又历经过冷战的区域纷争，近几十年终于迎来了和平的发展机遇。现在，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正是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和平发展的机遇来之不易，各国都应该来维护和平，警惕日本右翼政党操纵中国议题，打着“安全保障”和“共同价值观”的伪装挑动战争。正是这种时候，爱好和平的人，包括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和平爱好者，更应该团结起来维护和平，反对任何有可能引发战争的行为。

高市早苗内阁为何仍能维持较高支持率？

徐伟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导语：

2025 年 11 月 26 日，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官网刊登了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助理研究员徐伟钧撰写的特约评论文章，文章题为“**Structural explanations for Takaichi cabinet’s support rate**”（高市内阁支持率的结构性解释）。

文章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引发了中日关系紧张，但其内阁支持率仍维持高位，其背后主要有四点原因：日本国内政治文化与选民结构的变化为高市内阁提供了高支持率的社会基础；舆论将中国反制视为“外部压力”，从而短期内带来“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高市内阁支持率的多元构成维度稀释了涉台议题在民意调查中的影响权重；以及中日关系紧张向日本民意传导时存在一定时间差。文章指出，为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情境出现，中国方面应持续加大对日施压的力度，直到高市内阁明确撤回其错误发言，或者清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台湾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问题发表的错误言论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中国方面对其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反制措施，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批评其言论的声音。然而，日本主流媒体近期开展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并未明显下滑，甚至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如下表所示，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共同社等日本主流媒体近期的民调数据均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基本维持在 70% 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支持率并不等同于日本民众对高市涉台错误言论的支持，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反制措施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Recent Polls fo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s Cabinet			
Date	Conducting Organization	Approval	Disapproval
Nov. 21- Nov. 23	Yomiuri Shimbun	72%	17%
Nov. 22- Nov. 23	FNN/Sankei	75.2%	19.6%
Nov. 22- Nov. 23	Mainichi Shimbun	65%	23%
Nov. 15- Nov. 16	Kyodo News	69.9%	16.5%
Nov. 15- Nov. 16	Asahi Shimbun	69%	17%

Source: Prominent Japanese News Organizations

CGTN

多家日本主流媒体在 11 月中下旬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读卖新闻为 72%，富士电视台/产经新闻为 75.2%，每日新闻为 65%，共同社为 69.9%，朝日新闻为 69%。反对率则普遍在 16% 至 23% 区间。图源：CGTN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主要源于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日本国内政治文化与选民结构的变化，为高市内阁提供了社会基础。

近年来，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倾向发生显著转变，呈现出明显的右倾保守化趋势。传统的反战与和平主义话语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持续弱化，而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力逐渐提升，这一趋势在极右翼政党参政党近几年的崛起上得到进一步印证。

很多右翼倾向的日本民众并未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恶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其立场更多是基于右翼民族主义情绪,主张日本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因此,尽管高市涉台错误言论引发了中日之间的严重冲突,这部分选民仍未撤回对高市政权的支持。

第二,话语框定与“聚旗效应”巩固了公众对高市内阁的支持。

在中日争端中,日本主流媒体和部分意见领袖刻意将中国的反制措施框定为“外交压迫”或“外部胁迫”。这种话语框定会让公众注意力被引导至人为塑造出来的“外部威胁”上,从而弱化了公众对高市内阁涉台错误政策的批判意识。

因此,随着中国反制措施的推进,日本民众中出现了短期性的“聚旗效应”。他们对相关后果严重性的认知不足,其不满情绪更多指向所谓“外部威胁”,而非高市内阁的政策失误。最终,这种情绪也转化成了对高市强硬立场的短期支持。

第三,内阁支持率的多元构成维度稀释了涉台议题的在民意调查中的影响权重。

在涉及内阁支持率的此类民调中,中日关系并不是大多数日本民众关注的首要维度。民调数据显示,大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的期待是在经济层面,尤其是所谓“早苗经济学”的实施成效。例如在前述读卖新闻的民调中,有74%的受访者对高市提出的追求“负责任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给予正面评价,只有17%表示不认可。即便在外交范畴之内,中日关系也只是诸多议题中的一部分。

尽管在中日关系上遭遇严重挫折,高市自上台以来仍通过东盟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G20峰会等平台,开展了一系列成功的多边外交活动,并且也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达成了积极的外交成果。这些外交成就使高市内阁的外交政策在多数日本民众眼中呈现出整体上的正面印象。

同样参考读卖新闻的民调,对于高市10月与特朗普的峰会,有7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表现良好。而对于高市内阁的对华立场,虽然有56%的受访者予以正面评价,但这一数据相较于其总体支持率显著较低。

第四,中日关系紧张要传导到民意层面需要一定的时间。

中国迄今采取的反制措施,更多是在特定经济领域对日本进行打击,而这些措施要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切身感受,并进而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通常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传导过程。因此,在争端初期或短期内,日本民意可能仍然偏向于支持或容忍高市的错误立场。

但若中国的反制措施持续增强并显著影响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产生的经济压力很可能逐渐转化为政治不满,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也可能随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当前日本的政治生态使得高市政权在短期内难以撤回错误发言，中日关系的低迷状态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高市内阁在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上均展现出明确的右倾化姿态，这种以动员右翼支持者为核心的政治逻辑，对其外交与安全政策形成了强大的政治约束。任何政策妥协或和解姿态，都可能被右翼舆论解读为“软弱”或“背离国家利益”，进而削弱内阁的民意支持基础。

如果中国放任此次事端发酵，或者任由高市对此次事端进行冷处理，未来高市内阁为了维持其支持率，可能会在涉台政策上采取一些更为危险的举措。例如，高市内阁可能会推动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参照美国模式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管理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并为协防台湾和向台湾出售武器提供法律依据。

再比如说，高市可能会将“台湾有事”纳入日本安全考量的适用情形，在官方话语体系与防卫白皮书等文件中使用更明确的表述。为了避免这些更为危险的前景，中国方面应当维持坚决的态度，持续加大对日施压的力度，直到高市内阁明确撤回其错误发言，或者清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台湾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

(原文以英文发表，中文版为作者提供)

高市早苗为何在台海问题上迈出危险一步？

周浩锴 IPP 新媒体编辑

导语：

11月7日，就任日本首相不久的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台湾有事”是否属于安全保障相关法规定中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她回应称：“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认为这可能属于‘存亡危机事态’的情形。”她还宣称，台海局势“已趋于严重，必须设想最坏的情况”。

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紧张与台湾岛内政治版图变化，日本围绕台海的政治叙述确实出现了变化。“台湾有事”逐渐成为政界高频表达。这一方面为日本提升防卫预算、强化日美同盟提供了政治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日本向“正常国家”叙事靠拢制造舆论空间。然而，直到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前，日本政府首脑在对台政策的表述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战略模糊”，即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不在形式上背离一个中国立场、不明确承诺军事介入。即便是提出“台湾有事论”、将这种“战略模糊”推到极限的安倍晋三，在任内并未触碰政策框架的红线。正因为如此，高市早苗此次在国会公开谈及“存亡危机事态”并将其直接与台海情势相连，使她成为自1970年代以来最接近突破日本对台“战略模糊”边界的现任首相。

一、高市早苗为何在台海问题上迈出危险一步？

1. 恶意揣测下的“不安”

在日本安全政策圈长期存在一种揣测：日本目前在东海方向尚存一定战略纵深；但如果台湾回归，冲绳、宫古、与那国岛等西南诸岛将“直接暴露”在中国海空力量前，可能“沦为中美前沿战区”。

2021 年，《日美联合声明》首次写入“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台海议题由此纳入美日同盟架构。随后，《防卫白皮书》在 2021—2023 年连续三年将台海局势视为严峻的现实挑战。

2022 年，岸田政府修订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NSS），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对日本安全的最大战略挑战”，与包括《国家防卫战略》（NDS）和《防卫力量整備计划》（DPP）在内的“日本安保三文件”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提出日本将发展带有攻击性质的“反击能力”。

近年来，日本开始密集调整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主要围绕“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和台海地区的枢纽要冲。进入 2025 年，日本政府的应对动作进一步围绕“台湾有事”炒作“地区紧张”，包括制定先岛群岛（与那国、石垣、宫古等）的居民疏散预案；防卫省计划从 2025 财年起，在北海道、静冈、熊本、宫崎等地陆基部署“远程打击”导弹。

与此同时，对台海局势的不安，也在日本媒体与民间舆论中不断被叠加放大，形成一种彼此强化的结构。随着粮食供应链、海运安全、半导体产业安全等议题被纳入公共议程，对于粮食自给率不足四成、能源高度依赖海上航线的日本而言，“台海危机=日本危机”的论断近年来在媒体和专家讨论中被反复放大。

2025 年 8 月，亚洲太平洋倡议（API）、东亚研究院（EAI）与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KEI）发布的联合民调结果显示，42% 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台海危机“很可能发生”，77% 的受访者认为它会“直接冲击日本安全与经济”。

在日本政治生态中，由于首相频繁更迭，日本媒体和民调机构几乎实时更新公众态度，使领导层在安全议题上很难保持战略沉默，“表演型政治”成为常态：领导人必须捕捉舆论风向，在安全议题上表现得更坚定，才能避免被贴上“软弱”标签。在风险认知持续攀升、舆论不断预设“最坏情境”的背景下，日本右翼在涉台问题上愈发倾向于采取更为直接、乃至激进的表达。

随着日本各界“紧迫感”的上升，日本政治人物的发言与表态逐渐向更明晰的方向滑动。高市早苗此次的表态，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是累积已久的“安全焦虑”与舆论压力叠加浮现出来的产物。

2. 巩固美日同盟

国内舆论只是一面，日美同盟同样在牵动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加速推动盟友承担更多区域安全责任的背景下，日本如何在同盟中定位自身、如何回应美国的“防务要求”，也成为新任政府对台表述强弱的重要变量。

在美国两党有结构性共识的印太战略中，日本是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看来，日本屡屡被设定为美军可能在台海展开行动的支点，是重要的基地和后勤中心。

但问题在于，目前美日之间的协作并非“天衣无缝”。无论是情报共享还是武器销售，美日之间都存在不对称与不稳定性。对美国而言，日本新任政府的明确承诺——特别是在军事支援上的表态——始终是检验同盟稳固程度的关键。

特朗普政府不断强调“盟友必须给出具体行动”，高市选择在国会主动涉险表态，实则是在上任之初，向美国预先提供一份“政治答卷”，展示日本愿意在维护美国为核心的“印太秩序”承担更大角色的信号。

这也与10月29日高市早苗同特朗普会晤时强调的观点一致——“日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同盟”，日本将继续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

3. 稳固权力地位

在日本国内，围绕权力基础和派系格局的重新排列，也在逼迫高市早苗在安全议题上采取更明确甚至更激进的态度。

高市内阁是在自民党与公明党关系破裂后，依靠与日本维新会的“闪婚”式联合下成立的，这直接导致高市内阁成为典型的“双少数政权”，自民党在众议院没有过半、在参议院同样无法单独掌控多数。与此同时，日本维新会与自民党将采取“阁外合作”的方式，即其成员不进入内阁。

这意味着，高市政府一上台就置身于一个易被否决、有被倒戈风险的环境。

从自民党“四役”（自民党内部最核心、最有实权的四个职位）与高市内阁大臣构成来看，高市早苗重点依赖的还是“麻生派”“原安倍派”和“原茂木派”的支持。而“安倍派”等右

派力量，一直将台湾问题视为日本安全政策的核心议题，对中国态度强硬。高市亟需证明自己比前任更“不可含糊”，是坚定的“安倍路线践行者”。

此外，日本维新会在对华议题、台海议题上有时甚至比自民党更为激进，藤田文武（维新会共同代表、国会议员）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必须删除宪法第9条第2款”，维新会还在大阪与台湾政党建立“准官方级”定期交流机制。这意味着，在涉台议题上，高市不仅要迎合自民党保守派的期待，也要照顾维新会的强硬路线。

二、高市早苗“亮牌”，有特朗普的授意吗？

不过，高市的主动“亮牌”并未换来其预期中的明确支持。她的表态固然是向美国释放“坚定同盟”信号，但华盛顿的反应比东京设想的更为复杂，也更冷静现实。

在高市言论引发区域热议后，特朗普随后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然而，面对可以肯定同盟价值的时候，他并未顺势为日本背书，反而强调“许多盟国在贸易上从美国赚得比中国还多”。当被问及“是否会为台湾出兵”时，他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承诺，而是强调自己“与中国关系很好”。

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路线围绕的逻辑主要是：避免高成本军事卷入以及“以实力求和平”。

美国新版《国防战略》将“美国本土与西半球安全”置于优先地位，也被普遍解读为华盛顿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调整资源分配，把精力从“直接介入”转向“强化威慑，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风险”。

就短期来看，如果美国与日本积极介入台海冲突，虽然在军事上有可能遏制中国的初期攻势，但美军将遭受重大损失，中美关系也会被推入一场“长期战争”之中，这显然并非特朗普现下乐于看到的。

正因如此，高市的宣示更多是日本单方面向美国展示“政治可靠性”与“安全贡献”的提升，而不是美日已经达成共同介入台海的默契。对于美国而言，其对台海局势的承诺仍将保持高度模糊，并不会因东京的主动“亮牌”而发生改变。

三、中方严正回应高市早苗涉台恶劣言论

对于高市早苗的对台恶劣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11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回应：“日方领导人有关言论，到底想向‘台独’势力发出何种信号？是否企图挑战中方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究竟想把中日关系引向何方？”

11月12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高市早苗的涉台恶劣言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日本应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信守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承诺,慎之又慎地处理涉台问题。

11月1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上述错误言行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and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方核心利益,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容忍,日方必须立即纠正,收回恶劣言论,否则一切后果必须由日方承担。”

11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示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华错误言行提出严正交涉。孙卫东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和底线。

在11月14日的中国国防部记者会上,针对高市早苗的最新言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严正表示,日本领导人的涉台错误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and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其性质恶劣,影响严重,极不负责、极其危险。

在短短数日内,从外交部、国台办到国防部,三大核心部门相继发声,回应层级从发言人级别的公开批评迅速提升至外交部副部长的正式召见大使,展现了外交交涉中最为严肃的姿态。在措辞上,中方的表态也呈现出明显的递进性,从最初的“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迅速升级为“暗示武力介入将构成侵略行为”,并明确提出“必将迎头痛击”的严厉警告。

这一过程清晰地表明,中方并非将此事视为一般的言论失当,而是将其定性为可能动摇两国关系根基、触碰中国核心利益底线的严重事件。

这一系列高强度高频率回应,通过不留任何模糊空间的强硬表态,将震慑日本国内企图干预台海的保守势力,从而收敛言行。同时,这也是向岛内“台独”势力发出的明确信号,警示其外部势力的支持并不可靠且充满风险,任何挟洋自重的企图都将把台海局势推向险境。

【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

石破茂辞职后，日本政局如何重组？

徐伟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导语：

2025年9月7日晚，日本首相石破茂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据外界分析，由于在2024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2025年6月的东京都议员选举和7月的参议院议员选举中接连遭遇失败，自民党内要求追究石破茂责任的呼声愈发高涨。为平息党内分裂的可能，石破茂主动选择辞职。石破茂辞职后，自民党将启动新总裁选举，胜者将在国会接受首相指名选举投票。目前，接替石破茂出任自民党总裁呼声最高的人选是小泉进次郎和高市早苗。然而，由于执政联盟已在国会两院失去过半优势，谁将参选、自民党新总裁是否能成为下届首相，都充满未知。这也让未来的日本对华战略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IPP助理研究员徐伟钧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石破茂已属自民党内相对务实、谨慎的政治家，无论后续谁接任首相，日本的对华政策调整大概率将使中日关系面临更大压力。若极右翼势力掌权，日本可能会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人；若务实派上台，则可能延续“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思路。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日本新首相对华政策的调整最多只能做到在大框架下的微调，即在不触碰日美同盟核心利益、不挑战国内保守政治共识的前提下，通过策略性调整缓解中日局部摩擦。

问：石破茂的辞职，将对日本政局产生什么直接影响？

徐伟钧：石破茂的辞职直接影响的是自民党总裁选举，而新当选的自民党总裁是否能够顺利出任首相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野党可能合作推出首相人选。鉴于“自公联盟”（自民党—公明党的执政联盟）目前在众议院未占据多数席位，理论上为在野党联合推选候选人提供了空间。不过，由于在野党内部存在着显著的政治分歧，各党派在政策主张、利益诉求上的差异较大，要让在野党形成统一立场，推选首相的实际可能性较低。

第二，自民党总裁当选首相后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不过鉴于自民党在 2025 年 7 月参议院大选中的惨败，新任首相不一定有魄力来进行这场豪赌。即便重新大选，自民党也可能因黑金政治等历史包袱遭遇更严重的选举失败，而这将直接引发日本更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因此，在新任自民党总裁顺利当选首相并稳固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其他问题才有讨论必要。

问：您认为，日本国内政治力量重组将如何影响其对华战略定位？

徐伟钧：石破茂的辞职将引发自民党内各派系间的权力角逐，根据最终的获胜方，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也将发生调整。需要强调的是，石破茂本身已经是自民党内对华态度相对务实、谨慎的政治家，因此，无论后续谁接任首相，日本的对华政策调整大概率将使中日关系面临更大的压力。

如果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极右翼（鹰派）势力主导政权，日本将更多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人。预计日本政府的对华表态将进一步强硬化，同时加速推进日本防卫力量的现代化与扩张进程，推动修宪议题及集体自卫权适用范围的讨论，并且对中日间敏感技术合作及投资往来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性措施。此外，日本也将会在安全领域强化与美国及区域盟友的协作，通过联合军演、安全合作甚至将美国核武器引入日本等方式强化针对中国的威慑。

如果以小泉进次郎为代表的务实派势力胜出，日本可能会延续当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对华战略定位。一方面，日本将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针对中国采取出口管制、外资审查等经济安全措施。另一方面，日本也将维持与中国的广泛贸易往来和功能性接触，以规避全面脱钩对日本国内产业链、贸易体系造成的不必要冲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经贸领域带来的冲击，以及金融市场的敏感反应，将对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施政空间形成制约。如果新任首相推行大规模对华“脱钩”政策或破坏性贸易举措，可能引发市场恐慌、扰乱双边贸易流动，进而导致日本出口下滑、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等连锁反应。

日美贸易协议与中日经贸动荡带来的双重经济下行压力可能让新政府承担高昂的政治代价，因此除非高市早苗当选并强行突破现有政策框架，否则新政府更可能出台针对性的经济安全措施（例如特定技术领域的管控），而非风险更高的全面脱钩政策。

最后，无论最终哪个派系胜出，近年来日本对华战略定位的整体趋势已明确倾向于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总体方向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不同派系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策略层面：

鹰派领导人将进一步强化竞争与对抗的维度，通过激进的安全和经济政策强化这一趋势；务实派领导人则倾向于采取管控性竞争的思路，以更谨慎的方式处理双边分析，但仍将对华竞争与经济安全保障置于政策序列的优先位置。

问：目前自民党内哪些潜在候选人最有可能接任？他们对华的政策倾向是怎样的？

徐伟钧：第一，高市早苗。高市与旧安倍派渊源深厚，在极右翼阵营中拥有稳固的支持基础。在 2024 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中，高市第一轮的得票数甚至超过了石破茂，这显示出她在动员自民党党员和保守派议员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在对华问题上，高市在日本政治光谱中属于典型的极右翼。她不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更始终持敌视中国的强硬立场。如果当选，预计她将进一步加强日美安保合作、扩大日本的国防投入，主动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脱钩战略，并加强对台湾问题的干涉。

第二，小泉进次郎。小泉凭借较高的民意支持率与家族政治资本占据竞争优势，尤其是在 2025 年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后，他通过有效平稳米价的施政表现进一步提升了声势。同时，相较于政治立场极端且身为女性的高市早苗，小泉进次郎的政策倾向更为务实，且男性身份在自民党传统保守氛围中更易获得认可，这也使他可能得到党内反对高市势力的联合支持。

在对华问题上，虽然小泉进次郎也参拜过靖国神社并发表过一些强硬言论，但整体立场相对务实。鉴于特朗普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对日本经济的冲击，以及日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他可能倾向于避免与中国在经贸领域展开激烈对抗，而是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安全措施，同时维持中日间广泛的贸易往来与功能性接触。在台湾等敏感问题上，他可能采取竞争与风险管控并行的策略，在明确释放对华强硬信号的同时，展现出相对谨慎的实际行动姿态，以规避双边冲突升级。

第三，岸田文雄。岸田凭借三年首相任期积累的深厚资历，也成为潜在候选人中的重要一员。在石破茂领导相对乏力的背景下，自民党内可能会对岸田执政时期的稳定性与政策延续性产生怀念，进而转化成对其参选的支持力量。

在对华问题上，岸田文雄的立场较为稳健，预计将延续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思路。一方面，在安全领域继续深化与美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在经贸领域维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对冲特朗普政府带来的经济风险。

第四，林芳正。林芳正竞争力主要源于其多次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的经历，他在岸田文雄和石破茂执政期间均受重用，可能会被视为能延续前任领导人政策、维持政权稳定的人选。但相较于其他候选人，他在自民党议员与基层党员中的支持率相对较低，这构成其参选的主要短板。

在对华问题上，林芳正曾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是自民党内相对亲华的一派。但是，囿于自民党内部及日本政坛整体的右倾保守化倾向，绝对亲华的政策在当前日本政治环境中缺乏生存空间。即便他当选首相，也只能在推动中日高层对话与经贸交流方面有限发力，而在安全领域甚至经济安全领域（例如供应链管控、出口管制等问题上），仍需与美国保持协调，难以突破现有的对华战略框架。

第五，茂木敏充。作为石破辞职后首位公开表态参选的候选人，茂木敏充占据了话语与动员的先发优势。茂木具有担任外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和内阁府经济财政政策特命担当大臣的资历，在处理对外交涉与经济事务方面经验丰富。在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外部冲击下，他可能被视为能够稳定日本内外局势、开展专业对美交涉的技术型人选。

在对华问题上，茂木倾向于对话与竞争并行的立场。他既重视中日关系的整体稳定性，但是也在安全、领土争端、人权等问题上持明确的强硬态度。如果当选，他可能倾向于在强化对美合作的同时，管控中日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

问：在日美同盟强化的大背景下，新首相上台能在多大程度上实质影响其对华政策基调？新领导人在哪些具体议题上可能有边际调整空间，而在哪些方面几乎必须延续现有路线？

徐伟钧：新首相能够在对华政策上进行有限的边际调整，但是难以突破以日美同盟为根基的原则性框架，整体对华政策基调无法实现根本性转向。这一约束既源于日美同盟对日本外交战略的结构性锚定，也受制于当前自民党执政格局与领导人政治资源的现实限制。

从历史来看，日本首相确实具有实质性调整对华政策基调的操作空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安倍晋三为了应对特朗普经贸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曾经采取了一种对冲战略，有效改善了对华关系。当时日本在经贸领域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甚至调整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并且推行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但是，安倍能够实现这样的政策调整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一，他在自民党内构建了根深蒂固的权力网络，能够有效协调派系分歧和压制反对力量；其二，长期执政积累的政治威望与稳固的民意支持，为其提供了突破政治压力的资本。

反观当前，“自公联盟”处于少数执政状态，党内缺乏拥有广泛民意基础与跨派系号召力的政治人物，新任首相既没有足够权力整合党内意见，也缺乏稳定民意支持来支撑风险较高的政策转向，因此难以复刻安倍时期那样大的政策调整。

总体来说，日本新首相对华政策的调整最多只能做到在大框架下的微调，也即在不触碰日美同盟核心利益、不挑战国内保守政治共识的前提下，通过策略性调整缓解中日局部摩擦。

具体到议题层面，新首相的边际调整空间可能集中于：对华外交话语的强度（如在公开场合提及中国时的措辞强弱）、对台湾问题表态的语气（是否避免直接触碰敏感表述）、中日高层接触的频率（如领导人会晤、部长级会晤的频次），以及经贸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等。但是在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安全框架、推动日本军事现代化的大方向、与盟友在技术出口管制和关键供应链合作上的协同等方面几乎必须延续现有路线。

问：领导层变更是否可能带动两国舆论氛围变化？如何处理历史认知问题（如靖国神社参拜）将对关系改善产生多大影响？

徐伟钧：虽然石破茂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已属于自民党内相对稳健、温和的一派，但其部分行为仍引发了中国舆论的不满，例如未在战后 80 周年的时间节点发表具有反思性的讲话，且在 8 月 15 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这些举动已凸显出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社会认知的差距。而随着领导层的变动，中日舆论氛围不仅难以出现积极转向，反而存在显著恶化的可能性，其中新首相的历史态度将成为重要影响因素。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高市早苗或小泉进次郎当选首相，其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将直接激化中国舆论情绪。他们都在 2025 年 8 月 15 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如果他们在当选首相后，进一步在 10 月 17-19 日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期间再次参拜，将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实质性冲击。

在官方互动层面，这可能直接导致双边高层互访暂停、双边对话机制取消或冻结。在民间层面，这种行为将引发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强烈不满，进而可能催生民间层面的对日抵制行动，例如在消费、文化交流领域的自发限制。更严重的是，随着两国之间围绕历史问题争端的升级，近年来中日通过务实合作积累的关系改善基础将受到侵蚀，使双边关系陷入对抗与反制的恶性循环。

日本参议院选举如何影响美日关税谈判？

陈佳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导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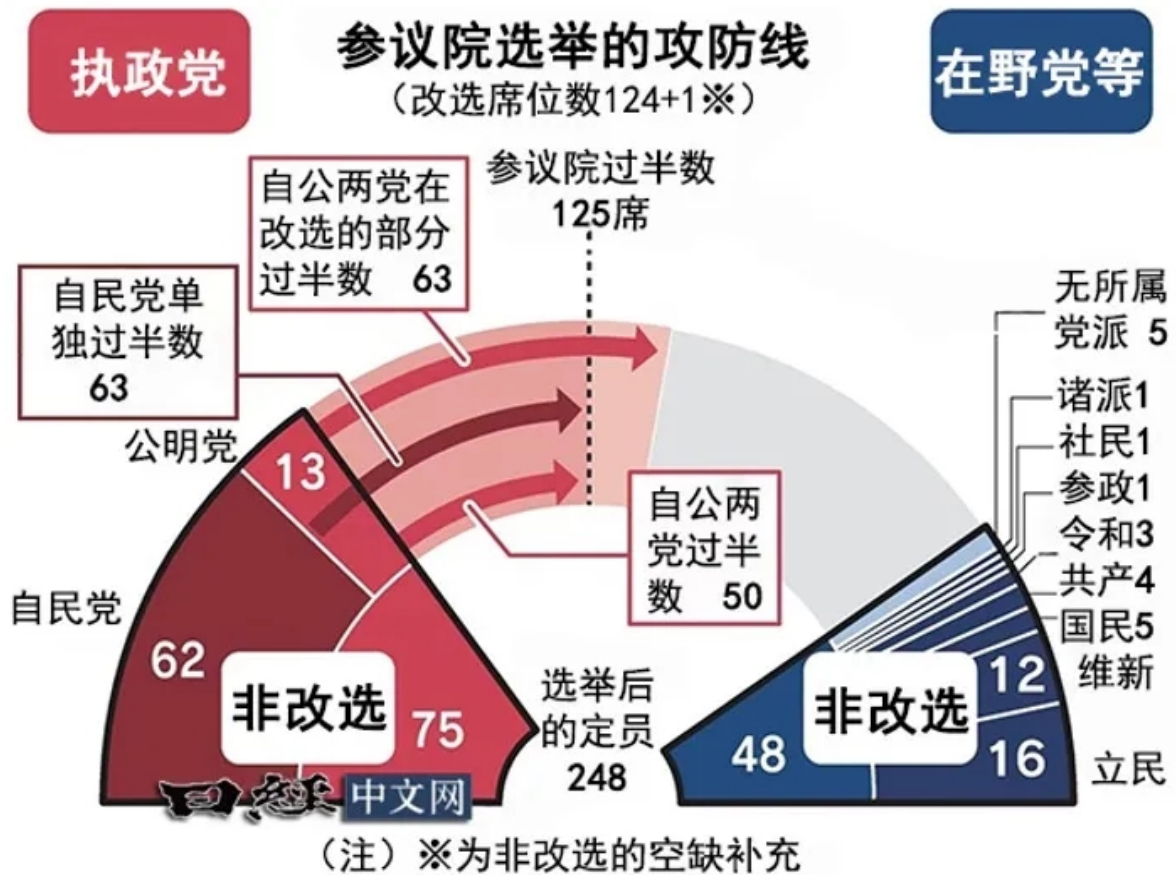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致日本首相石破茂的公开信，宣布美国将自8月1日起对所有日本产品征收25%的关税，该税率比此前宣布的24%还高一个百分点。特朗普也在采访中持续表达对日贸易赤字不满，施压日本政府在汽车进口、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上让步。而随着日本参议院选举临近，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日本政府对美贸易中维持相对强硬的姿态。据多项民调显示，执政联盟在参议院的预期席位数呈不断下降趋势，若最终执政联盟未能获得至少50个改选席位、失去参议院多数地位，石破茂政府可能被迫辞职，导致美日贸易谈判停摆。

IPP 研究助理陈佳慧指出，日本长期处于“对美结构性依赖”状态，从根本上限制了其在贸易摩擦中的战略空间。而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谈判风格以及其对既有国际秩序的破坏，正加速日本民众对美国信任的流失，也暴露出日本对美依赖的高度脆弱性。相比之下，中日经贸合作上有巨大潜力，双边经贸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提供了缓和与对冲的空间。

一、选举倒计时与日美关税谈判僵局

石破内阁自成立以来始终面临执政稳定性薄弱的困境。2024年9月，石破茂就任自民党总裁兼内阁总理后，10月即宣布进行众议院改选。然而，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在众议院未能赢得过半数席位，石破内阁成为少数派政府。此次7月20日参议院选举，执政联盟需改选议席为自民党52个、公明党14个。

目前，执政联盟需至少赢得50席，方能维持参议院过半优势。此次石破茂将执政联盟赢得至少50个改选席位定为胜负线，远低于需改选席位。可见，6月东京都议会选举惨败、民调持续低迷、政治献金丑闻、通胀压力增大以及对美关税谈判进展不顺等多重问题叠加，执政联盟议席减少已在预料当中。



图片来源：日经中文网^[1]

日本民调机构对选举的结果预测也出现分化。日经新闻乐观判断执政联盟“有望过半数”，而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则认为“尚不确定”，《周刊文春》更直接预测执政联盟将“失去多数”。^[2]若执政联盟失去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石破政府面临两院少数党局面，“扭曲国会”情况加

剧，其政策推行和执政能力将受到进一步削弱。石破茂恐只能引咎辞职、重组执政联盟或者直接解散众议院来突破僵局。

在本次选举中，围绕经济议题的争夺成为各党核心。NHK 民调显示，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为“社会保障及少子化” (29%)以及“应对高米价及物价” (28%)。^[3]自民党提出发放现金补贴而非减免消费税来换取民意支持。根据共同社 7 日民调，超过一半民众反对向全体发放现金补贴的竞选承诺，选民仍更期待切实的结构性改革而非短期的政治收买。值得一提的是，主张“日本人优先”的极右保守党派参政党有异军突起之势。根据 NHK 的 7 月民调数据，其支持率 (5.9%) 仅次于自民党 (24%)、立宪民主党 (7.8%)。^[4]侧面反映执政联盟在回应年轻群体民意诉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的乏力。

在同一调查中，8%的选民将“应对美国关税”视作投票时的首要考量。

2025 年 2 月美日首脑会谈后，双方发表《追求日美新黄金时代》的积极声明，日本承诺将安保支出增加至占 GDP2%的水平，并将对美投资规模提升至 1 万亿美元。

但这些举措并未能使日本豁免于特朗普掀起的“解放日”关税冲击。日本是最早启动对美谈判的国家，特朗普也意图将日本打造为“谈判模版”，但进展缓慢，反而迟于英国、中国及越南与美国达成初步框架协议的节奏。至今，美日之间已举行了七轮磋商，部长级谈判仍在继续推进。日美关税谈判僵局也成为朝野攻防焦点。在 7 月初的 NHK 参议院选举党首辩论节目中，部分在野党呼吁更积极的应对策略，认为应联合其他经济体共同向美方施压，同时提升日本战略自主性。（表 1）

表 1 日本各政党对美日关税谈判立场

政党	民调支持率	对美日关税谈判立场
自民党（执政党）	24%	强调坚守国家利益，不轻易妥协；不接受美国对防卫费的具体要求，决策权在日本
立宪民主党（最大在野党）	7.8%	倡导高层直接对话，争取延长谈判并将降低关税至 10%
公明党（联合执政党）	3.5%	发展自主技术以实现和美对等、应对风险
日本维新会	3.1%	但不能过度依赖美国，应以日本为中心拓展与价值观相近国家的贸易合作

日本共产党	3.0%	强烈反对美方关税与军费要求，应在东亚峰会等平台推动国际协调
国民民主党	4.9%	警惕汽车业受创，主张通过减税扩大内需
令和新选组	2.8%	美国知道可从日本“轻易获取”利益，应彻底扩大内需并废除消费税
参政党	5.9%	特朗普正意图重塑全球规则，日本应发展内需摆脱对美依赖
社民党	0.7%	应明确表达反对立场，维护自由贸易与国民生活，防卫费扩张正在压缩教育与农业预算
保守党	1.4%	质疑美方动机，对日关税或隐含政治不满

资料来源：整理自 NHK^[5]

此次美日谈判难以突破的直接原因在于，石破政权的稳定性不足，且叠加参议院选举周期，实质性地锁定了日本在关键议题上的谈判灵活度。

首先，石破茂政治根基不稳，面临自民党支持率波动、派阀政治余波未平等现实挑战，在对外谈判中必须妥善平衡内部政治压力与外交立场。

其次，为争取更多谈判缓冲期，面对美国持续施压，日本立场也趋于强硬。石破茂在公开场合多次强硬表态，将美国对日关税视作“国难”，表示不会轻易妥协，并呼吁选民要支持更加稳定政权来解决问题。强硬立场符合石破茂一贯主张推动美日同盟“对等化”的政策形象，同时也契合日本国内日益升温的对美质疑情绪。根据《读卖新闻》2025 年 6 月 30 日发布的民调结果，仅有 22% 的受访者表示“信任美国”，为自 2000 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

[6]

在此情况下，任何被视为过度让步的举措都可能被视为妥协进而招致强烈的国内反弹，动摇石破政权本就脆弱的执政根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7 月 3 日接受美国 CNBC 采访时也表示，日美谈判受到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举的限制。^[7]

在谈判陷入僵局且 90 天谈判期限到期之际，特朗普于 7 月 7 日向包括日本在内的 14 个国家发出“关税信函”，重申将对日本进口商品关税升至 25%，比最初宣布的 24% 高出 1 个百

分点；如谈判未果，还可能上涨至 30-35%。这实际上将谈判时间延后至选举之后的 8 月 1 日，反而为日本争取了缓冲期。

这一举措并不意外。类似的情形曾出现在 2019 年美日贸易谈判中，当时为避免影响日本参议院选举，美日双方选择暂缓推进谈判进程，待安倍政权完成选举、赢得稳定多数席位以巩固执政基础后，美日才加快协商，并于当年 9 月迅速达成阶段性协议。本次谈判中，日本的强硬立场也可视为一项有意为之的“拖延战略”，其核心目标在于将实质性让步推迟至选后，既规避对执政联盟票仓的短期冲击，也为评估他国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之间谈判进展，预留政策调整空间。

二、美日关税谈判中的两大“顽疾”

参议院选举结果难以扭转日本对美谈判的整体走向。因为本轮美日关税谈判进程虽直接受国内选举议程牵制，但本质上必须在日本对美结构性依赖的背景下理解。在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结构现实下，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日本在贸易摩擦中对美采取强硬立场的战略空间。自 1960 年以来持续不断的美日贸易争端中，日本都因美国压力而被迫妥协。1960—1970 年代的美日纺织谈判中，由于日本为争取美国支持冲绳回归，面对美方在贸易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日本只能接受削减纺织品出口、扩大美国产品进口的安排，这也成为“经济换安全”的典型。

这也是为何，在竞选演讲中，在野党普遍批评石破茂外交无力，质疑其与美方缺乏高层信任关系，但却未能提出更具可行性的替代方案。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在 6 月 19 日决定不对石破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名义上是为避免干扰正在进行中的美日关税谈判，实则反映了一个政治现实：在当前政治与外交压力交织的背景下，几乎只有自民党具备足够的谈判经验、政治资本与制度资源，能够处理这场复杂且高风险的对美交涉。

这一结构性问题还体现在双边谈判目标分歧中。

其一，在交易范围上，特朗普则希望借关税谈判撬动其他议程，希望和包括日本等盟国在内达成包括军费分摊、汽车进口及贸易逆差三大主要议题在内的“一揽子”交易；日本则强调贸易谈判必须与货币汇率、安全保障等问题分开处理，避免被美日安保同盟所牵制。

其二，在交易条件上，美国希望通过扩大对日农产品、汽车与能源出口来缩减双边贸易逆差，具体要求包括扩大日本对美大米、玉米、马铃薯等农产品的进口、增加美国汽车等工业制品的进口份额，加强日本对美在造船业等方面对美国的投资与合作等；日本以扩大对美投资和加强美日经济安全合作为交易筹码，维护本国农业部门免受美国产品冲击，同时争取全面取消美方对日本汽车及零部件的关税，包括 10% 基准关税。

在 2019 年美日贸易协议谈判中，日本向美国食品和农产品开放约 72 亿美元的市场，但大米、汽车等敏感商品的谈判均被搁置，这两大议题长期是美日贸易中被反复提及的“顽疾”。

一方面，大米等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自民党选票根基，是日本的“政治生命线”。尽管农业在 GDP 中占比不足 1%，日本农协（JA）是自民党核心支持力量，凭借其高度集中化的组织结构及对农村选区的广泛动员能力，在自民党的政治动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通过“政官农”铁三角在日本的大米保护政策中拥有显著影响力。

随着农业人口锐减、老龄化加剧，城市中产成为受大米价格波动影响的主要群体。2024 年 10 月份众议院选举时，自民党在选前未能采取有效的米价调控手段；如今自民党为争取都市年轻选民选票，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采取了绕开农协、直接释放储备米入市的改革方案，有效平抑米价，石破内阁支持率也在 6 月出现罕见回升。

但是，短期红利掩盖不了中长期政治风险。截至 6 月底，日本近 90% 的储备米已被投放市场，届时日本也将不得不再次面对政策改革以及“是否扩大进口”的艰难选择。特朗普谴责日本面临米荒也不愿进口美国大米，事实上，日本每年免关税进口 77 万吨大米中有近 45% 来自美国，但超过“最低市场准入（MA）”免税进口配额后的超高关税仍阻碍大米市场自由化。这次谈判中，日本政府同样强调不会接受牺牲农业利益的交易模式，大米保护主义的谈判底线难以打破。

另一方面，汽车产业关税牵动经济全局，是日本的“经济生命线”。早在 1980 年代美日汽车争端中，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实行汽车“自愿出口限制”，并通过产业升级与在美本地化生产实现了长期突破。如今，汽车产业已成为日本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贡献了超过 40% 的 GDP，也深度嵌入其对美出口结构之中，构成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核心来源。

2024 年，日本向美国出口约 7.2 万亿日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汽车行业已经受到现有关税的影响，5 月份对美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5%。^[8]对美出口汽车减产也将导致就业减少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据推算，若美国最终实施高达 25% 的汽车关税，此举预计将导致日本实际 GDP 下降 0.36%，^[9]几乎相当于抹去一整年的经济增幅。

三、日本对美关税谈判的三大“筹码”

在农业与汽车等传统议题受限于国内选举压力、政策空间收缩的背景下，日本试图逐步将谈判重心从传统关税议题转向美日共同关注的“经济安全”议题，试图通过在其他非关税谈判领域的合作来缓解关税压力。现阶段，日本主要依托三大筹码：美债、对美投资和经济安全合作。

一是利用美债最大持有国地位起到象征性威慑作用。日本作为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国之一，理论上具备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冲击的能力。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并未明确表示不会抛售美国国债，而是模糊表态称美国国债也是谈判筹码之一。

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抛售美债的可能性很低。因为这不仅会引发全球市场动荡，还将导致日元升值，进而严重打击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可能被美国视为破坏联盟互信，政治代价远超经济收益。因此，美债更多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威慑工具，难以真正转化为实质性反制手段。

二是加大对美投资并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在当前谈判中，尽管日本仍希望争取全面关税豁免，但已逐渐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日本在谈判策略上逐步转向强调日本连续五年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以及日本投资对美国本土就业和产业稳定的重要意义。

业界也早有日本必须适度妥协的准备，日本车企选择通过继续扩大在美本地化生产来减少关税影响，以及考虑推动“反向进口”美国制造车辆来换取关税减免。此外，为缩小美国贸易逆差，日本正在探讨增加美国大米关税进口额度以及扩大进口美国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可能性，但与特朗普所期望的贸易逆差大幅收窄的目标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三是推动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战略协同。美日贸易谈判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稀土和 AI 核心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2025 年 2 月美日首脑会谈中，特朗普当面表示美日将携手对抗中国的“经济侵略”；4 月，美日韩外长联合声明，明确提出要在能源安全、关键矿产、造船等领域强化协调。在全球经贸高度相互依赖的格局下，美国试图重构产业链体系的战略难以单独推进，需要协调盟友共同配合。

在此背景下，日本则试图以供应链协同、技术联盟建设和小多边机制配合等为谈判筹码，主动对接美方战略诉求，在以下几个重点方向推进协作：

(1) 半导体供应链协作。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议通过提供财政补贴，支持日本电信与 IT 企业大规模采购美国芯片，采购总额或达数十亿美元。同时，日本也承诺协助美国降低对台积电等单一制造基地的依赖，在半导体材料与设备制造环节提供关键支持。^[10]此举不仅有助于缓解美日贸易逆差，也成为日本在谈判中“以投资换豁免”的重要手段之一。

(2) 增加天然气进口和能源合作。在 2025 年 2 月的美日首脑峰会中，双方宣布将以“互利方式”推动美国液化天然气 (LNG) 对日本出口，同时两国将组建“合资企业”承诺支持阿拉斯加价值 440 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然而，分析指出美国 LNG 对日出口由于需长距离

运输，并不具备成本优势；且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因偏远位置和建设成本高昂，包括日本石油勘探公司（JAPEX）在内的业界人士都认为此提议缺乏商业可行性。^[11]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日本从美国进口 LNG，不仅回应了特朗普扶持传统能源集团的政策偏好，也可以填补中国因关税争端而减少进口的订单缺口。因此，该合作政治性大于经济性，能源格局进一步沿地缘政治分界线重新排布，其市场阻力也不小。

（3）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已成为中国反制美国关税的关键筹码，而特朗普自再度上台以来即就对相关资源展现出高度重视。以 2010 年中日关系恶化、中国限制向日本出口重要矿产为契机，日本开始推行多元化资源战略，包括扩大海外投资、强化储备管理及提升回收利用技术。至今，日本几乎参与了美国建立的全部关键矿产联盟，协助美国减轻对中国稀土的依赖。2025 年 6 月 G7 峰会最终发布了六份独立的领导人联合声明，集中于与美国战略利益高度契合的 AI、关键矿产等核心领域。7 月，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宣布启动“四方（Quad）关键矿产倡议”，以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和多样化。此类合作倡议中都有明显的对华指向性。

（4）高端制造如钢铁和造船领域合作。在日铁收购美国钢铁案中，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以经济安全为由制止收购，经过多轮谈判交易，美日联手在高端钢材领域共同抗衡中国逐渐成为促成收购案的重要考量。最终在 6 月 14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有条件批准收购，前提为两公司需签署《国家安全协议》（NSA）并遵循特殊条款，包括日铁在 2028 年前对美投资 110 亿美元及允许美政府通过“黄金股”（golden share）对关键决策行使否决权。日铁 CEO 桥本英二在收购案后明确表态：“不能让竞争对手中国迎头赶上。”^[12]这使得日铁收购案从单纯的市场交易，迅速转化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联盟整合举措。

此外，中国造船业兴起引发美国焦虑。2024 年，中国在全球新船订单中占据了 74.1%，而 2023 年，美国仅占 0.2%，日本以 15% 的市场份额位居世界第三。日本也提出“日美造船黄金时代计划”，计划设计美日共同基金，与美国联合在军舰、破冰船建造等高附加值领域发力，助力美国造船业复兴。

在当前关税谈判中，日本正尝试将“经济安全”议题转化为实际利益交易的平台，强化其作为盟友的战略价值，进一步转移关税争端焦点，通过在战略契合度高的议题上达成妥协以为核心利益预留谈判空间。

四、总结

无论参议院选举结果如何，日本对美关税谈判必须直面日本对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日本安保体系与美国深度捆绑，美日缺乏对等谈判的战略空间；另一方面，日本仍是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支持者与受益者。当前谈判僵局，正折射出日本在对美依附与战略自主之间的艰难平衡。

日本在抵御美国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以及争取汽车产业关税谈判空间时，往往主动迎合美日协作应对中国的政治叙事，以强化联盟纽带、换取谈判空间。这种策略非但无法改变其在对美结构性依赖中的被动地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其作为美国附庸的政治现实。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谈判风格和对国际秩序的破坏行动正加速日本民众对美信任的流失，也暴露了日本对美依附的高度脆弱性。

相较之下，中国在本轮全球贸易摩擦中的不妥协立场与对多边贸易秩序的维护姿态，正成为包括日本在内诸多国家制定对美应对策略时的重要参照，也为其他经济体“以时间换空间”的谈判策略以及贸易多元化提供关键缓冲期。日本虽难以摆脱与美的深层捆绑，但也积极通过强化与中国、东盟、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关系来对冲风险。

中日两国拥有巨大的经贸合作潜力，双边互动也持续释放积极信号：2025年3月中断5年的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重启，5月三国同意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6月中国有条件恢复日本部分水产品进口，并于7月恢复已中止24年的日本牛肉进口，这些举措在客观上缓解了日本相关产业在美国关税战下的出口压力。在深化对美排他性合作与参与包容性多边经贸合作之间，日本必须谨慎平衡。若一味迎合美国战略诉求，反而可能饮鸩止渴，陷入新的依附陷阱。

*参考文献:

- [1]日经中文网, 日本参议院选举公示, 物价对策成为焦点, 2025 年 7 月 3 日,
<https://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politics/society/59276-2025-07-03-10-50-53.html>
- [2]小倉健一, 「競馬新聞のほうがまだ当たる」参院選、読売・朝日・日経が正反对予測の致命的実態, Yahoo News, 2025 年 7 月 9 日.
<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f8aa7e45ecc3772ccb8009629b3278e0dcfd074a?page=3>
- [3]NHK, 内閣支持率, <https://www.nhk.or.jp/senkyo/shijiritsu/> (访问时间: 2025 年 7 月 15 日)
- [4]同上。
- [5]NHK, 与野党党首米関税措置対応など意見交わす, 2025 年 7 月 6 日,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50706/k10014855141000.html>
- [6]读卖新闻, 米国「信頼する」 22%…読売世論調査, 2025 年 6 月 29 日,
<https://www.yomiuri.co.jp/election/yoron-chosa/20250629-OYT1T50117/>
- [7]NHK, Bessent: Election gives Japan 'domestic constraints' on cutting trade deal, July 4 2025,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20250704_04/
- [8]Justin McCurry, Japan walks line between recession and submission as it seeks to overcome Trump tariffs., The Guardian, July 4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jul/04/japan-submission-recession-trump-tariffs>
- [9]大和総研, 米国による 25%の自動車関税引き上げが日本経済に与える影響, 2025 年 5 月 27 日, https://www.dir.co.jp/report/research/economics/japan/20250327_025005.html
- [10]朝日新聞, 米半導体製品、数十億ドルの購入を提案日米関税交渉で政府, 2025 年 5 月 28 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5W3Q3JT5WULFA02RM.html>
- [11]Sam Reynolds and Christopher Doleman, Prices, not politics, will shape U.S. LNG flows to Japan going forward, 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 February 27, 2025,
<https://ieefa.org/resources/prices-not-politics-will-shape-us-lng-flows-japan-going-forward>
- [12]The Asahi Shimbun, Nippon Steel plans new U.S. mill to compete against Chinese,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5899991>

战后日本决策过程的演变，是如何影响中日关系的？

——第 19 期 IPP 明远讲坛实录

（2023 年 11 月 20 日）

王新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

导语：

2023 年 11 月 20 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王新生教授做客 IPP 明远讲坛，围绕“战后日本决策过程演变与中日关系”主题展开深入分析。他指出，战后日本的决策过程经历过三次变化，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官僚主导型，转变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执政党主导型，进入 21 世纪后则逐渐转向首相官邸主导型，即首相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主导性作用。三个时期均深刻塑造了中日关系的走势。

在中日关系陷入紧张的 2025 年末，再次回顾王新生教授的演讲，对于我们判断未来日本政坛走向、日本对华政策的可能取向具有重要意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日本战后决策过程的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战后日本的决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70年代以前是官僚主导阶段，70年代以后是政党主导阶段，而新世纪以后则进入了首相官邸主导阶段。

官僚主导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决策过程被称为官僚主导的决策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局时常动荡，有“十年九相”的情况，但日本社会却保持了相对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优秀的行政官僚对社会的治理。官僚主导决策过程的形成有以下几点历史成因：

第一点是传统的精英集团构成的行政官僚队伍。

日本官僚在近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精英集团。当年，伊藤博文在欧洲考察宪法后，深刻认识到培养专业官僚和人才的重要性，并于1886年成立了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以培养国家所需的官僚精英。到了20世纪初，东京帝国大学已经发展成一个专业的行政集团。即便在今天，日本国家公务员中仍有约70%毕业于东京大学，而在一级国家公务员的事务官法律职位中，100%来自东京大学法学部。

第二点是关于占领时期的改革。在太平洋战争中，美日双方在硫磺岛、冲绳等战役中爆发了极为惨烈的战斗。日本军队受到“武士道”精神和耻辱文化的影响，抵抗到最后一兵一卒。战后，美国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对日本实施了彻底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特别是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中，占据权力的政治家几乎都被剥夺了公职，1946年日本战后首次大选，80%当选的都是新议员。

但不同于对德国的直接统治，美国对日本采取了间接占领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虽然美国通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进行实际控制，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日本原有的行政机构和官僚系统来执行政策。

因此，日本的机构和人员基本保持不变，在被剥夺公职的20多万人中，官僚系统只有500多人，受到的影响较小。除了内务省这一权力过大的机构被撤销外，其他机构基本未发生重大变动。这也是官僚能够主导决策过程的一个因素。

第三点是吉田茂（Yoshida Shigeru）和吉田路线。

吉田茂出身东京帝国大学，长期担任外务省官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日本首相，领导日本度过了战后初期的动荡时期。他上台后对官僚系统进行了调整，将一些重要的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副部长）转任为国会议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和佐藤

荣作。吉田茂在其政治生涯中先后组织了五次内阁。每次内阁成立时，他都会任命一些新的大臣，因此也被称为“大臣制造商”。

此外，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这意味着政府由国会中的多数党或执政联盟组成，内阁成员多由国会议员担任，负责各个省厅的大臣或长官职务。然而，实际上 80% 的法律草案来自官僚，许多法律草案的技术性问题通常由局长级官僚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代替政治家进行答辩。这种情况在 1993 年后才有所改变。在此之前，尽管自民党也有决策机构，但通常不直接参与法案的起草，而是更多地审议由行政机构起草的法律草案。

官僚主导的决策过程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大程度上导致中日之间未能建立外交关系。

最主要的原因是官僚集团遵循的“吉田路线”。战后，《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确立了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简单来说，日本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军事安全事务则交由美国负责。这一政策带来了一个负面遗产：尽管日本成为了经济巨人，但在政治上却是侏儒。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几乎完全依赖美国。

日本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也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压力。1952 年，第一次“吉田书简”是在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吉田茂政府施压的背景下达成的，其中明确要求日本不得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而必须与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日本官僚集团也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日台贸易更为重要。1952 年 4 月，日本与台湾当局正式建立“邦交”，而中日关系依然紧张。到了 60 年代，中日关系开始出现转机。1962 年，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廖高备忘录》（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廖承志与日本前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签订的备忘录，亦称“LT 备忘录”，编者注），开启了民间贸易合作的序幕，为“以民促官”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一合作引发了台湾当局的不满，因为日本通过进出口银行向中国大陆提供融资，直接触及到了台湾当局的神经。1964 年，在台湾当局压力及官僚集团的推动下，日本递交了第二次“吉田书简”，明确禁止日本政府系银行为中日民间贸易提供贷款，并重申不与中国大陆发展官方关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日之间未能建立外交关系，但日本与台湾当局却建立了“邦交”关系。

政党主导时期

1970 年代以后，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政党主导时期。在这一阶段，自民党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并出现了大量的政策专家。特别是在自民党内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

体，被称为“族议员”，指在特定政策领域具有深厚专业知识的政策专家。例如，田中角荣的“建设族”、小泽辰男的“厚生族”，以及冷战后兴起的“国防族”和“外交族”。

要成为族议员，需要满足多个条件，包括必须连续当选并拥有稳固的票田；精通特定政策领域以及政策制定过程；在特定政策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协调能力。到了1970年代，由于政治家逐渐成为政策专家，并且能够决定行政官僚的任免与升迁，同时掌握行政官僚所需的权限，因此开始主导决策过程。1947年—1996年，日本实施3—5人的中选区制，在26个选区中选举512名众议员。由于每个选区必须选出复数议员，候选人难以单纯依靠政党招牌进行选举，个人名望、地区影响力和资源更为重要，许多政治家发展了个人后援会。

此外，自民党总裁通常担任首相，但首相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也导致自民党内部形成了需要派系支持的局面。所属的国会议员分属于不同派系，支持各自派系首领竞选首相。派系的存在与派系首领的角色相辅相成，尽管近年来派系制度有所松动，但历史上，即便派系解散后不久，通常又会重新出现。总体来看，虽然70年代表面上是政党主导，但实际上，决策过程往往来自于自民党内部的派系主导。派系的力量不仅在党内影响深远，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二阶段的决策过程以政党（自民党）主导和派系主导为特点，自民党内部的田中派和大平派（宏池会）在这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阶段的决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尤为显著，促成了中日邦交的建立，推动了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

田中派由田中角荣开创了1972年“破冰之旅”，率团访华并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会谈。中日双方于1972年9月29日共同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并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中日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8年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条约的达成得益于自民党大平派（宏池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1979年，大平正芳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合作的基础。1984年，邓小平提出扩大中日经济合作的建议后，中曾根康弘政府和田中派的支持下迅速作出积极响应承诺扩大对华经济援助，第二批日元贷款就是重要体现。1992年，在大平派（宏池会）首相宫泽喜一的推动下，时任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美智子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正式访问。

首相官邸主导时期

最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新世纪后首相官邸主导的决策过程。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几个制度背景。

第一是政治改革：从中选区到小选区。小选区制度规定每个选区只能选出一名国会议员，这要求候选人必须获得党的公认，并依靠党的组织力量助选。这种制度增强了政党首脑的权限。此外，自1994年起实施的政党补助金制度（政党交付金制度）进一步巩固了政党的资金优势。这一制度旨在规范政治资金来源，减少对企业和个人捐款的依赖，推动政治透明化。由于自民党议席较多，分配到的补助金也最多，因此自民党的总裁权限进一步扩大。自民党的派系逐渐弱化，政府调查会和总务会的决策能力也相应减弱。

第二是行政改革。2001年，日本对原有的22个省厅进行了改革，将其精简为12个省厅，同时削弱了各省厅的权限。过去掌握日本财政大权的大藏省，被称为“省厅中的省厅”，但在这次改革中，其权力被分解为四部分。此外，财政权进一步集中到首相官邸之下。小泉政府还设立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专门负责决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年度预算。从人员编制上来看，首相官邸的机构规模不断扩大，权限也越来越大。2014年，安倍晋三在第二次执政期间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局，并将其纳入内阁府，同时设立了内阁人事局。这一改革使得600多个科长以上的官员的任命权集中到内阁手中。当年，一个流行词汇“忖度”开始广泛使用，指官员们揣度上意、迎合首相意图的行为。2017年，安倍政府还推动通过了《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修正案，新增了“共谋罪”的条款，令政府增加了对媒体和舆论的潜在影响力和掌控力。

从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到岸田文雄执政时期，内阁府的官员数量不断增加，表明首相的权力逐步扩大，这是首相官邸在决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标志。

此外，日本社会的变迁影响了日本政治结构。在“平成时代”（1989年到2019年）期间，日本社会呈现出两个突出的现象：超单身主义和低欲望主义。这一时期，日本逐步进入以网络通讯为基础的后工业化社会。具体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大和非正式雇佣人员的增加，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初，非正式雇佣人员主要集中在少数产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制造业也开始大量使用派遣员工，几乎所有产业都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种变化显著影响了就业形态、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与此同时，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其次，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单身家庭和不婚率的上升，数据显示，约40%的年轻人选择不结婚，生育率也因此显著下降。为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自2018年开始接受技术移民。

组织率的急速降低带来了深远影响。服务业的快速增加使得许多企业规模较小，这使得建立工会变得更加困难。组织率的持续下降直接导致政治参与度的降低。由于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选民的投票率逐渐下降，许多人选择弃权。在过去，日本政党主要通过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动员。例如，自民党通过与农协的紧密联系，依靠农协选票和财界资金建立了强大的基层网络。自民党长期以来将农村地区视为重要票仓，农协为其提供了大量支持。600 万农民的巨大影响力确保了自民党在地方选举中的稳固地位。与此同时，社会党依赖于日本劳动总评议会（总评），而民社党则通过同盟获取工会的支持。

然而，这一模式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2015 年，安倍政府通过修改《农协法》，将农协的政治动员权限予以废除。这直接削弱了自民党的农村票仓。同时，由于工会等组织的组织率普遍下降，社会党和民社党等传统政党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

决策体系转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决策过程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双边关系的不稳定。因为没法进行政治动员，政党只能集中争取社会中的浮动票，这就导致这个政党首脑的面孔非常重要——他能不能吸引选票，决定了选举的成败。

本次石破茂能够当选首相，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本来石破茂在自民党里没有基础，因为他曾脱离过自民党。然而，奈何他在选民中有影响力，且国会众议院议员的任期差不多结束了，即将面临选举，因此自民党最终选择了他作为选举的招牌。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日本首相基本上一年换一个，频繁的舆论调查也推动了这种被称为“剧场政治家”的现象。这些政治家善于表演，善于许诺选民，善于抓住选民的心，选民也会把票投给他们。因此，首相无论做出什么决策，必须考虑到社会舆论。所以，如今的社会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首相很难采取一些行动。

那么，日本社会的对华舆论情况如何？从 2006 年开始，日本对华的负面印象持续上升，特别是在 2014 年，达到了 93% 的高峰。近年来，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 90% 以上，中国方面相对好一点，但也在 80% 左右。对中日民间舆论来说，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影响最大，这一点双方惊人的一致。总体来看，中日关系的社会舆论还是很严峻的。

这就导致弱势首相在社会舆论严峻的情况下很难改善中日关系。强势首相如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差不多 8 年时间，也只有到执政 5 年后的 2018 年才访华。而菅义伟、岸田文雄，以及石破茂等弱势首相，受到强势制度以及舆论影响较大。

尽管中日关系面临诸多挑战，但仍有改善的希望。在此次于南美洲召开的 APEC 峰会上，各国都感受到来自美国新任总统的压力。从 2024 年到 2025 年，中日之间出现了一些良性互动。尤其是在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随着特朗普当选可能性的逐步显现，中日两国关系开始有所靠近，这也可以被视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外部推动因素。开放对日本人的临时免签也是一个积极因素。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最多，民间投资也是最多的，在中国的民间企业有 3 万多家，经济往来还是非常密切。

但总体而言，日本现任首相石破茂若想改善双边关系，可能面临不少困难。因为他在党内的基础也不稳定，现在整个日本的社会舆论还是非常严峻的。无论如何，中日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从历年的舆论调查中都显示得出来，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承认它的重要性，但也都承认存在一些问题。无论关系好坏，日本都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国家。今天我们主要考察了日本国内的决策过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当然，对于双边关系来说，除了对方的因素之外，我们本身的因素也要考虑。我们在判断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需要考虑日本国内的状况、国际因素，包括我们自己的将来也需要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够全面的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

*以上内容根据嘉宾演讲整理而成，略有删减。

嘉宾简介：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日本历史与政治、东亚政治，代表性著作有《现代日本政治》《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战后日本史》等。

【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

对话张云：中日关系如何走向互信？

张云 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杨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导语：

2023年11月，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张云应邀到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其间，IPP杨丽君教授与张云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谈，两人就中美日关系的最新走势进行了许多具有洞见的分析。

张云教授认为，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实现中美日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在中美关系上，传统的经贸关系“压舱石”亟需升级换代。而新的“压舱石”，可能是在过去几年被停滞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谈判。

杨丽君：张教授，非常感谢您来到 IPP。我们知道您长期从认知角度研究中日关系，并出版了许多著作。《中日不信任构造》正是您于 2020 年出版的作品，这本书在日本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想从您的专业，也就是认知理论的角度，讨论中日关系的几个问题。

我们观察到，近几年来，中日关系虽然没有特别恶化，但受中美关系的影响似乎也有所波动。我们尤其注意到，日本的报纸在提及中日关系时，经常聚焦于技术安全保护、防止技术被中国窃取、中国军事威胁、台湾和南海问题等。

我想请问您，这种报道视角是否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如果是认知问题，这种负面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是一种策略的话，那这背后真正的对华认知是什么？

张云：首先，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到 IPP 这一国家级高端智库。昨天，应杨丽君教授的邀请，在 IPP 做了演讲，并与 IPP 非常有学术活力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互动，感受到了大家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好奇心。

我个人主要从中美日三国关系的角度，结合认知与误认知的理论角度进行研究。

事实上，我们的对话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因为在我们访谈前，中日首脑刚刚在美国旧金山 APEC 峰会，结束了时隔一年的双方会谈。2023 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5 周年。如您所说，如果翻看近年来日方的报道，日本对中国的定位和话语体系似乎在发生变化，提及中国的核心关键词从“和平友好”转变为“军事威慑”和“经济安全保障”。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中美元首会晤，中日首脑会晤都释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积极信号，在这样一个机会窗口期，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实现中、美、日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这是知识界可以做的工作。

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日如何建构一个不受第三方影响的关系，这里的第三方主要指美国。虽然完全不受美国影响很难，但建立一个相对独立、拥有内生动能的中日关系，是走向良性的中日互信之路的必要条件。

我在 2020 年底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日中相互不信任的结构》探讨了这个问题。我希望在 5 年或 10 年后能再写一本书，题目是《走向中日互信之路》。

杨丽君：您刚刚提到说建立一个中日之间有内生动力的关系，我个人也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另一方面，您刚刚也提到了，区域整合对化解冲突的重要性，东亚和东南亚的整体整合是一个关键因素。

如果我们将整个区域的经济整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第二次是中国的崛起，第三次则是东南亚的崛起，包括印尼、泰国、印度和越南等国家，它们的工业化发展速度非常快，共同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崛起。

然而，我也注意到日本的报纸在近年来不仅在国内，还在重要的国际会议场合上推广“民主价值观共同市场”的观点。这可能是日本试图在第三次区域经济崛起中实现一种去中国化的谋略。

张云：我认为，总的来看，我们还是需要关注整体和大势。我特别赞同您讲的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浪潮。从 80 年代的“四小龙”崛起，到 90 年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的第二次崛起，再到现在东盟国家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大势，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您提到了，像印尼这样的大国，过去十年里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 G20 集团的成员，印尼也是伊斯兰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东南亚国家的整体性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大事，这与之前的两轮崛起有所不同。

我想，对于日本的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学者来说，他们不会错过这样一个重要的大势。我期待，如果他们能够看准这个大势并抓住机遇，努力与中国合作，将会实现非常积极的发展。

事实上，2019 年安倍前首相访问中国时，已经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了在第三方进行经济合作的共识。这个共识背后的知识基础，是看到了整个东亚的第三轮崛起，特别是相对落后的东亚国家的整体性崛起——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我认为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东亚版。这个大变局的背后，其实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大势。看不准这个大势，就可能失去机会。只要理解这个道理，我个人认为中日关系通过地区整合的途径还是大有可为的。

杨丽君：我也关注到了，最近中美首脑峰会的结束，以及习主席与日本首相的会面，这些都是中美和中日关系中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虽然中美关系在台海问题和经贸摩擦方面没有取得大的突破，但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恢复沟通机制。

从您的角度来看，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双方对对方的认知产生了一些变化？以及这对未来中日关系或中美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云：最近媒体邀请我写了一篇评论，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塑势”，就是中美之间的双边认知如何改善的问题。

这需要增加中美关系中的“正能量”。我们以前讲中美关系中经贸关系是“压舱石”，但现在有学者提出，这个“压舱石”压不住了。我认为不是压不住了，而是“压舱石”需要升级换代了。

新的“压舱石”可能是在过去几年被停滞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 谈判。这项谈判在特朗普政府之前有很好的沟通，但在特朗普上任以后受到了冲击，拜登政府也延续了一些对华不友好的做法。我认为在中美首脑会谈之后，可以利用这个窗口期恢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推动势头向良性方向发展。这不仅对中美有益，对世界特别是对 WTO 的进程也有良性促进。

第二个层面是地区合作。我们刚才讨论的，第三波东亚国家的崛起，也是地区合作的第二波浪潮的高潮即将到来。东亚国家越是一体化，中美关系走偏的可能性就越小。

您提及的第三个方面，是全球层面的影响。目前，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概念是“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在这方面，中国的表现非常出色，包括在金砖国家的扩容、与中亚国家的峰会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此外，中国还在沙特和伊朗关系的正常化中发挥了调解作用，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这些行动，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不同方式，如对话、斡旋和调解的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解决国际问题的新希望和对新国际关系的期待。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在知识上认同中国等国家的共识，那么中美关系走偏的可能性也会减小。这要求在地区上“塑造正面势头”，在全球层面上也要进行相应的努力。

这三个方面的“塑势”对于中美关系走向正确方向有很大帮助。同样，这也会对中日关系产生良性的导向作用。

杨丽君：我想就着您的观点做一些延伸，在中日关系之间，日本对中国的开发援助 (ODA) 持续了长达 40 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日之间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交流，这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同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摩擦。

那么，ODA 作为“压舱石”，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现在 ODA 结束了，中日间新的“压舱石”是什么？

张云：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日本方面对于开发援助 (ODA) 的问题也比较关心。许多日本人认为中国对于其提供的 ODA 感谢的不够。另外一种说法是，在中国还比较穷的时候，一方面中国接受了日本的 ODA，另一方面，中国又在援助非洲，因此日本对此有些不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ODA 对中日关系的意义呢？这需要从更大的视角和更宏大的格局来考虑，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中日双边关系的小框架内。战后，日本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从废墟中首先实现了崛起。这个历史背景对于理解 ODA 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杨教授提到了东亚崛起的几个阶段。最早是日本的崛起，接着是韩国的崛起。我们可以通过奥运会来观察这一趋势：1964 年是东京奥运会，1988 年是首尔（当时称为汉城）奥运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那么，将来完全有可能举办雅加达奥运会。

如果从这个历史长线来看，我们就不会过分关注 ODA 给中国提供了多少资金，或者中国是否足够感谢这些援助——这些问题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应该从更大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问题：先富起来的国家帮助后富起来的国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国内版“共同富裕”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 ODA 的意义就非常大。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单方面赐予，也不仅仅是要求接受方对给予方表示感谢的单纯关系。这种解释不够战略性、长期性，也不够高瞻远瞩。

当时的 ODA 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应该被正确评价的。我们国家领导人在一些场合的讲话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人没有忘记。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单向赐予和感谢的关系。当时中国虽然贫穷，但仍然援助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我们和他们有共同的命运。

现在，这些国家都有了更好的发展条件，我们的援助方式也在变化。比如印尼这样的国家，他们的大发展需要高铁，雅万铁路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昨天我还去看了港珠澳大桥，这样的项目在将来也很有可能对印尼这样的千岛之国有辐射作用。这不是中国强加给他们的，而是这些国家内生的需要。如果整个东亚都发展起来了，大家都共同富裕了，最后是一个共赢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 ODA，我们可以认为 ODA 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河，而不应该总是纠缠于谁应该感谢谁这样的小事情上，这样的理解减弱了它的真正意义。

ODA 结束之后，中日之间完全有可能出现其他类似于 ODA 的机制。因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的社会经济交往非常紧密。不仅仅限于 ODA，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经贸往来、人员交流方面的互动。例如，在疫情之前，中国的游客数量达到了 1000 万，占当年日本整体外来旅客大约 4000 万的近 1/4。

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预计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加上现在日元相对较低，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更加容易，这也可以促进日本的经济。因此，中日之间在社会、经济领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可以通过新的合作机制来维持和加深双方关系。

人员交往增多后，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也会随之增加。正如所言，“国之交在于民”，随着民间交往的增加，我们可以发现，东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完全有可能在这种文化相通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压舱石”。

但这个新的共同认知需要新的结构上建立。这个新的结构是在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衰退。日本有其优势，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共同进步、共同演进。

基辛格博士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中美关系最终要走上一条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道路，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中日关系。通过相互学习和启发，中日两国可以共同进步，实现共同发展。

杨丽君：我注意到您之前也发表了一些关于东盟的研究，其中包括一本关于东盟的专著。中国履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机制，您认为对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新兴关系有什么样的作用？

张云：东亚一体化的领头羊和先驱不是东北亚国家。因为东北亚国家地缘政治太复杂，尽管中日韩机制存在，但由于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太大，一直没能有效推进。

在韩国首尔，有一个叫做 Trilateral Cooperation Secretariat (TSC) 的国际组织，他们每年也邀请我去发表演讲和讲课，进行一些交流。但这个机构自建立以来，受到了中日韩三国关系的负面影响，地区整合的程度还不够高。

1967 年，东南亚国家成立了东盟，可以说开启了不仅仅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而且是整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中最成功的案例。我大约十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叫做《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这本书的英文版名为“The Logic of the Wea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东盟在硬实力方面不是强者，但在思想和知识上并不弱，他们能够在推动大国关系上发挥重要的机制作用。

杨丽君：最近，我注意到我们商务部发言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正在启动正式加入 CPTPP 的程序，并与各个成员国进行磋商。关于中国加入 CPTPP 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加入后，对中日关系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张云：我认为，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中国的战略勇气和政治决策力。因为 CPTPP 最早是由美国和日本支持的，特别是在奥巴马时期，日本和美国非常积极地推动这个协议。尽管存在一些杂音，比如一开始有观点认为 TPP 是遏制中国的工具等，但最终中国决定要加入 CPTPP，这显示了我们领导层决策层的高瞻远瞩。不因一些杂音而影响我们的大方向，那就是进一步开放，用开放来促改革，用改革促开放。这个大思路反映在包括 CPTPP 在内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当中。我觉得，首先要肯定的是中国决策层的高屋建瓴、战略定力和政治决断力。

第二个方面，从地区层面来讲，CPTPP 可以为地区的新一轮一体化注入活力。虽然 RCEP 很重要，但 CPTPP 的要求更高。这种更高的要求实际上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的一种自我加压，这是一个具有时代使命感的决定。

CPTPP 中，日本认为自己是一个主导者和推动者。然而，未来这个推动者可能是多方共同参与，而不仅是一个或两个国家。这个过程中需要运用外交的智慧和艺术。我认为如果处理得当的话，CPTPP 能成为一个促进中日互相沟通的新平台，体现我们刚才讨论的相互尊重、互相学习和互相启发。我也很期待这个新平台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杨丽君：最近中国国内正在推行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比如大湾区建设和国内统一市场。日本的政界和经贸界，对这些重大改革举措有何关注和反应？此外，如果中国做了这么多重要的改革举措，怎样能够在国际形象方面实现改变，中国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改进？

张云：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昨天，在杨丽君教授的安排下，我们参观了港珠澳大桥，这可以说是大湾区建设的一个标志性和旗舰性项目。另外，我非常尊敬的郑永年教授在推动大湾区建设背后做了大量的知识构建和政策咨询工作，我对此表示最高的敬意。

看到大湾区的建设，我回想起了美国的纽约或旧金山湾区的建设。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的大湾区建设更具有全球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刚才我提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发展中国家或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中国的大湾区建设如果做得好，走得实，就能为这个大变局提供一些智慧和启发。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定位。中国的大湾区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说实话，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在内对于大湾区的认知度还非常低。这一方面就涉及到刚才杨教授讲的传播问题：我们如何去主动塑造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

因为我也在这方面有研究，特别是公众认知（Society Perception）的问题。怎么引导国内和国外的民众对中国的认知，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简单来说,我觉得可能是西方国家还不够了解。他们对于中国的做法有时候还保持着一种传统观念,认为他们以前的做法是成功的,因此对于中国的新做法没有足够的敏感性,表现出一种“钝感”,即“Insensitivity”,而不是“Sensitivity”。

那么,如何提高西方国家对“中国现代化”里程碑式举措和行动的敏感性呢?我个人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要通过第三方来塑造西方国家的认知。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印尼,就是这样一个支点性国家或地区性支点国家。如果他们认为中国的做法做得很好,他们可能会引进这种概念。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造桥、造隧道、造路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的问题——雅万铁路就是一个例子。印尼运用中国的技术来实现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取得成效,它就会成为一个与中国合作的典型案例,并成为第三方来引导西方对华的正确认知。

杨丽君:非常感谢您。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下您,IPP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您也见到了我们很多同事,您对IPP的发展方面有什么建言吗?

张云:我觉得IPP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定位很高,是国家高端智库平台。这是国家对于IPP的一种承认。但是,这种承认要继续下去,而且更上一层楼,可能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东盟。广州作为中国南部的开放窗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广州一直站在前列。IPP坐落在这么一个城市,将来我想肯定会要更多地走国际化、走向世界、拥抱东盟的路线。

大湾区研究,不应仅仅着眼于大湾区这个地区性的一体化,还要着眼于东盟、东南亚国家的辐射效应。这种辐射效应将来有没有可能辐射更广大的地区?

2023年的“一带一路”峰会上,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来访问了,佐科总统走了之后,他直接去了沙特,主持了第一届的东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这就是两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间的互动,而且是伊斯兰世界引导的。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经验如果能够引进或有更多的创新,又有新附加级的新湾区思想的发展,这个反过来可能又会传到海湾国家。这样,中国的理念、声音、形象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国内版”,而是会有“地区版”、“世界版”和“全球版”。

我想从这个角度去思考IPP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而且令人振奋。所以我也希望有机会继续跟IPP保持联系,加强交流。

杨丽君:非常感谢您对IPP的鼓励和支持,希望您以后很快能够再回来。谢谢!

嘉宾简介：

张云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教授还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凤凰卫视《凤凰全球连线》特约嘉宾评论员，《中国日报》（China Daily），《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专栏，《环球时报》（英文版）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6部专著，最新专著『日中相互不信の構造』于东京大学出版会、2020年12月出版。另在 The Pacific Review,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ian Survey, Harvard Asia Quarterl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日本学刊》，等中英日文主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杨丽君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毕业于日本一桥大学。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教授、日本一桥大学特别研究员，在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兼中文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变动、大众文化以及社会运动、近当代中国发展史。

日本崛起对中国的教训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席

导语:

2019年,郑永年教授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对日本崛起历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进行分析。文章强调,日本战后以谦卑姿态实现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功得益于专注内部发展、避免地缘政治冒险,并主动配合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文章认为,日本作为亚洲现代化的“天花板”,其兴衰教训表明:中国需保持谦逊,借鉴日本在内部治理与对外战略上的经验,避免重蹈泡沫经济覆辙,以实现可持续崛起。

在2019年中美开启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可以从日本与美国关系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以及日本自身在处理崛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中汲取经验,以避免重蹈覆辙,实现可持续的崛起。他认为,中国应从日本的经验中认识到崛起之路必然伴随外部压力,应以理性、低调、开放的姿态,平衡好本国特色与普遍价值、民族情感与国际责任的关系,从而突破可能存在的限制,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崛起。

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 (Ezra Vogel) 教授在美国出版了题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的著作。这本书马上被翻译成日文，于1980年出版。在日文版出版之后，这本书一直是日本最畅销、由一位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日本的著作。

不过，1986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便经历了从股市、房市经济的“腾飞”到经济泡沫破灭的全过程，惊心动魄。1991年，另一位西方学者琼恩·沃罗诺夫 (Jon Woronoff) 写了另一本书来回应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书名叫《日本什么都是，但就不是第一》 (Ja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也就是说，日本是否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至少是否如傅高义所说的那样成功，在西方一直是有争议的。

傅高义在谈到为什么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日本第一》时说，主要是“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成绩”。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那么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得很快；等等。傅高义认为，总结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真正目的是“为美国提供启示”，让“美国人一看书名吓了一跳，认真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让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警醒，认识到亚洲文化也能创造奇迹”。

《日本第一》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在日本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在东亚，这本书也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推荐给公务员的必读书。这本书带给日本人的“自傲感”是其他事物难以替代的。日本商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变得洋洋自得，甚至有人借着日元升值势头狂妄地声称“要把美国买下来！”。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度过了“失去的二十年”。此后，与其说日本经济稳定下来，不如说日本处于长期的“滞胀”状态。

诚然，关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存在不同看法。傅高义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也认为日本亟须改革，但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人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被完全抛弃。

实际上，在2000年，傅高义还出版了另外一本书，不过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罢了。这本书叫《日本仍是第一吗？》 (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这本书总结了美国人在哪些方面已经从日本学到了教训，同时也开始讨论日本本身可以接受的教训，提出了日本如何通过

进一步改革自身而继续强大的建议。2016年,日本某刊物推出了一期题为“2050年日本会成为世界顶端强国吗?”的专刊。在专刊中,傅高义仍然表示乐观。

一些人批评说傅高义“忽悠”了日本。不过,总体上,傅高义对日本的评价是客观的。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们尤其是在亚洲对日本总有过高的期望。很多对日本的批评就来自这种过高的期望。今天的日本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尤其是人口老化和社会欲望低下,但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日本并不例外。实际上,较之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问题并非那么严峻。对大多数人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非常适宜居住的“美好社会”。

傅高义本人也认为中国更须学习日本,特别是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不要“学美国不好的地方”。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确是向日本学习的;或者说,日本是中国重点学习对象之一。

但随着国家的继续崛起,很多中国人变得自傲起来,觉得日本经验已不足为鉴。在一些人眼中,甚至连美国都不须要重视了。直到近年来大批中国消费者蜂拥至日本购买各种日本制造品,直到这次中美贸易战开始,他们才发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竟然缺失了这么多东西。傅高义有关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这些观点,值得人们深思。

傅高义非常谦虚,他并没有多说中国可以在日本的崛起过程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很多年来,他一直关切中、美、日之间的关系,论著不少。最近,他完成了一本中日关系的大作,从隋唐讲到现在。如果人们仔细阅读傅高义的诸多作品,不难从中得出中国可以从日本的崛起中学到怎样的教训。这些教训不仅仅是上述内部方方面面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应付本身崛起的环境。

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崛起,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来被中国所超越)。日本的崛起可以说是和平的崛起,这不仅因为日本二战之后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且其他国家也是接受日本的崛起的。崛起、和平、让其他国家接受等,这些都是人们在借鉴日本时须要思考的。

较之其他国家,战后日本人是谦卑的、低调的。1955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10%。在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倍。1968年,日本便超越西德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同时,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1950年代,在世界的眼中,“日本制造”仍然是“廉价”的代名词,但很快日本成为制造业强国,

在很多领域名副其实地赶上和超越了西方，包括美国。日本也成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发展主义型国家”的原型和典型。

日本吸取了二战的深刻教训。二战前，日本统治者被明治维新之后的快速崛起冲昏了头脑，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扬言要把西方赶出亚洲，确立日本的霸权地位。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使本身成为牺牲品（战败），更对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二战后，或许是因为美国掌控了日本的外交环境，日本人埋头苦干。

在对外方面，日本往往把自己“伪装”成西方，和西方话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尽管到1980年代，民间也出现“日本可以说不”的声音，但整体精英界并没有出现这种声音，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的“亲美”立场始终没有变化过。同时，日本主动辅助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也尽力而为。

当然，这也是日本“苦楚”的根源，因为即使日本想改变实际上也很难发生。日本毕竟不是一个完全主权国家，很多政策受制于美国。很显然，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对日本的崛起来说，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就积极面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日本是西方（美国）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美国）容许日本的崛起；就消极面来说，也正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日本的崛起是有限度的。人们经常把日本形容成为亚洲国家崛起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限制。以此来反观今天的中国，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和西方（美国）的贸易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但当日本在经济上的确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的时候，仍然会遭到美国的打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尽管本意是要美国学习日本，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这么看。相反，很多人看到了另一面，他们认为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军事保护，并且向日本敞开市场，但日本并没有真正向美国人开放，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对美不公平贸易的结果。

当时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写了一本题为《交换场地：我们如何让日本领先了》的书，这本书第一章就是耸人听闻的“美国世纪的终结”。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第一》之后，接下来很快就是贸易战、301条款和《广场协议》等。

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友，当美国认为中国挑战它的时候，自然会向中国施加莫大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而且会扩展到包括技术、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第二，针对西方和美国，尽管中国不想“伪装”自己，也“伪装”不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张扬。日本当年的经济和技术的确对美国构成了竞争，美国因此打压日本。中国经济尽管量

大，但在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技术方面离美国还很远。只不过是一些人在近年太高调了，唤醒了美国本来就潜在的“中国威胁意识”。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会最终导向失败。这也是二战前日本的例子，这种心态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所必须避免的。

第三，现在贸易战发生了，人们也不必惊慌失措。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无法逃避；不过人们必须理性面对，任何民族主义的情绪都很难解决问题。较之日本，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优势，即中国不存在日本所面临的“天花板”。中国的发展是自主的，并且中国有市场、有人才、有其他各个方面的能力。只要中国本身坚持对内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外更加开放，中国还是有希望实现崛起的。

第四，自我认同和普遍性之间要实现统一性。中国尽管不能，也不想把自己“伪装”起来，但如果否定本身发展的普遍性或者普世性也是不明智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否认“西方的普世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没有普世性。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的也一样。

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但中国的很多方面也具有普适性。尤其是今天当中国在努力站在世界中心舞台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有普遍性。邓小平和西方“求同存异”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在国际舞台上，“同”要强调，“异”要承认。今天和西方之间的很多“误解”和近年来光强调“异”而避谈“同”，无疑是有关联的。

第五，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性。作为大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是剧变的中国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代表的是内聚力；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很难作为一个整体站在世界舞台上。但同样，作为大国，中国也需要国际主义。各种区域和国际秩序都可以被视为“公共服务品”，大国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提供这些公共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在提供越来越多的这类“公共品”。实际上，包括中国本身的“开放”也已经成为“国际公共品”，而并非简单的内部事务了。简单地说，没有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也很难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文章首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1月29日

【2025 年度回望】

回望 2025，一个在危机中被治理的世界

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荣誉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CSO）顾问理事

导语：

回望 2025 年，IPP 荣誉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CSO）顾问理事梅里·马达沙希认为，国际秩序显露出多重变化：安全逻辑加速外溢，渗入贸易、科技、能源与数据；关税、制裁、出口管制等从“非常手段”变成日常工具，全球化也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与可控”。与此同时，多边机制仍在运转，却越来越趋向“程序性合作”，共识愈发难以生成。权力更分散、规则更分裂、成本更外显，各国正以“不稳定性长期存在”为前提重排国家议程。

她据此将 2025 年界定为一个“门槛之年”，也是一个“转轴之年”。在她看来，危机不再只是偶发事件，而是在走向常态化。文章由此追问：进入 2026 年，如何在多张重叠的版图之间搭建桥梁，在缺乏共同罗盘的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协调与方向感，并重新把权力与责任连接起来。

引言：当世界版图开始错位

2025 年虽不算是国际秩序“轰然崩塌”的一年，但自然也谈不上迎来复兴。它的意义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地意识到——长期影响世界运行的那些“图景”，无论是观念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空间意义上的，已不再重合。权力、合法性、领土、气候风险与技术能力，都沿着不同的逻辑各自运转。曾经看似统一、仿佛可以整体把握的全球图景，如今已经走向碎裂，甚至彼此冲突。

撇开冷战时期不谈，我从未经历过像 2025 年这样令人不安的一年——不只是因为多场重大冲突同时爆发，更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的冲突在地缘政治层面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北约各国政府正处在高度戒备状态，紧盯任何可能出事的信号——不管是承载全球电子通信流量的海底电缆可能被切断，还是无人机在试探其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与此同时，黑客也在不断升级手段，试图让政府机构和应急系统“停摆”。

2025 年被三场性质迥异的战争所标记：乌克兰战事造成约 1.4 万人伤亡；加沙战争已致约 7 万人死亡，其中包括 3 万名妇女和儿童；以及苏丹境内两支军事派别之间爆发的极其残酷的内战。

然而，在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俄罗斯注意到美国总统其实对欧洲兴趣寥寥，似乎已经准备好、也有意推动自身取得更大程度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莫斯科也清楚地意识到：2025 年发生了一件此前多数西方国家都难以想象的事——美国总统可能正背弃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战略体系，而且这位总统现在也反对欧洲目前的发展方向。这种令人震惊的观点，在那份声称欧洲正面临“文明被抹除的严峻前景”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变得清晰起来。

2025 年或许不会被记作一次突如其来的整体崩塌，但更可能被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之年。在这一年，战略竞争加剧、政治走向碎片化、贸易日益安全化、制度运转显露疲态——多重趋势交汇叠加，使“危机”不再只是国际关系中的偶发例外，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运行状态。

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一个“经历危机”的世界，与一个开始在危机中运转，甚至以危机来治理的世界，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种碎片化并非阶段性的偶发波动，而是一种结构性变化。20 世纪末遗留下来的制度、规范与基本假设仍在延续，但支撑它们的现实条件却在不断被侵蚀。到了 2025 年，世界依然在被治理——只是越来越缺乏一个共同的方向标。结果并不

只是混乱，更是一种系统性的错位：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错位，责任与能力之间错位，全球层面的雄心与地方层面的现实之间错位。

我想强调，2025 年应当被理解为一个“门槛之年”：未来不再只是线性延伸，而是出现了断裂。要理解这一年的意义，就必须把地缘政治、气候、城市与制度层面的裂痕放在同一张图里看——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危机事件，而是同一场结构性转型的不同表征，共同指向的是：世界被组织与被治理的方式，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重组。

分裂中的世界秩序：权威犹在，方向已失

在地缘政治层面，2025 年暴露出全球领导力核心的一种悖论：国际体系依然高度制度化，却越来越难形成共同的方向感。既有大国仍保有影响力，但同时深陷内部极化、共识衰退；新兴大国不断强化战略自主，却往往回避全球治理所伴随的责任与成本。其结果是，权威仍在，却缺乏协调。

多边机构在程序层面仍在运转，但其所承载的规范性约束力与凝聚力正在明显减弱。共识变得更脆，谈判更趋防御，宏大的共同目标则一再被搁置。这未必意味着多边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却很可能意味着它正在转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更功利、更碎片化的运行方式。治理并未消失，但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在某些领域依然有效，在另一些领域却格外脆弱。

到了 2025 年，移民压力、非正规城市化、海岸退化与粮食不安全在多个地区相互交织——这些地区早已穿透并打破了传统的“南北之分”。风险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国家，而是开始集中聚集在三角洲、沿海地带、特大城市，以及长期被忽视的边缘地区。

这些带有结构性力量的转型，正在以制度化、强约束的方式重塑安全、金融和战略同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气候适应、城市不平等与环境韧性等议题，往往被放入自愿性、软约束的治理框架之中，因此更显脆弱。这种不对称，正在塑造一种新的责任地理：风险被全球化，而应对却被地方化。

重新武装、重新结盟、并不断对冲风险的世界

回望 2025 年的世界，有一种趋势已不容忽视：主要大国一方面不断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在为长期对抗做着系统性的准备。

全球年度军费开支已突破 2.4 万亿美元，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防预算的上升并非集中于某一地区，而是几乎在全球同步发生——美国、欧洲、东亚以及中东均不例外。美国正

在推进核“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并扩张其国防工业基础。中国则持续推进的军事与海军扩张，目前已按舰艇数量计算，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

俄罗斯已经全面转入战时经济模式。在长期投入不足之后，欧洲国家正加快重新武装，北约内部的国防开支也在实际意义上出现了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同盟关系一方面在收紧，另一方面也在进行风险对冲。各国在公开场合继续作出承诺，却在私下里分散合作对象、供应链和安全保障来源。信任并未消失，但已经不再是毫无保留的信任。

冷战时期，威慑固然令人心生恐惧，但它是高度结构化的：有清晰的红线，有热线机制，有成型的战略理论，也有对灾难性后果的共同认知。而到了 2025 年，威慑却显得更加单薄、脆弱。升级风险之所以更高，并不是因为领导人更加鲁莽，而是因为牵涉的领域更多、参与的行为体更多，所依赖的技术也更加复杂。一次网络攻击、一场卫星系统干扰，或一轮供应链冲击，都可能在无需发射一枚导弹的情况下，产生具有战略层面的后果。

危机管理机制依然存在，但对其有效性的信任正在流失。沟通环境更加嘈杂，信息本身也充满争议。各国领导人不得不在持续的国内压力之下，以更快的节奏、在更低确定性的条件下作出决策。

当下真正的危险，并非蓄意发动战争，而是在高压环境下发生的误判与失算。这并不是在为场特定的战争做准备，而是在为一个充满危险的长期时代作准备。

在 2025 年，安全已不再仅仅意味着坦克、部队或航空母舰；它所涵盖的内容还包括：

网络空间，其中一次攻击就可能瘫痪医院、港口，甚至干扰选举进程。

外层空间，其中卫星支撑着通信、导航以及金融体系的运行。

能源领域，其中的关键咽喉要道与价格冲击足以动摇政治稳定。

数据与半导体领域，在这一领域，掌控权意味着经济与军事上的双重优势。

供应链体系，一旦发生中断，便可能使整个产业陷入瘫痪。

这些新的安全领域催生了一种国家安全外延化的逻辑，并正在重塑其所触及的一切——其中也包括贸易。贸易不再被视为创造稳定的工具，而是被当作一种战略武器来运用。关税、出口管制、制裁以及产业补贴已不再是应急手段，而是日常化的权力工具。战略性产业受到重点保护，技术流动被严格限制，而相互依赖性本身也被视为一种脆弱性。

有必要澄清的是，尽管到 2026 年全球贸易体系仍将继续存在，但它已经发生碎片化。以效率为核心驱动的贸易时代正在让位于以安全为导向的贸易逻辑。供应链将受到更严格的审视，既有的相互依赖将被重新界定为脆弱性，经济工具也将被公开用于战略施压与博弈。全球贸易

规模或许尚未崩塌，但人们对贸易的信任已经动摇。全球化正在被重新设计，而相互依存不再自动带来稳定——在许多情况下，它反而制造焦虑。

作为全球碎片化镜像的气候治理

气候治理，或许最能清楚地映照出这一碎片化秩序。到 2026 年，科学不确定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真正的难题在于政治与制度能力——也就是，能否把共同的判断转化为协调一致的行动。

一个很少登上头条、却在 2025 年深刻塑造全球气候治理不作为的重要因素，是将单边的领土介入，作为威慑与施压工具的战略运用。

这些行动——无论是通过公开的军事存在、事实上的吞并，还是对争议空间的强制性控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主权本身。它们制造出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安全环境，迫使各国重新排序国家优先事项，而代价往往是长期环境承诺被挤到一旁。对许多国家而言，尤其是中等和中低收入国家，领土不稳定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清晰：一个安全不再由集体机制加以保障的世界，正在回归。

在这样的环境下，本质上依赖合作、面向未来、又高度耗费资源的气候减缓与适应行动，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在政治优先级的重新排序中被边缘化。面对战略压力的政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更倾向于把财政能力转向国防、能源安全和边境管控，并将气候行动视为次要议题，甚至变成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

以信任、互惠和长期时间尺度为基础的气候协定，在这种规范性信心不断被侵蚀的环境中，显得尤为脆弱。如果支撑国际合作的秩序本身正在松动，各国又凭什么要为减排承担眼前、切实可感的成本？

在多边层面，这种侵蚀体现为一种“战略性的最低限度主义”。各国在形式上仍然参与气候谈判，但立场愈发谨慎，更强调灵活性，而非雄心。承诺被不断附加条件，时间表一再拉长，落实则持续后移。这或许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对气候问题的否认，而更像是一种“气候犹疑”——其背后的认知是：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速度，已经快于气候治理体系所能稳定下来的速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COP30 等进程或许将同时象征着延续与张力：它们一方面重申了多边参与的持续存在，另一方面也清晰暴露出多边机制的边界。承诺层出不穷，但落实效果仍参差不齐。适应议题的地位显著上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含着一种共识——仅靠减缓行动，已不足以避免严重冲击。（相关文章：梅里·马达沙希：COP30 大会闭幕，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留给世界巨大的问号）

真正的危险并不只是失败本身，而是对“不充分”的常态化接受：这一转变标志着一次关键的心理与政治转折。气候治理不再仅仅围绕防止灾难发生来展开，而是逐渐转向如何管理灾难后果。责任在原则层面得到承认，却在实践中被不断分散。全球气候版图，如同地缘政治版图一样，更多呈现的是妥协，而非协调与一致。

这是一个渐进式进展与风险持续上升并存的世界——一个雄心被不断下调、更多去适应政治上的可行性，而非地球真正所需尺度的世界。

很多国际机构原本是为促进合作而设立的，但到了 2025 年，善意正变得越来越稀缺。规则被选择性适用，一旦不合时宜，多边平台就被绕开。多边主义依然存在，却越来越像一个按需取用的工具箱，而不再是一项需要共同维护的事业。这并不是一场轰然倒塌的制度危机，而是一种更隐蔽、也更危险的状态——制度性的疲惫。

2025 年留下的遗产：一个在危机中被治理的世界

2025 年留下的遗产，是一种持久的心态转变：稳定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成为一种需要被管理、分配，甚至反复谈判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 2025 年比此前的年份更为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一种微妙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了：各国不再把当下视为一段暂时的动荡期，而是开始以动荡将长期存在为前提来进行治理。

防务姿态趋于强硬，贸易限制被常态化；同盟关系更多采取对冲而非信任；危机工具逐渐成为默认手段，应急措施演变为长期策略，例外政策不再例外，危机语言也悄然融入了日常政治表达之中。

如果历史学家日后回望这一年，或许会这样评价：2025 年并不是世界崩塌的一年，而是世界开始接受自身已难以被轻易修复的一年。这正是所谓“转轴之年”的含义所在——它并非不稳定的起点，而是不稳定被真正嵌入、并逐步制度化的时刻。

作为“门槛之年”的 2025 年

2025 年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化解了这些紧张关系，而在于它让这些紧张关系变得无法回避。关于世界能够回到稳定、统一秩序的幻象正在消散。取而代之的，并非必然是悲观情绪，而是一种责任——一种直面复杂性、对其加以治理而非否认其存在的责任。

人们对世界能够回到由一套单一规则所支配的稳定、统一秩序的信念，正在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更为艰巨、也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如何在避免碎片化的同时治理多元，在不走向解体的前提下容纳差异。

从 2025 年逐渐浮现的未来，很可能是多元的、不均衡的，也充满竞争与博弈的。进步将以局部、零散的方式出现，而在其他领域则可能遭遇挫折。治理形态也将呈现出混合特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网络并存，城市与国家相互交织，公共权威与公民创新共同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格局中，真正的任务已不再是重新绘制一张单一的全球版图，而是学会在多张彼此重叠、相互交错的版图中前行：在碎片化的空间之间搭建桥梁，把短期的适应性应对与长期的结构性转型协调起来，以治理成效而非修辞话语重塑合法性，并重新将权力与责任连接起来。

“碎裂的版图”并不仅仅是一种隐喻，它在现实中具有明确的物理呈现，体现为风险分布的高度不均。气候暴露、经济脆弱性与政治不稳定性在空间上日益叠加、相互交织，不断强化脆弱性循环。

这种空间层面的复杂性，对仍然以国家为中心、以领土为基本单位的治理框架构成了严峻挑战。为有限、封闭的国家空间而设计的政策，往往难以应对那些具有系统性、流动性和跨国属性的风险。结果便是治理上的失配：在技术层面高度精密的干预措施，却难以真正触及社会现实。

因此，理解 2025 年，需要一种多尺度的视角，能够同时把握全球体系、国家层面的政策，以及地方层面的现实经验。否则，“碎裂的版图”就不再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反而会变成一种预设——不断固化分裂，而非加以化解。

结论：学会治理一个“版图碎裂”的世界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最终的问题：2025 年所留下的影响，是否将具有长期性？

在“版图碎裂”的一年里所显现的未来，并不是对全球治理的讣告，而更像是一份关于转型的诊断书。世界并非不可治理，而是正在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被治理。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调整制度安排、认知框架与政治激励机制，使它们能够与当下现实的复杂性相匹配。

这需要一次范式转变——学会接受那些曾经被视为非常态的情形，正在变成日常：要适应缺乏清晰护栏的竞争格局，适应快于外交运转节奏的政治进程，适应由恐惧与机遇共同塑造的经济逻辑，适应依然存在却已难以形成广泛共识的制度体系；也要适应在危机条件下作出的决策，即便原初理由早已消退，仍会长期存续；适应例外不断累积，直至反过来重塑规则本身。最终，还要适应一种预期的下移——从对秩序的乐观想象，转向在无序之中寻求可持续的生存。

国际体系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变化的——并非一夜之间，而是通过一次次悄然的再校准。从这个意义上看，2025 年或许将被铭记为这样一年：危机不再是例外，而是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存在。

如果说以往的时代追求的是通过一致性实现统一，那么 2025 年之后的世界，则需要在多样性中建立协调与连贯。城市、气候治理以及不断演化的领导形态，未必会整齐地汇聚到同一轨道上，但它们可以被引导形成共振。未来的关键，与其说在于修复旧有的世界版图，不如说在于培育一种能力——以审慎、合乎伦理且集体性的方式，去理解和辨读新的世界图景。

2025 年很可能被记住为一个多重危机叠加的年份；更重要的是，它并非危机降临之年，而是世界接受危机将长期存在的那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中作出的选择、面临的约束与持续的再校准，深刻塑造了此后多年的国际体系走向。而接下来将走向何方，则取决于适应究竟能转化为更新与重塑，还是滑向消极的接受与退却。

【2025 年度回望】

我的 2025：IPP 人的这一年

2025 年并不是一个容易被简单概括的年份。

世界在失序中重组，技术在加速中演进，个人的生活、工作与情绪，也在持续变化之中。

在这样的一年里，宏大叙事之外，更值得被记录的，往往是个体的感受、判断与选择：哪些事件真正触动了我们？哪些变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哪些收获值得珍惜，又有哪些遗憾仍在提醒我们前行的方向？

为此，“IPP 评论”发起年终策划——「我的 2025」，邀请院内不同岗位、不同研究领域的同事，用最简洁的方式，回望这一年：不求完整，只求真实；不做总结陈词，而是留下思考的切面。

这些回答，有的关乎世界，有的回到家庭；有的指向时代转型，有的落在日常生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属于 IPP 的 2025 年“集体记忆”，也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留下若干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

杨丽君 资深研究员、教授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几位领域内的思想引领者告别了这个世界：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许倬云、柯文（Paul A. Cohen）。他们影响了我。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混沌。世界秩序在重构中，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进展中，社会结构在变革中，AI 正在全面重塑人类的观念和行为。若干年后当新的秩序形成，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中国又将处于什么位置？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家人的平安和健康。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知识没有随年龄而增长。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思想有趣，有思辨性。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居然没进过一次电影院。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家人平安，世界和平！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话说？

早睡早起。

郭海 研究员、执行院长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日本出了位女总理。我一直以为日本是很保守的国家，不太可能让女总理上台。但形势比人的主观意识强。在旧秩序即将离场的时候，少数派往往获得更多机会。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未知的继续。旧的去掉了，新的还未完全到来。很多东西都在回归、回正以及回稳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旧的事物被破除。但似乎没人看得清前路在何处。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孩子又大了一岁。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孩子又大了一岁。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父母的觉醒》。此书的核心观点：子女是父母潜意识的反映。父母无法控制子女，因为任何控制的意图都会立刻被子女识破。怎样区分好控制和爱是父母必修的课程。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今年几乎没看任何一部完整的电影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XX，请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落实经费，谢谢！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蒋余浩 资深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年初 DeepSeek-R1 横空出世，是最激励思考的一件事。最近几年，随着大语言模型问世，“人工智能”让世界震惊，又让我们这些普通人遥不可及，而 DeepSeek 多少把这种高投入的先进科技拉得离生活近一些，让我们能低成本、便利地用一下它——只有先用一下，才可能参与科技精英们一起去思考“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以后会变成什么？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生活在其中既匆忙又焦虑，思考各种变化却很少有理论上的启发。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长期积累的一些理论阅读，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些碰撞点。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没有集中精力完成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Charles Sabel 在 1984 年出版的《第二次工业分水岭：繁荣的多种可能性》。这是一本我早就应该阅读，却一直懒懒散散不愿意投入读进去的书。推荐它的理由是：与 Sabel 论述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从而昭示“第二次工业分水岭”的到来相似，当前的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是否也预示了又一个新的巨大变化，也许是“第三次工业分水岭”？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没有踏踏实实看过一部。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希望关于“包容性人工智能”的思考，多少在实践层面有点落地的苗头。

还希望西班牙再夺世界杯，曾经喜欢的荷兰队成绩至少好一点（现在的橙衣军团不大值得冠军，像上届一样得个季军就很不错了）。

8. 你对 2026 的自己有什么话要说？

对看不顺眼的人和事，和气点

林辉煌 资深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坚挺，令人印象深刻！这和我对中国大规模工业化能力在应对国际经贸冲突的超级能力判断是相符的。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大转型。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在危机和困难中逐渐完成自主转型。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对中国和全球现代化，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主要是家庭层面。和母亲的主动联系少了，对儿子的耐心似乎不增反减。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造化爱几何》。陈省身的故事，很纯粹，对于每个想做好自己事业的人来说，都有启发。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浪浪山小妖怪》。小人物，也可以去做梦，万一实现了呢！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希望普通人能够多一些机会，尤其是就业方面。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把有关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发表出来！

赵巍 资深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查里·柯克被刺杀。这件事反映了美国政治真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兵荒马乱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以理看现实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书稿没交付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日本学者藤本隆宏《能力构筑竞争》一书。该书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现在有借鉴意义。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没有。不过我推荐重新再听听 Metallica 1991 年的 Black Album 黑专辑。推荐原因听了就知道。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依然如故，但祈愿和平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继续读些纸质版的书

余荔 资深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大变局的加速来临。Deepseek 横空出世，让 AI 触手可及。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打碎和重构的边界，无论是物理，认识还是学科的边界都出现前所未有的破坏性重构。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成功开展全国大范围调研。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投入产出比不及预期。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中国叙事》。学习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力。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哪吒 2》。电影中有欢笑和期待，也有命运自主的执行力。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明年会更好！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突破自我！

戴明洁 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年初 DeepSeek 开源模型发布。主要原因就是这一事件很有标志性，其引发的关于中美科技竞争生态位的一系列事件与讨论很有意义。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重塑”。无论是工作环境、研究领域，还是家庭关系、个人追求，都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转型。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内核更加稳定。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内心更加冰冷。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权利与进步：关于技术和繁荣的千年斗争》。科技竞争的背后更多是权利争夺，以及其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哪吒 2》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何期待？

希望 2026 年世界能更加积极、善良、和平、稳定一点。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爱你老己，事浮于人

刘佳 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香港大火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在一个展览上收获了一段很有力量的话语。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还没能把很多书本上学来的道理变成真实的实践。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汉娜阿伦特的三次逃离》。一本漫画小册子，里面有一段极具启发性的话，揭示了在阿伦特思想极端挣扎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本雅明而非海德格尔启发了她。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可能只有《甄嬛传》可以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吧。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世界和平*3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希望书本上的道理少学，实践中的道理多积累。

李明令 副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DeepSeek 的面世。不管大家现在用的是豆包还是 Kimi 或其他，是 DeepSeek 让 AI 大模型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变革。感觉 2025 年是一个转折点，不只是科技，人们的生活与工作观念都在开始革新。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居然连续健身几个月了，但还是菜鸡。坚持去健身房不是因为自律，也不是什么“为了更好的自己”，就只是不想工作不想动脑。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好像很多，但没有刻骨铭心的遗憾。没有排序，遗憾也就没有大小。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今年读书量锐减。但《翦商》有震撼到我，作者的史学想象力实在惊人。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疯狂动物城 2》。今年观影量同样很少，但这部电影的层次太丰富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专业的人都能看到属于他们的主题。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何期待？

希望世界更加平和包容。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千万要提升睡眠质量，不失眠少做梦。

徐伟钧 副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拉开了这一年国际形势动荡与个人工作繁忙的帷幕。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失序，习以为常的规则和秩序逐渐被打破，就连曾经的常识也不再可靠。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出版了第一部个人专著。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期待已久的学术活动因为国际形势而取消，失去了和国内外学者交流的机会。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Furious Minds: The Making of the MAGA New Right》。这本书系统性梳理了美国右翼谱系，写的是美国但不一定只适用于美国，对于理解未来美国甚至世界的走向有一定帮助。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反人类暴行》。本身质量不错，部分人物展现出了“平庸之恶”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是一部适合向世界推广、帮助中国争夺二战叙事主导权的电视剧。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希望中美关系能维持稳定，希望世界和平。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劳逸结合，保持健康。

朱雁翎 副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太多了。比如 APEC 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具有广泛而持续的国际影响力。而且 2026 年峰会将在深圳举办。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关键词是“自主与合作”。关键句是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对自己的研究兴趣、领域和方法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又长大了一岁。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By Jürgen Habermas》。里面有很经典的理论构想，与当代社会仍然密切相关。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魔法坏女巫》。电影展现了音乐、友谊、魔法和真善美的力量。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世界和平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行稳致远

区富祝 副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2025 年人工智能在科研与生产力领域的全面渗透是最深刻的一件事。看到 AI 开始在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中发挥作用，我首先惊叹，随后又感受到紧迫——未来的科研方式可能将被重塑，效率与门槛都会重新定义。这种“加速感”让我意识到学习、适应和创新的重要性。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加速与重塑。2025 年让我明显感到世界在提速，尤其是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科研与工作流程，许多原本需要数周的分析现在可能几天甚至几小时完成。知识生产方式、协作方式都在悄然重塑，既带来兴奋，也提醒我必须持续学习，保持更新节奏。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我意识到未来科研不再仅依赖个人努力，而是人与机器协作的智慧。这种认知转变，比任何单项技能更重要。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在前沿趋势的跟踪与深度阅读上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够。工作节奏紧凑时容易聚焦在执行层面，而忽略了长期视角的思考。未来希望为思考、吸收和探索留出更多空间。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利维坦》。读这本书是一次“回到思想源头”的体验，它让我重新思考个人与国家、自由与安全的边界。社会并不是自然而然井然有序，而是无数契约与治理结构共同托举。当新闻不断刷新、世界加速变化时，霍布斯提醒我回到根本问题：秩序为何重要？人类如何共存？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我推荐《星际穿越》。它用宏大的宇宙叙事讲述一个朴素命题：不确定性孕育希望。墨菲定律提醒我们，未来不是定死的，尝试与坚持本身就是生机所在。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对 2026 年的期待是世界与研究都能在不确定性中保持活力与创新。科技发展、社会变局、国际合作都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希望自己和团队能继续在变化中寻找规律，把握方向，让每一次尝试都能转化为实际成果，同时在探索中保持对未知的好奇与思考。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2026 年的我，希望你敢想敢做，不怕失败，也别忘了记录成长。努力让每一天都有新收获，同时保持好奇心，让生活和工作都充满可能性。

李品保 副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加入 IPP。日子充实，同事友爱，午饭好吃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稳稳的，才是最幸福的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认识新朋友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没来得及和一些老师和朋友好好告别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时间的秩序》，同学送我的，作者用诗意又严谨的笔触拆解时间的本质，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抵抗周遭的琐碎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罗小黑战记 2》。打斗精彩，情节温馨，师姐第一！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为 IPP 做贡献，为家人添暖意，为自己谋幸福

8. 你对 2026 的自己有什么要说的话？

稳中有进

卢克玲 副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Deepseek 横空出世。理由是，中国可以继续可以。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转型。无论研究方向，还是工作心态，都发生较大调整。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勇气。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姥爷离开了这个世界。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遥远的救世主》。表象是商战和扶贫，背后是文化属性，很多人终其一生活在自己的认知局限里。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亮剑》。做精神和行动的战士。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和平与发展。

8. 你对 2026 的自己有什么要说的话？

破局，快速前进。

陈佳慧 助理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对等关税。2025 年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围绕这一命题展开，更深刻理解到政策研究的紧迫性和价值意义。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新锚点。2025 不论是远处还是近处都发生许多值得铭记的事件，未来可能会以这一年作为一个新的记忆锚点来理解此前和此后的世界。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有了新爱好。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到了接受离别的年纪。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小红书。每天得看三小时。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还有明天》。理由很简单：Vote for tomorrow!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世界和平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人生就是体验!

张心旖 助理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特朗普政府发布了 2025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其中两点尤为值得关注：一是文件将“Promoting European Greatness”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并服务于“美国优先”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对德国企业外迁中国这一现象，作为非传统安全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与反思。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变局。国际格局发生结构性转变，AI 技术迅速发展，就业和生活也发生改变。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经过多轮修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团队的书稿即将印刷出版，敬请期待。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奔波在更换工作地点和住所，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亚当图兹的《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可能对理解当下的全球秩序形成的原因和对未来的变局有新的认识和启发。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All Her Fault》。人物刻画很细致，情节紧凑一点不拖沓（很关键），人性剖析很深刻，当然还有演员演技非常牛。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希望经济形势好转一些，不公平减少，社会的活力能得到恢复。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再忙也要锻炼身体！

庄文越 助理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此事，打破了我对日本政治传统的认知，同时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风急浪高甚至惊涛骇浪”，大变局的加速来临。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行稳方能致远。内外变局与自身的诸多困难，让我深刻体悟到，保持积极的心态，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的极端重要性。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由预备党员按期转正。这是组织的信赖和长久以来个人心愿与努力的被认可。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因为自身拖延，没有在重要节点前形成关键性学术成果。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郑永年教授的《制内市场》。这是一本几年前的书，但我直到今年才花几个月的时间对郑老师的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个人认为，这本书对理解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好的切口，兼顾学理性与实践性。

6.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世界整体上会愈发呈现无序化，而在微观层面充满机遇。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应当抓好窗口期。

7.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对自己狠一点，务必按时保质完成自己的承诺与规划。

杨庭轩 助理研究员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香港宏福苑大火。这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虚伪和体面。因为装作体面的人和事都是不攻自破的。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健康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财富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黄宇轩《香港散步学》教会我用心体验一座城市中被人忽视的角落。

6.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新闻女王 2》。至少不是糊弄人的。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因为草台班子而制造出来的意外越来越少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努力工作

刘金程 行政副院长、院党支部书记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中美贸易博弈中，只有中国选择硬刚而且结局舒适。强烈感受到，我们真的开始强起来了。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触底反弹。国家、IPP 还有自己的体重。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一身肥肉，两鬓斑白。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毕业难产。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一定要把它看了。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浪浪山小妖怪。虽然很多是职场烂梗，还是会会心一笑。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回到正轨，继续起飞。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我要控制我自己。

王焱 行政、财务主管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AI 全面渗透我们的生活。（因为本条文字回答生成自 AI）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变化，不确定性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没有失去什么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但也没有收获什么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哪吒 2》。因为只看了这一部电影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对我们温柔点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少和女儿生气

刘深 新媒体主管、政策分析师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是国内的反腐败。今年的反腐看似低调，但是在深度、广度、烈度上都可谓前所未有，覆盖了许多之前鲜有涉及的系统。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深层次的规则重构。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慌不择路”。资本市场慌不择路地押注黄金白银比特币，科技大厂慌不择路地涌向人工智能，企业慌不择路地降价倾销，大变局来临之际，大家似乎都在慌不择路地觉得必须要做些什么，至于做的对不对，谁知道呢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购置了一台 3D 打印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自己非常想写好的一篇文章还没有写完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黄道炫的《铁水流》。它讲述了抗战时期我党的组织与发展，解释了党何以锻造成为拥有铁的纪律的党。理解了昨天，也就更好地理解今天。

6.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大家都跑累了，能不能歇一歇？

7. 2025 最想推荐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

《技能五子棋》。相较于过去几年大家喜欢结构完整、有深意、有厚度的喜剧作品，《技能五子棋》凭借荒诞、反传统而又纯粹的搞笑而爆火，似乎也折射出观众心底沉重的累，只想找到一个纯粹而无脑的出口。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把身体照顾好

李彩霞 编辑、政策分析师

1. 2025 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4 月特朗普掀起的全球关税战，不仅造成资本市场剧烈震荡，更冲击多边贸易体系，加剧地缘政治博弈。特朗普“我说了算”、颠倒是非的作风和话术更是令人错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每个人都有影响。

2. 请用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形容 2025

“瞬息万变”。一方面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地缘冲突频出，不确定性贯穿全年；另一方面科技革新日新月异，AI 迭代速度惊人，甚至快于实际应用。各类变化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信息应接不暇，使人渐感麻木。

3. 2025 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认知提升，坚持锻炼。

4. 2025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5. 2025 最想推荐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重读〈道德经〉》。这本书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帮助我安然入睡。老子在《道德经》中将“道”定义为万事万物客观规律的总和，若能理解这些规律，心态自然会变得平和。我比较认同《重读〈道德经〉》对原典的解读，例如它对“无为而治”的阐释。作者指出，“无为而

治”绝非消极的不作为或单纯顺其自然，其真正含义是“不妄为”。也就是说，人仍需积极去“为”，但要以一种让对象感到自然、不被强行干预的方式行动，从而达到“不刻意作为却能实现目标”的更高境界。因此，“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更高级、更具智慧的“有为”。“无为而治”的前提恰恰是“有为”，只有先有所作为，才可能最终实现无为。书中类似这种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的注解俯拾皆是，既让人心态平和，也让人增长智慧。

6. 2025 年最想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什么？

《哪吒 2》。剧情紧凑、故事明晰，既欢乐又励志；特效震撼、画面绝美，既热血又治愈；细节饱满、隐喻精妙，既酣畅又耐品。

7. 你对 2026 年的世界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世界和平。用 AI 时，麻烦复核一下。

8. 你对 2026 年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

早睡早起。AI 的尽头一定是善待自己，唯有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才能应对未来的变化。而这，需要从睡一个好觉开始。

IPP 动态

(2025 年 10—12 月)

【重要动态】

◆ IPP 参加中宣部智库工作会议

10 月 21 日, IPP 领导班子成员郭海、刘金程赴北京参加中宣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调研会, 并作会议发言。

◆ IPP 精彩亮相教育部“微党课”

2025 年 11 月 7 日,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主办的“2025 年高校党组织示范微党课第七讲”——《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答好强国建设时代命题》在新华网、光明网、央视网、微言教育等多个平台同步播出。本期微党课由华南理工大学等四所高校党员师生共同讲授。其中, 微党课以 IPP 在国际智库交流、对外学术传播等领域的“华工经验”作为典型案例, 系统介绍了学校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实践与成果。IPP 理事长章熙春和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分别出境宣讲。

◆ 郑永年受邀参加 2025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 以“新布局、新发展、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治理新格局”为主题的 2025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广州举行。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受邀参加会议, 并在嘉宾对话环节, 与埃及前总理沙拉夫、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等多位国际前政要共同探讨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 并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

◆ 郑永年两著作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近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 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的著作《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哈萨克语版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人工智能社会的来临》入选 2025 年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

◆ 四位 IPP 学者入选“全国高被引学者 Top1%”

近日, 中国知网暨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2025 全国高被引学者”名单。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资深研究员林辉煌、蒋余浩和余荔入选全国高被引学者 Top1%。

◆ IPP 多篇政策报告获中央及省级部门采纳。

据上级部门陆续反馈, IPP 郑永年教授和戴明洁研究员合作完成的多篇人工智能主题相关报告, 得到中央领导同志肯定性重视; IPP 外交团队针对生物医药、全球化、俄乌冲突、对华经济政策等议题的多份报告, 近期分别获得中央领导及国办、有关部委、广州市等批示和采用; IPP 外交政策研究团队围绕中美关系、APEC 峰会的多篇研究成果获得省委和中央采用; IPP 资深研究员余荔关于国际顶级期刊拒稿率的相关报告, 获教育部咨询专刊采用。

◆ 郑永年出席 2025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

2025 年 12 月 30 日, 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 2025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作题为《在历史演进重大关头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的主旨发言。中联部副部长陈洲、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新、外交部副部长苗得雨等出席开幕式。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应邀在大会研讨环节发言, 并获得王毅亲切接见。

◆ IPP 公布《公共政策研究院管理改革方案》

为优化内部治理机制, 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增强自我造血能力, IPP 近期制定并公布了《公共政策研究院管理改革方案》。该方案聚焦横向课题管理机制、院聘人员职务(岗位)提升计划、政策报告任务考核机制等三个重点改革事项,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院务·交流】

◆ IPP 举行全院工作会议

10月11日,IPP在研究院15楼大会议室召开全院工作会议。会议就全体研究人员的第四季度政策报告及相关研究工作展开交流,并对研究院的工作纪律与规范提出要求。

◆ IPP 赴清华大学智库中心调研

10月17日,IPP领导班子成员郭海、刘金程前往清华大学智库中心(国家与全球治理研究院),调研该中心“举全校之力办智库”的经验做法。

◆ IPP 获党建主题征文比赛优秀奖。

在学校党委组织部的组织推荐下,IPP新媒体主管刘深撰写的《以作风建设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获得广东省党建研究会征文比赛优秀奖,成为我校唯二的获奖作品。该征文活动的主题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

◆ 赵巍赴匈牙利调研中国新能源企业

11月5日至15日,IPP研究员赵巍教授受邀前往匈牙利参加第五届“匈牙利电池日”活动,拜访匈牙利投资促进署、匈牙利电池工业协会等当地新能源工业投促组织,并在当地调研宁德时代匈牙利公司、欣旺达匈牙利公司、亿纬锂能匈牙利公司等中资企业的建设和运营情况。

◆ 郑永年举行全院学术指导会

12月2日,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院内举行学术指导会,听取研究人员就本年度政策报告进度进行汇报,并对2026年的重点研究工作与政策报告要点进行专项指导。

◆ 莫道明举行全院工作指导会

12月12日下午,研究院创院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委员莫道明教授在研究院会议室举行工作指导会。莫道明教授在会上分享了他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观察和思考,并对研究院下一年度的工作重点进行部署。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到访 IPP

12月16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沈丽丹、教学副院长魏英杰等一行到访IPP,与IPP执行院长郭海及多位IPP研究人员举行座谈。双方围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经验与有组织科研实践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等相关议题展开探讨。

◆ 河海大学社科处到访 IPP

近期,河海大学社科处处长黄永春到访IPP,并就高校智库建设、联合开展智库课题研究等议题与IPP进行座谈。华南理工大学智库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李秋成、IPP执行院长郭海、IPP党支部书记刘金程等参加座谈会。

◆ “IPP 评论” 荣获腾讯新闻新媒体奖项

近期,IPP官方新媒体账号“IPP评论”获得腾讯新闻颁发的2025“美好内容同行者”奖项。2025年5月,“IPP评论”受邀入驻腾讯新闻,凭借在国际关系及政策研究等领域的优质内容产出,“IPP评论”多篇优质内容获腾讯新闻读者的青睐。

【学术活动】

◆ 何包钢教授主讲第22期“IPP明远讲坛”

2025年10月30日上午,IPP第22期“明远讲坛”特邀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何包钢教授作题为“从调适到战略竞争——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回应”的专题讲座。

◆ 朱雁翎参加《国际新闻/政治期刊》年会

11月19至21日,IPP助理研究员朱雁翎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参加第十一届《国际新闻/政治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年会,并在分论坛“公民参与、不文明行为和大众政治”作演讲发言。

◆ 李明令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辅导会作经验分享报告

11月17日,IPP助理研究员李明令参加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举行的202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辅导会,并作经验分享报告。此前,由李明令助理研究员主持的“新就业群体参与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研究”项目入选“202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名单”。

◆ 由IPP牵头撰写的专著出版

近期,由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牵头和统筹,来自IPP、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共同参与撰写、系统总结广东省先行实践经验的专著《再造一个新广东——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探索》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徐伟钧英文专著出版

近期,IPP助理研究员徐伟钧博士的新书 *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 The Logic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in Bilateral Disputes in Post-Cold War Period* (《民族主义抑或是认知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后冷战时代中国在双边争端中的外交政策选择逻辑》)在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正式出版。作者在书中为中国在双边争端中的外交政策选择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反驳了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大众民族主义及其影响的错误认知。

◆ 克里斯托夫·谢雷尔教授主讲IPP明远讲坛

2025年12月3日上午,IPP第23期“明远讲坛”特邀德国卡塞尔大学全球化与政治学荣誉教授、卡塞尔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非驻任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夫·谢雷尔(Christoph Scherrer)作“和平经济相互依存”的错误认知的专题讲座。

◆ IPP举办“江苏现代化经验分享与广东对比”

研讨会

12月8日下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与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联合举办“江苏现代化经验分享及其与广东的比较”

研讨会。研讨会以江苏与广东的现代化路径为切入点,邀请IPP研究员、教授杨丽君,GIG研究员姜涵,GIG研究员易达等研究人员分享在江苏展开调研的感受与收获,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研究议题与政策思考。此前,受江苏省委宣传部委托,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率研究员团队赴江苏徐州、镇江、无锡和扬州等地市开展“江苏现代化专题调研”。

◆ 郭海参加百川论坛并作演讲

12月13-14日,百川论坛——“第五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地缘冲突与全球秩序重构”2025研讨会在深圳举行。IPP执行院长郭海研究员作题为《特朗普第二任期背景下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联动》的演讲发言。IPP外政策团队成员刘佳、朱雁翎、徐伟钧、李品保、区富祝、陈佳慧等参加了论坛。

◆ IPP举行多场社会热点专题研讨会

11月19日,IPP在院内举行了“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内部研讨会,IPP执行院长郭海副研究员、IPP研究员杨丽君教授、IPP助理研究员徐伟钧、IPP研究助理陈佳慧等就近期的中日关系紧张局势做出深度解析,并为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把脉。

12月4日,IPP举行“AI泡沫论”内部研讨会,戴明洁、李品保、区富祝、庄文越、蒋余浩等多位IPP研究人员从资本逻辑、产业应用与政策治理等维度切入,对近期热议的“AI泡沫论”及其背后的结构性风险、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等进行了系统分析。

12月30日,IPP举行“从美国‘斩杀线’到中国‘兜底网’:现代社会如何保障个人风险?”的专题研讨,围绕近期热议的美国“斩杀线”话题与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进行深度讨论。林辉煌、卢克玲、李明令等在会上就相关问题分享研究心得。

关于 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所为中央提供独立决策咨询的国家高端智库,成立于2012年,由华南理工大学知名校友及企业家莫道明先生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同创办,由国际顶尖政治学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2015年,IPP被中宣部认定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2017年,IPP成功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核心智库”榜单;2022年,IPP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认定为“重点政策研究合作单位”;2025年,IPP被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认定为“中央网信办舆情合作培育单位”。

IPP以决策咨询为“安身之本”,以学术研究为“立命之道”。在郑永年教授的带领下,IPP专注于三大领域的政策研究:大国外交、产业经济及社会治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IPP每年撰写并向相关部门提交高端政策报告百余篇,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成果得到高层重视。

与此同时,IPP大力推动学术出版、国际交流与舆论沟通,与公众和学界保持积极对话,努力向世界讲好公共政策领域的“中国故事”。2021年,IPP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系列丛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前沿》;2022年,IPP又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合作,出版中文公共政策系列丛书。作为研究院的品牌活动,“IPP国际会议”已成功举办十一届,为海内外学者搭建了优质的学术交流平台。

秉承“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开放理念,IPP经过十余年的辛勤耕耘,如今已成长为我国最具政策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的综合型智库之一。



电话: 020-87112324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81号华南理工大学

官网: <https://ipp.scut.edu.cn/en/>

微信公众号: IPP 评论



2025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 2025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郑永年教授(左二)受邀与会。图：AP

2025 年 12 月 24 日，研究院成员在广州黄埔区长岭步道举行团队拓展活动。





國際視野

中國悖懷

联系我们

政策咨询：（8620）87111850 E-mail: liujincheng@ipp.org.cn

公共关系：（8620）87112340 E-mail: media@ipp.org.cn

出版物订阅：（8620）87111856

地址：中国广州天河区五山路381号汽车科技大楼15楼

邮编：510640

官方网站：<http://ipp.scut.edu.cn>

官方微信：IPP-REVIEW

今日头条：IPP评论